

# 目 录

## 绥远和平起义后实现解放区化、

- 解放军化的历程…………… 董其武 (1)
- 原国民党三二〇师起义、整编、  
    抗美援朝经过…………… 行定远 (62)
- 绥远“九·一九”起义杂忆…………… 任秉钧 (78)
-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前后…………… 康保安 (80)
- 随傅作义先生来绥策动绥远起义经过…………… 李上九 (84)
- 从北平到绥远…………… 肖如芝 (89)
- 往事回忆…………… 王静山 (99)
- “九·一九”起义片断回忆…………… 刘天宝 (105)
- 记邵力子与景梅九两先生…………… 杨令德 (110)
- 回忆晋绥军六十一军天镇抗战兼述李服膺之死… 杨维垣 (117)
- 我所知道的玉禄…………… 瑞辑五 (125)
- 满泰小传…………… 程景华 (131)
- 蒙古王公达赉贝子的没落…………… 温大明 (134)
- 归化城金融史话…………… 贾汉卿 (157)
- “曹德厚堂”的起家…………… 曹 瑛 曹梦麟 (195)
- “小班馆子”与“聚锦堂”…………… 白 温 刘映元 (203)
- “大戏馆子”与“清酒馆子”…………… 刘映元 李补根 (216)

# 绥远和平起义后实现解放区化、 解放军化的历程

董 其 武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我和孙兰峰将军等国民党绥远地区三十九位军政领导人员发出了和平起义的通电，从此，绥远全境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也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革命阵营。

绥远和平起义后，我参加了实现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的斗争，现将这方面的情况忆述如下：

## 最 初 的 三 个 月

九月十九日，我送走了偕同邓宝珊先生和孙兰峰匆忙赶回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傅作义先生。回到归绥后，即开始处理各项军政事务。首先着手肃清潜伏的特务分子，防止他们捣乱和破坏，保护起义的胜利成果。

九月二十日下午，我正在省府机关处理公务时，接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复电原文是：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

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我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复电原文是：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途，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

我接读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复电后，心中极不平静，激动万分。他们对绥远“九·一九”起义的赞扬和高度评价，使我更觉得率部起义走人民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他们的复电给我和全体官兵、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指明了今后奋斗的目标，这就是：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为此，我当即把他们的复电都转发给各部队和各级政府，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复电精神，我首先进行维护革命纪律和革命秩序工作。我处理了反革命分子李维业事件。李维业原为察北行政专员兼保安旅长。张家口解放后，他带领察北各县地方团队窜到绥远陶林、武川一带，编了一个旅，抢劫人民财物，胡作非为。在绥远和平协议执行中，他竟进行捣乱破坏，带领部队越过划定的界线杀害中共地方干部，抢走解放军放青军马二百多匹。为此，我将他扣捕镇压。这样做意在打击反革命的残余力量，使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地，巩固起义的胜利成果，保证起义后的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其次，我要求全体官兵和行政人员，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我于九月二十六日写了致绥远人民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军民起义的意义和我们今后光明的前途。我说：这次绥远起义，是为继承抗日的光荣历史而起义；是为反对反动的“戡乱”战争而起义；为贯彻北平和平的精神而起义。这也是我们绥远人民由矛盾痛苦中所创造出来的新生。希望广大人民在新生之后，毫不迟疑、毫不徘徊地自我教育，力求进

步，消灭反动派，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毛主席的指示，为完成时代的任务，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十月六日，我又给各部队指挥员写了一封信。我十分感谢和欣慰各级指挥员顾全大体，艰苦奋斗，费心费力，共渡难关。在酝酿起义间，部队的纪律废弛，不仅丧失了过去的光荣传统，而且给人民增加了许多痛苦，各方面的反映也非常多。为此，我在信中希望部队先做到不扰民、不拉夫、不要车，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向人民借粮，不用人民的柴草，要帮助人民秋收劳动并不许取任何报酬。

以上这些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形势，起到了巩固起义胜利成果的作用。

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因为绥远刚刚起义，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我请假留绥。在会议最后一日选举时，我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委员。傅作义、邓宝珊二先生也同时当选。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日子。绥远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和绥远起义，全省军民在归绥、陕坝、包头等地分别举行了庆祝大会。我和在省的军政人员参加了归绥市的庆祝大会。这天，归绥市阳光普照，万众欢腾。所有参加大会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处处表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欢乐幸福情景。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大会上，首先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给我们的复电，全场热烈鼓掌。之后，又宣读了绥远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绥远军民起义大会宣言。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董必武、傅作义和董其武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了致敬电：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绥远和平解放，感谢中央领导人的英明领导和宽大关怀。我在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抬起头来了，从此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平等了。这是我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值得我们兴奋、欢呼！这种幸福和光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予我们的，我们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讲话时时被军民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我被这样庄严隆重，人人心情欢畅的大会所感动。真正感到我们走向了新生，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

## 欢迎党政军领导来绥

起义之后，原来国民党省政府的牌子换成了人民政府的牌子。军队也改称人民解放军，戴了解放军的帽徽。但是，一切旧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还没有改变，解放军也没有进驻绥远。下一步怎么办？我心中急切盼望中共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快些来归绥，以便早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

十月初，我给傅先生打电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傅先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提出今后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应遵循四个原则，三个步骤。这四个原则是：坚持团结、肃清特务、整顿纪律、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彻底实现解放区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恢复交通，包括通商、通邮和人民的来往；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毛主席十分赞同。

十月二十四日晚，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在中南海接

见了在北京参加华北局会议的绥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克林，省军区司令员姚喆、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同志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先生。毛主席就绥远今后和平合作问题和他们作了长时间谈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之后，傅先生即打电报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毛主席说：绥远问题谈了大半年，现在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正规军、地方军也包括在内。省政府与省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两条线一个头。傅先生要我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指示，搞好合作共事。为此，我经常派康保安去丰镇向中共绥远省委汇报工作，取得联系，并向他们转达希望党政军领导同志早日到归绥。

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张钦、荣祥、袁庆荣、安春山、王克俊、阎又文、于存灏、张濯清、姚喆、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潘纪文、奎璧、杨叶澎等十六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为副主席，周北峰、李居义、李世杰、秦丰川、胡凤山、张立范、常佩三、张淑良、杨令德、辛崇叶、康保安、张国林、苏谦益、张如岗、张庆忠、王建功、阮慕韩、李维中、靳崇智、刘秀梅、武达平、杨叶澎等二十二人为委员。十二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中共绥远省委、绥远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归绥之前，我在省人民政府机关的会议室里召集省政府、原归绥指挥所的有关负责干部开会，布置迎接事宜。我说：绥东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多年来艰苦奋斗，创造了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值得我们敬佩。同时，这些同志在绥远和平解放事业上，遵照毛主席指示，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地支持了我们的绥远起义。对这种支持，我们永远不忘。他们的到来，将加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的领导力量，是我们所期待的！我要求组织欢迎队伍到火车站欢迎。场面要热情、隆重。把好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营房坏的要修补好，没有家具就买或借，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以表示我们的敬佩和诚心诚意欢迎他们到来的诚恳喜悦心情。

十二月中旬的归绥市，天寒地冻，冷风刺骨，很少有人上街。十二月十七日上午，绥远省委、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从丰镇出发来归绥市。这天清晨，广大市民、部队纷纷走上街头，拿着扫帚、铁锹进行大扫除，以干干净净的市容来迎接亲人；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走上街头，张贴彩色标语、挂旗子，欢迎的队伍一早就从归绥市的新旧两城涌上车站。我和卫士走在街头，看到人民群众的那种兴奋之情非常感动。我派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克俊、省人民政府委员张国林等一行，专程从归绥市前往陶卜齐车站迎接，陪同省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委员王文达、军区副司令员姚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及党政军团体、群众团体干部千余人，前来归绥。我和孙兰峰率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归绥市的各委员以及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六十多单位近万人，在车站列队夹道欢迎。车站上，到处是五星红旗和彩旗。彩色标语也特别醒目，欢迎的队伍从站台一直排列



到站前广场。

下午一点四十七分，列车抵达车站。这时，热烈的掌声、口号欢呼声和军乐声响成一片，久久回响！我和孙兰峰等走上前，与绥东来的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互相慰问，情景极为亲切。随即我陪同他们检阅了欢迎队伍。检阅完毕，我们稍事休息后，在车站广场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我首先致词，随后高、姚、杨、奎也先后讲话，他们十分感谢各界的欢迎，表示愿和大家一起努力完成建设新绥远的任务。在我们讲话中，掌声雷动，十分感人。大会结束后，我陪同来绥的各领导同志到联谊社午餐。

绥东来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疏通关系，建立友谊，于十九日下午二时，在联谊社设茶话会，与驻归绥市军政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各领导，蒙、回各族及各界知名人士联欢。我、孙兰峰等七十余人应邀到会。高克林同志在热烈掌声中首先致词，说明了茶话会的意义，是互相认识，以便在今后工作中亲密团结。号召大家警惕蒋、阎匪帮特务钻空子进行破坏。姚喆、杨植霖、苏谦益等相继发言。我在茶话会上着重讲了起义三个月里所做的几件工作。孙兰峰在发言中生动叙述了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孙兰峰说：“九·一九”起义后，我赶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毛主席对我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政协会议。”毛主席的话使我感动的从头热到脚心，掉下了热泪。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各首长对我的亲切关怀，使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毛主席又走到我的桌边说：“今天特别欢迎你，我们两个干一杯。”毛主席的两句话使我觉悟了。今后永不忘记，一辈子也忘不了。

茶话会上充满团结亲密和愉快的气氛，使我激动不已。在茶话会临结束前，我这个五十岁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兴奋地站起来，领导大家高呼：“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实干部！”“我们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伟大政策！”“绥远各民族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历时三小时的茶话会，愉快和热烈温暖的气氛，使我忘掉了窗外还是冬天，忘掉了夕阳已经西下。

从九月十九日起义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共党政军领导同志未从绥东来归绥的三个月内，政府、军队的事集我一身，忙得不可开交。省府距我家只有几十米远，但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半夜进门，天不亮出门，难得和妻子、女儿们团聚、就餐。在此期间，我遵照毛主席建设新绥远的指示，带领大家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工作：一、为了改造思想，使人人都认识共产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普遍开展了学习运动。在机关、学校内成立了学习小组，军队建立了督导制，又组织了社会宣传教育，利用报纸、广播、讲演、墙报、座谈等形式，掀起学习高潮。二、在“九·一九”起义不久，我曾得到反动派的一个电报，说要派出特务杀害傅作义，并对我也下毒手。所以我十分警惕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捣乱。我命令逮捕了七十三个特务，查获电台十七部，在全省内划分了治安区，负责清查匪特。三、为了解除绥远人民的痛苦，开展了生产活动，倡导秋耕运动，禁止宰杀牲畜，并计划省府机关和部队开展生产劳动。我觉得开展了以上工作后收获虽不大，但总算有些进步，毕竟是实行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良好开端。

## 地方解放区化

中共党政军领导同志抵归绥后，我们即坐在一起合作共事

了。首先，宣告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绥远军政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傅作义先生特于二十一日从北京来绥，参加成立大会。高克林、乌兰夫、我、孙兰峰和全体委员，省人民政府、省军区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等一百二十七人参加了大会。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也列席了会议。大会宣告揭幕后，傅作义主席首先致词。他说：“军政委员会的任务，在于使绥远地方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人民的新绥远。”之后，高克林、乌兰夫、我、孙兰峰等十余人相继发言。我在讲话中说：“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就是领导绥远人民革命建设的司令部成立。……我过去在反动的阵营里做了许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按道理应该受到人民的处罚，但是毛主席宽恕了我，绥远人民宽恕了我，给了我一个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真是感激万分。我现在是人民革命阵营中的一个新兵，我一定追随各位同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加倍努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人民面前补过，我迫切地希望诸位同志随时给我批评与指导。”邓宝珊主席也以来宾身份向绥远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会后，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即就职视事。

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的第四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我和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委员也就职了。这天下午三时，在省府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我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名单。并致词说：“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是绥远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绥远人民的一个大胜利，是绥远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具体表现。这就证明旧的绥远已经结束，新的绥远已经诞生。我要求全体同志竭尽所能，矢忠尽职，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央人民

政府和绥远全体人民汇报！”杨植霖、奎璧、孙兰峰、周北峰等人也发了言。至此，绥远省人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内，有三个专区，两个盟，十八个旗，二十二个县，三个市；土地约三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六万余人。从此，全省人民在这块广阔的地域上，发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解放区化运动。

省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制定了一九五〇年施政方针。其方针是：（一）、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二）、建立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适应当前农民的迫切需要，恢复并发展生产，实行二五减租，为土地改革作准备。（四）、发动并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并使之成为各项改革和建设有力的可靠支柱。（五）、经济建设遵照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六）、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增加收入，精简节约，以达到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目的。（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扶助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开展蒙旗教育工作。（八）、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防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巩固蒙、汉、满、回各族的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施政计划，上报军政委员会并得到批准。总之，绥远解放区化的工作，主要是以团结改造，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恢复生产为重点，并以生产为中心，推动全面工作的发展。具体工作分述如下：

### 1、团结改造，民主建政

团结改造是毛主席及中央对待绥远起义干部的方针。省人民政府坚持贯彻了这一方针。在省政府合并之初，由于过去思想体系不同，绥西的一部分干部怀有疑虑。我除号召他们相信毛主

席、党中央的政策外，亲自与人事部门的同志酝酿调配。在人员分配上，就科长一级而言，绥东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绥西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五。在省、县各级三千二百余名起义干部，都量才使用，分配了适当工作或参加学习，为照顾实际困难和绥远的经济状况，一律实行低薪制待遇。

机关合并成立之后，不仅要求形式的统一，还要做到制度的统一，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各方面的一致。我们为解决问题，开展了学习运动，即正式成立了绥远军政干部学习团，与原有的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进行干部教育。在二月一日军政干部学习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上，傅作义先生、高克林和我都讲了话。我说：“这次学习是我们绥远军政干部力求进步，争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宝贵机会，是一件幸运的大事。希望大家在学习中提高政治觉悟，抱定死生今生的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自我改造是长期的，是要经过一定痛苦的，不能以为自己看了几本书，记些新名词，能谈几句革命理论，就认为彻底改变了。必须作彻头彻尾的洗刷。彻里彻外的改造。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待学习结束时，力求做到面孔虽然还是原来的面孔，精神却不是原来的精神，思想已不是原来的思想，作风已不是原来的作风。这才能表示在学习中改造了自己，有了进步！”

我记得参加这期学习的，计有现职干部一千二百七十余人，无职干部一千四百六十余人。原定现职干部学习一个半月，无职干部学习三个月。从二月一日开始学习两个月后，因工作急需干部，即分配了一千五百余人，到各级政府、军队中任职，其余一千二百余名干部继续留团学习。就各级政府行政干部来说，在职干部调训了两次。第一次省级干部一百四十余人，市、县级干部

五百人。第二次省级干部一百人，市、县级干部二百五十人，共计九百九十余入。

三月二十四日，在行政干部学习团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上，我和高克林讲了话。我在讲话中肯定了他们经过五十天的学习所取得的进步，希望他们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并着重批评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要求整体进步，反对个人突出”。我说：这种思想阻碍了自己的进步，也阻碍了别人的进步，我们欢迎进步快的，因为这样起了带头作用，鼓励了大家的进步；另一方面进步慢的人，只要是真正想进步，我们还是一样欢迎。至于说到整体，那应该是指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小集团，小组织，再没有基于个人利害相结合的所谓“整体”。如果有人存心利用旧关系，走小路，想取巧，思侥幸，便是犯了极大的错误。另一种错误思想是：“自己进步了，回到工作岗位上，上级还是原样，也是白搭，行不通，地位也保不住。”我批评说：进步就是真理，只要进步，真理会保障你，领导上也会支持你，如果你的上级他真不进步，那他自己背弃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会纠正他或不要他。我的讲话得到毕业学员的热烈拥护。

除此之外，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亦特别重视。军政委员会统一制定计划，统一领导，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总会，各部队、机关成立了分会、支会，一边工作，一边坚持每天学习两小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〇年六、七月份，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整风的伟大号召。绥远省委根据起义干部的实际情况，决定党员和非党干部都参加整风运动。我在省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会上作了《彻底改造我们的思想作风》的长篇报告，总结了半年来军政干部的学习情况，检查了省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

原因，受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

总之，在一系列的学习运动中，所有的同志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尤其是起义干部，开始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定了过去错误的思想意识，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初步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觉得这些进步，是与党的耐心团结教育分不开的。团结促进了进步，进步加强了团结，团结进步给我们带来了建设人民新绥远的巨大动力！

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对省的行政区域划分进行了调整。将归绥、包头两市列为省辖市。原有陕坝市因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不足，列为陕坝专署直辖镇。乌兰察布盟、除百灵庙办事处撤消外，仍辖四子王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东公旗、西公旗、中公旗等六个旗。伊克昭盟，原辖札萨克旗、达拉特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郡王旗、准格尔旗、乌审旗等七个旗，除撤消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桃力民办事处、杭锦旗代营处外，并划东胜县归该盟领导。绥东四旗办事处撤消，以正红旗为中心旗，其余正黄、镶黄、镶蓝三旗按甲种区编制，归中心旗领导。土默特旗，为了照顾该旗历史与现存的特殊情况，在行政区分，暂维现状，沿用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办法，成立了土默特人民政府。其余二十二个县，除东胜划归伊克昭盟公署领导外，划四个专员区。集宁专署辖：集宁、丰镇、兴和、陶林，龙胜（后改为卓资）、武东六县。和林专署辖：和林、清水河、托克托、凉城四县。莎县专署辖：武川、包头、固阳、归绥、萨拉齐五县。陕坝专署辖：五原、狼山、晏江、米仓、临河、安北六县及陕坝镇。

这些区域划分之后，各专署、市、县、区及盟、旗人民政府均先后成立。我记得绥包两市首先废除保甲制度，在其它区也停止了保甲摊派，全省人民对此热烈拥护。为此，省政府又给各级

政府下达明确指令，要求他们在五〇年冬和五一年春，结合群众运动，彻底废除保甲制度。

在民主建政上，也有很大的开展。在我一九五〇年底率部离绥时，绥东各县大部开过四次人民代表会议。绥西新区各市、县也开过二次人民代表会议。区村人民代表或农民代表会议，老区普遍举行，新区也都开过农民代表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宣传了政策，发扬了民主，初步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因而在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2、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

由于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日寇数年的烧杀抢掠，致使少数人铤而走险，成为土匪。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下，特务活动异常猖狂，“九·一九”起义前，一些特务分子大肆破坏，挑拨离间；起义之后，有的特务匪徒潜伏隐藏起来，暗中破坏；有的流窜农村，成为政治土匪。不剿匪，不肃特，社会秩序就难安定，人民群众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绥远的建设，实行解放区化也将是一句空话。省人民政府遵照军政委员会“以军政结合，发动群众，剿抚兼施的方针，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原则”，与省军区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围剿土匪、肃清特务分子的工作，并相继成立了各级剿匪的统一机构。

我在绥远工作多年，对情况了解，给公安战士剿匪肃特工作规定了重点区域：即在交通线上和匪特经常活动的伊盟、后套以及两行政区的接连地区；对成股土匪，依靠群众坚决进行军事围剿。与此同时，省军区派出步兵二十二师、蒙旗骑兵四、五两师于七月下旬开赴绥西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剿匪肃特，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主动替部队站岗放哨，侦察匪情。有的群众从几十里的山里跑出来送情报或带路，使隐藏在深山沟的土匪得以肃清。在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下，一些土匪自动放下武器，投降缴械。当时，绥西地区只一个多月，就把嚣张一时的“绥察游击军”、“华北反共救国”等成股土匪歼灭。芦万辉、李良等匪首被俘获，缴获各种枪支二千余支，骡马一千余匹，物资几十大车，解救了被劫去的许多妇女。从此，绥西的群众生活得到安宁，社会秩序大大好转，为该地区解放区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一月份开始至九月份，在全省境内已歼灭匪一百六十三股，毙伤俘匪一千七百余，先后破获中统、军统、反共自卫军等三十六案，逮捕匪特二百零八人，缴获电台二十九部。

### 3、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一九五〇年初，毛主席号召在全国范围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给绥远的任务是：粮食生产十六亿斤，成活林木一百万株，繁殖大牲畜六万头。绥远省各级人民政府，把几千年来认为是人民自己的事的生产工作，由政府全力推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动员机关、学校和广大的人民，投入到生产热潮中去，为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贡献力量。

根据中央给绥远省的生产任务，省人民政府有关厅、局详细制定了生产规划。我记得主要精神是：以恢复为主，在恢复的基础上求发展。所有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以及副业，在条件不好的地方，保持上年水平，条件好的地方要求提高。

省人民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省人民政府于二月初，在归绥市召开了省农业生产水利会议。各县、旗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和省府各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了

会议。省人民政府在会上详细布置了生产任务，要求农业方面：耕种面积达二十六万五千顷，每亩产粮平均最少六十七斤，共产粮十七亿六千二百六十七万斤，比中央给的任务超过一亿六千二百六十七万斤；农田水利方面：增加灌溉面积一万顷；林业方面：除中央要求完成成活林一百万株的任务外，增植一百万株树木保证每人至少栽一棵树；畜牧方面：增产马六千七百二十四匹，牛三万六千七百头，驴六千四百头，绵羊十八万头，山羊六万二千五百头；农村副业方面：增产猪九万头，鸡四十一万二千只，达到全省每五人养一头猪，一人养两只鸡。

二是稳定各阶层的生产情绪。由于历年战祸的影响，人民生活普遍穷困，无力生产。尤其是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新解放区，一般人民对于我们的政策不大了解。加以匪特捏造谣言，煽动人心，因而一些地、富们消极怠耕，毁坏农具，杀卖耕牛，影响生产至为严重。对此，我们首先在全省内广泛宣传“奖励生产”、“劳动致富，勤俭发家”的政策。宣传坚决保护中农的利益，合理负担的政策。使他们明白共产党的政策，是教他们用劳动创造好生活，而不是教他们受苦受穷的。同时，我们给贫苦农民发放口粮、籽种，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牛具等困难。

三是组织春耕工作团，分赴各县、旗检查督导。我任省春耕工作检查团总团长，杨植霖等七人任副总团长。各县、市、旗也组织了春耕工作检查分团，共计厅长级以下干部一百八十多人参加。在出发前，我组织他们开了四天会，并提出了具体任务：了解各县、市、旗春耕工作情况，宣传春耕生产政策；发动组织县、区、村春耕生产委员会；调查春耕生产的优劣典型；选择适当对象，帮助制定生产劳动互助计划等。要求他们深入到农村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摸心病去心病。之后，他们分赴各地工作

了五十天，为恢复和增加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政府帮助兴修水利。在绥远省境内，黄河横穿绥西，大小河流渠道遍布各地。但连年未能大力整理，充分利用。我们决定了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出资兴修，修理了四首制石闸工程、霸王河灌溉工程；中型水利工程由政府协助群众兴修，修补了黄河防洪堤，修建了凉城脑包渠拦河坝和东三大股通梢工程，整修了麦达召灌溉工程等。

除以上工作外，省人民政府还开展铲除烟苗(鸦片)，耕种粮食的运动，全省铲除烟苗二十万亩，在夏锄中部分地区发生雹、冻、虫各种灾害后，乃由各地方粮内，无利息贷给群众籽种，补禾苗四十三万亩。总之，这一系列的生产工作措施，使全省的耕种面积顺利落实，中央给我省下达的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也为尔后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

#### 4、财经统一和工商调整方面

绥远省是一个边境省份，工矿企业、商业、财政都是基础差，底子薄。自省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即进行新旧政府财政合并移交工作。之后，按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工作决定，开展了调整工作。二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省财政会议，集合各市、县、旗财政工作人员、粮政工作人员、税收工作人员，共同讨论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我在会上说：立即根除过去反动政府所实行的四级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中央，市、县两级财政体制。市、县以下的事业经费、行政村经费划归地方财政；区以上，省以上事业经费划归中央财政。在财政收支上，实行统筹统支，贯彻预决算制度。没有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的决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准加重人民负担。支出要做到没有预决算不开支、不报销等。会后，各级财政人员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据当时的财政厅厅长靳崇智同志报告，一至六月份全省收入已达全年总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九·九，支出减少，未超过预算。经济建设的支出，却相对的增大，光投资于农、林、水、交通等有关人民生产福利事业的数字，已达全年经建支出概算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

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讲一下当时的财政厅厅长靳崇智同志。他是一名老党员，是绥远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财政厅长。他为人朴实正直，工作勤勤恳恳。原省政府办公厅主任李忠孚任他的副厅长，他们互相配合，很合得来，并经常向我请示汇报工作。靳同志是管理财政专家，对于解放初绥远人民财政工作做出了贡献。我五〇年底离绥不久，他也调中央财政部工作，以后又到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这几十年来，我们不管是在不在一起工作，都经常不断地来往，互相鼓励。一九八二年底，我入党时，他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送我，以示祝贺！

在工商业调整上，经过我们近一年的努力，已经将绥远省旧有工商业混乱不正常的经营情况、城乡交易阻塞的状况基本改变。可以说，至一九五〇年底，全省新民主主义的工商业体系已初具新的规模。

但是，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妨碍了工作。比如：春天供应莜麦拌种用酒的问题。有关单位事先对用酒的数量未能精确的统计，绥东专销处计划销三十五万斤，绥东专署计划二十七万斤，省农林厅又是三十三万四千斤，但实际售酒却在四十五万斤以上。对用酒的季节也没有正确的调整，单凭片面的估计，以为是立夏到芒种，那里冷，那里迟，才慢慢地供给。但实际上群众耕种是立夏到小满，并且越冷的地方用酒越早，因此造成了春季严重酒荒，群众到处挤着买酒，很多地方买不到酒。

集宁有一次，聚集了两千多人挤着买酒，有的等了几 天还 买不上，有的挤着打了酒瓶，有的生气干脆不等了，空跑数十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厅、局，对下面反映酒荒问题，开始熟视无睹，不能及时检查，没法补救。及至各地公文、电报雪片飞来。喊着要酒时，才费很大人力、财力向邻省购买。事后还不检查，吸取教训，而是互相推卸责任。

又如，在开始发放耕牛、农具和水利各项贷款等几乎迟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分配机关和发放机关，又缺乏紧密的联系，致使计划指标结存下差价二百三十余万斤小米，这批差价直至五月二十五日才又第二次分配下去，贷款的时效已经完全失掉。分配下去以后，又未能及时检查，下级层层积压，卓资县原分配贷款二十七万多斤小米，春耕结束时，只贷出三万多斤，还不到分配数字的百分之十二。集宁小土城村李秀文领耕牛贷款六十万斤，私自积压，经再三催促，才拿出五十万斤，其余十万斤买了纸烟和料面吸了。

再如，春季从宁夏渡口堂到包头南海子水坝间发生水灾。省水利局接到宁夏灾情报告以后，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只对沿河各县发了一个电报指示，未能深入各县认真组织、领导防范，也没有督促地方上的负责机关及时发动沿河居民防范，以至造成包、萨两县严重的灾情，灾区四百里，灾民三万余人，淹毁土地、房屋、粮食、牲畜的损失不可估量。事后，我们虽作了大量救灾工作，发了三十三万斤救灾粮食，但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种只用一份电报去解决防水灾的工作态度，是值得深刻检查的。

以上三个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春耕生产，对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损失很大，我在八月份省、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大

会上代表省府作的《彻底改造我们的思想和作风》的报告里，深刻检查了发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严重地批评了各级政府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种种表现，以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

总之，从以上这些工作中，我觉得省人民政府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这一伟大政策的措施是十分有力的。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向解放区化进程的步子迈得是大的，取得的业绩是显著的，值得可喜可贺！

## 部 队 解 放 军 化

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军队。旧部队，在旧社会是专门为反动派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两者相比，截然不同。为此，起义部队即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在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部队中开展了人民解放军化的运动。

### 1、成立绥远省军区

十二月九日，绥远军区机关的第一批同志从绥东抵归绥后，我们商定依照军区机关的工作性质，着两方面的人员分组对口互相了解工作及人事情况，进行合并的准备工作。各对口小组在交谈中，发扬了互相学习，团结友爱的精神，为机关合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绥东党政军领导和机关从丰镇来归绥市后，我们共同商量了军区和“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省保安司令部的合并事宜，拟定了机关合并的领导小组名单。合并小组的组长由姚喆副司令员担任，刘华香、裴周玉、张升初、李振智、袁庆荣、

孟昭弟、李子俊、王度任组员。

机关合并的原则是：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驻绥指挥所和保安司令部与绥远军区合并；成立绥远省军区司令部，指挥所政工处并入军区政治部；三十二兵站和医院分别同军区供给部、卫生部合并；物资移交时登记造册，不催不逼，移交多少接多少。在傅作义司令员的主持下，机关从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合并，三十一日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正式合并完毕，统一办公，我和军区的其它领导同志即就职视事。我记得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的领导同志外，华北军区还任命了一批领导同志。原指挥所政工处长李子俊任宣传部副部长；原三十二兵站军需和仓库同军区供给部合并后，张升初同志任部长，原兵站分监王度和潘瑞征任副部长；原指挥所的医务处、医院同军区卫生部合并后，由李振智同志任部长，许义华同志任政委。指挥所、保安司令部的其它人员分别在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担任了科长、参谋、干事等职务。这次合并，我觉得既照顾了绥远部队起义的特点和机关的情况，又照顾了本人的工作业务能力；既体现了“团结改造”的统一战线政策，又照顾了本人的愿望。所以，双方都比较满意。尤其是原绥远方面的干部家属，听说自己的亲人分配了工作，和老解放军干部一起工作，十分感动，纷纷给我写信或打电话来表示感谢！

## 2、起义部队改编情况

“九·一九”起义时的部队共有正规军和保安部队十六个师、旅，约八万余人。除邓宝珊先生的二十二军之八十六师由副军长兼该师师长胡景翼之五弟胡景通、二二八师由师长杨仲璜分别带领开赴甘肃庆阳正式改编外，其余部队在绥就地整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部队的整编方案及干部配备，并复电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军委批准成立两个军，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整编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四月底结束。我记得整编的情况及干部配备情况是这样的：

原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由刘万春担任，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樊折桂任参谋长，李骥程为副参谋长。下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三个师，一个直属暂编骑兵旅。具体情况是：原一一一军二五八赵晓峰师改编为一〇六师，赵晓峰任师长，原三二〇马逢辰师改编为一〇七师，马逢辰任师长，原三一〇张副元师及原乔汉魁旅步兵九一、九二团合并改编为一〇八师，张副元任师长，原独立第三乔汉魁旅骑兵、保安骑兵第四张汉琰旅、骑兵整编第十三高理亭旅改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乔汉魁任旅长，张汉琰、高理亭任副旅长。整编之后，各师，旅均按命令分别到达指定地区布防。当时，军部驻包头市，一〇六师驻中滩一带，一〇七师驻公庙子一带，一〇八师驻安北县，骑兵旅驻萨县地区。全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一人。

三十七军是新颁布的番号。军委颁布番号以后，以独立第七师为基础扩建而成。原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晋升为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化博知任参谋长，王韵琴任副参谋长。下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三个师，原三二二师改编为一〇九师，温汉民任师长；原三二六王崇仁师改编为一一〇师，王崇仁任师长；原三一九张朴师的三个团并编为三三一、三三二两个团，保安二旅及保安五团并编为三三三团，合编为一一一师，张朴任师长；原骑兵第五安恩达旅



及侯镇国团并编为第一、二两个团，保安骑兵第六邬青云旅编为第三团而合并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安恩达任旅长，邬青云任副旅长兼三团团长。整编之后，三十七军军部、一〇九师驻五原；一一〇师驻临河、陕坝；一一一师驻百川堡、狼山、永安堡；骑兵旅驻邬家地。全军共一万二千九百十五人。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鄂友三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强自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任副主任。下辖一个独立骑兵旅，四个团。原骑兵第十一陈秉义旅改编为独立骑兵旅，陈秉义任旅长。整编之后，骑四师驻防武川县一带，师部驻武川北小井村；全师共五千八百四十人。

### 3、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在各级部队中建立党组织、政治工作机关，开展政治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大特点。党中央、毛主席为使起义部队真正成为解放军的一支劲旅，即指示要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开展政治工作。

华北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即从二十兵团、河北、平原、绥远等省军区及十八纵队，抽调了一千九百多名政治工作干部，派到绥远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这批政工干部，大部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政治坚定，思想先进。他们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初，在三十六军政治委员康健民同志的带领下，从北京乘火车到归绥市。我和一些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批政工干部到归绥后，即开始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了解起义部队情况的学习。省军区成立了以姚喆副司令员、裴周玉

为正、副组长的学习领导小组。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分析在起义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制定了开展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军、师级政工干部又参加了军区组织的起义部队军、师、旅长高级干部训练班的学习。他们共同以两周的时间，对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建军原则及政治工作制度等进行了学习研究。通过学习，军政干部沟通了思想，融洽了关系，增强了互相信任，合作共事，坚定了把部队建设成为真正人民解放军的决心和信心。

政工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我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他们的到来将会给部队带来新鲜血液和工作经验，部队的建设将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我要求各部队要以赤诚心情欢迎政工干部到部队工作。二月下旬，我亲自指派跟我工作多年的三十六军副军长王建业、三十七军副军长卫景林、骑四师副师长王孝模来归绥迎接政工干部到部队。后来，他们向我报告说，政工干部到部队后，都分别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欢迎大会、座谈会、茶话会、联欢晚会。对政工干部的安全采取了防范措施，积极协助他们开展政治工作。

首先，在军、师、旅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行使政治工作职权。组建团政治处，派到各连的政治指导员由团统一组织，深入各连帮助工作，逐步建立了连队政治工作制度。

其次是实现解放军集体领导制度，建立军、师、旅、团军政委员会和营、连军政领导小组。军政委员会都由同级干部副职、参谋长、政治主任、后勤部、处长、下级军政一把手参加组成。主任由军、师、旅、团长担任。政委担任副主任。营、连领导小组也是如此建立。我记得这一组织在当时是本级集体领导、民主

集中制最高领导机构，它起到贯彻上级指示、命令，讨论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干部升调等作用。从此，旧部队中一长制的领导制度被废除，开始了军政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

三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思想，消除顾虑的政治教育。由于部队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反动的教育宣传，落后思想严重地阻碍解放军化的进程，一些起义干部顾虑重重，不敢大胆工作。为此，政工干部在部队中开展了团结改造方针、人民解放军性质、建军原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发展史等一系列政治教育。尤其是经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和拥政爱民运动，部队中违犯群众利益、打骂群众的现象逐渐消除。好些部队还开展“满缸活动”，主动替群众挑水、扫地、打柴、抹房子。我六月份到绥西部队检查工作时，看到部队这种好人好事不断涌现的新气象、新风貌后，新旧对比，激动不已。

这里，我深深怀念原三十六军政委，后任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康健民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干部，在三十六军任职期间，一言一行都以党的政策、我军的纪律为准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表现了共产党人有胆有识，光明磊落的高尚精神。可惜正在他领导宁夏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同时，我也十分怀念在为“团结改造”起义部队，被少数坏人杀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长眠于绥远地区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你们安息吧！你们的愿望早已实现。

#### **4、在大生产运动中锻炼部队**

参加农业生产。起义部队以前曾在绥西参加过修渠打坝，帮助群众生产。但只是局部和短期的。自从毛主席号召“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运动”后，起义部队积极响应。从二月份开

始就投入到农业、水利及各种副业生产建设中去了。

在开展生产之初，师以上单位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省军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总分社，各军、师成立了生产合作分社，统一掌握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成果的处理。我们规定，部队不要与人民争地、争利，不要叫人民吃亏，要帮助人民群众作无偿劳动；开荒时不要引起水患，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对于生产劳动，一些旧思想严重的官兵糊涂观念特别多。如轻视劳动。有的说：“贫穷由命，富贵在天。”“咱们生就了个受苦的脑袋。”据此，我们在部队进行了“谁养活谁”、“谁依靠谁”和学习毛主席有关生产的指示，回忆个人的历史等教育。使广大官兵的劳动觉悟有了提高，知道了剥削耻辱、劳动光荣的道理。

在生产劳动中，广大官兵的情绪高涨，干部带头与战士一起开荒种地，有的师级干部也参加了生产劳动。我记得赵晓峰一〇六师，有的营长与战士划分地段，开展劳动竞赛。一〇八师三二三团团部家属，自己挑水、打柴，与群众变工种菜、种山药蛋、营长和书记的爱人各种四亩地，涌现了王二娃、王世来、陈文山等许多劳动模范。据当时统计，全区部队种了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一亩，种菜地七千六百四十九亩，其中有二十一万亩地是部新开荒种植的。水利工程完成黄河培堤工程土方一百一十五万公方，完成渠道工程土方四十七万八千九百四十六公方。这些数字在华北军区五省、区部队的生产中是第一位。

年底收获时，各部队的报喜电报不断飞来，真是辛勤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广大官兵吃着自己种的粮，自己生产的菜，倍觉光荣，倍觉香甜！记得六月中旬，我去三十七军检查工作时，

张世珍军长、帅荣政委特意陪我到部队种的莜麦和菜地里转了转，看了看庄稼生长情况。当我置身在绿油油的麦田、菜地里，深深感到起义部队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际教育，改掉了他们身上许多陈旧的落后不正确的思想。我看到了部队的进步，也更相信广大的起义官兵将会象禾苗一样，不断地成长、开花、结实！

在生产劳动的同时，部队都较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剿匪等任务。但是，我们一年来解放军化的工作曾遭受蒋、阎匪特各种破坏和捣乱。他们利用老同事、老部下、老长官、老朋友，伪装隐蔽，从事破坏活动，甚至杀害政工干部。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一年内，先后发生了叛变事件三十三起，使部队向解放军化的进程受到了挫折。对于这些叛变部队，我十分痛恨，响亮地提出：

“谁叛变革命就打死谁！”的口号。例如三十七军一一一师庞茂卿副师长于二月初，拉一个团离开驻地叛变后，我立即着张世珍军长组织部队围剿平息，庞茂卿的特务排（管事务的）排长孙胜得知部队赶来围剿，采取机智灵活的办法将庞击毙，使此次叛变事件很快平息，并将部队顺利带回原驻地。叛变部队中的大多数官兵都是胁迫和受骗而走的。当他们看清了叛首的真象之后，便纷纷起来与之斗争。我记得骑四师二团迫炮连连长秦怀璧鼓动一、二、三连各一部叛变后，被战士捆了回来。三十六军暂编骑兵旅副连长王金率两个排叛变后，也被战士捆了回来。为此，孙胜同志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彰，还参加了华北军区的英模代表大会。

总之，一年来起义部队在向解放军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取得了显著成绩。她就象新栽的树一样，虽还没有扎住根，还经不起风吹雨打，但她毕竟是生芽长叶了！

## 到北京汇报工作和谒见毛主席

在绥远广大人民、起义部队向解放区、解放军化的进程中，我和高克林同志奉中央、华北局电令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主席。毛主席和我的谈话，至今不忘。

我于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从归绥来北平见傅作义先生。这次到京是绥远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和高克林同志三月底乘火车离开归绥，火车到北京站时，傅先生、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傅先生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十九号他原来的住宅里。住宅里有一幢三层楼房，房间布置得朴素大方，宽敞明亮；院子里，藤萝满架，花香四溢。

在北京，我和高克林同志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还设宴招待我们。他们听了汇报之后，即要我们准备向政务院汇报。我和高克林同志商议了汇报内容，让随我到京的白震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二人起草报告材料。报告草拟好后，我和高克林同志做了详细修改，并誊清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四月十三日夜十一点半，周总理将修改稿送回。

十四日上午八时，傅作义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我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我介绍给与会人员。我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内容大致为：关于政权改造；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生产工作；税收、公债及财经统一工作；民族政策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并对绥远省粮食外运，开采矿产等问题，向政务院提出：把京绥铁路延长到西山嘴

或陕坝；修理从包头到鄂托克旗公路等建议，以调节内地粮食不足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报告结束前，我十分激动地说了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它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能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觉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我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四月十七日，新华社将我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四月十八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当时，我看到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激动得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悔之莫及！

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我。在座的有宋庆龄、张澜副主席，周总理、林伯渠秘书长、傅作义先生、高克林同志，下午六点钟，毛主席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我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傅先生来到我的住处，一见我就笑着说：“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我一听就猜到是毛主席召见

我。傅先生又说：“今晚毛主席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当晚，我高兴地换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先生、高克林同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七时。我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我向毛主席恭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随即把我和高克林同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他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我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着傅先生对我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主席这时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答：“不是。”他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讲到这里，毛主席问我：“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地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他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奋斗。”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我听着毛主席的训示几乎入了迷，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傅先生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我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告辞，直送到门口。我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幸福！回到小酱房十九号住处，已十一点多了，我兴奋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他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太感人了！听了他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听了毛主席的训示后，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由于我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新制度、新作风，尤其是民主作风不了解，在起义后总认为军队仍是我带，行政仍是我负责，而伪指挥所与军区合并后，觉得军队的一切联系不上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绝大多数公文看不到了，不知道这是分工负责制，反认为军队是革命武装，我若经常过问，恐惹起对我的怀疑，自卑地把自己置于主人翁之外。故从一月份以后，军队的事过问不多，行政的事看到多少说多少，忘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责。毛主席和我谈话之后，我觉得仍以旧思想、旧意识、旧作风看待新事物，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殷切希望，却不够开诚布公，不够心口如一，应该对本职工作积极大胆地负起责任来，该说就说，不容旁贷。尤其是在北京看到各方面秩序良好，处处显示新气象，与旧社会截然不同，使我异常激动，对新中国的未来

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一切工作。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我们原定“五一”节后从北京回省，听了毛主席的训示，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尤其是听说部队有一个排哗变了，急匆匆地于四月三十日从北京乘火车回绥。“五一”节早晨回到归绥市。

当天下午，我在省府机关会议室向各委员传达了毛主席对绥远工作的指示，研究了落实、贯彻的具体方法。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省军区又召集军、师级军政干部汇报近三个月来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我和高克林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我还对军区三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之后，我于六月十三日带领孟昭弟、郭维周、曾士先、成坚等人入套检查三十七军的工作。在三十七军，我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进京观感，传见了营以上军政干部，慰问了一一一师的政工干部，对该军下一步的工作讲了意见。此行历时近一个月，收获很大。

在绥远起义一周年之际，省人民政府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和高克林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评价了一年来绥远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傅作义部长，于九月十四日特意从北京打来电报祝贺。现把他们的贺电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

绥远起义部队，一年来由于贯彻毛主席团结进步的方针，由于党、政、军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的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部队政治觉悟水平逐步提高，使军队和地方间、官兵间以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间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并在整训部队、参加生产和肃清匪特等重大任务中取得了成绩。值此绥远部队起义周年，

特向绥远起义官兵全体同志们致以热烈庆贺，希望进一步地努力，更好地加强革命部队的一切建设工作，依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原则，为建成一支坚强的国防军而继续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傅作义

九月十四日

## 组建二十三兵团，率部离绥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妄图实现以朝鲜为跳板，扼杀新中国的狂妄野心。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帝派飞机非法侵入我国东北领空，残杀我人民。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美国空军和赔偿一切损失，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制裁美帝，撤退侵朝军队。

消息传到归绥市，省、市各群众团体、各阶层人民，一致对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纷纷举行集会，声讨美帝、我当即向《绥远日报》发表书面意见，坚决拥护周总理的严正声明，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伟大国策。要求绥远各族军民，为维护和平人类的安全作正义斗争。起义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由于经过一系列解放军化教育，政治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也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美帝国主义。当时参加省军区劳模代表会议的十三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马上联合签名，表示如美帝胆敢侵略我国领土，就叫他有来无回，坚决彻底干净地消

灭。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侵略行径，傅作义先生十分气愤。他当时正同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同志等人，在黄河中游查勘，制定修建三门峡水库计划。他当即给毛主席、周总理打电报，表示对美帝的侵朝，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地对朝鲜进行支援。回到北京，他又上书毛主席，详细陈述美帝侵朝的暗算是妄想扼杀新中国。对美帝的侵略行径，我们不能坐视观望，必须予以打击。他根据多年的经验，坚决地说：“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不但应当抵抗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此时，我党对是否出兵抗美援朝，意见尚不一致。有少数同志觉得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项建设刚刚开始恢复，需要休养生息。美帝又有新式武器装备，打起来胜负难卜。绝大多数同志则认为不出兵后患无穷，应立即抗美援朝。毛主席看了傅作义先生的信后，十分赞赏他的意见。当即将信的全文印发给中央、政务院等部门领导同志参阅。又请傅先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抗美援朝利害关系。毛主席逢人就说：“你们看傅宜生先生都坚决主张出兵，我们还有什么疑虑的吗？”

十月份，我国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绥远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请求开出绥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书、请战书，成批地送到省军区机关。对各种要求，除军区报告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党中央外，我还向傅先生作了汇报。傅先生于十一月上旬，向毛主席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到朝鲜前线参战。这样能使这支部队受到新的锻炼，新的考验，进一步实现解放军化，同时，对绥远地方实现解放区化也更为有利。毛主席批准了这一建议。周总理在政

务院约见傅先生，宣布以原绥远起义部队为主，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并就兵团的人选征询了傅先生的意见。

十一月初，绥远军区召开军、师、旅军政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一年来部队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会议结束后，政治干部先回部队主持工作，军事干部继续留绥学习讨论、检讨工作，揭发问题。这是因为部队整编后，不断发生叛变和逃亡事件，使我惭愧、焦虑。会议中，我突接傅作义先生电报，命我率军、师、旅长赴京听训，接受新的使命。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率队到达北京。受到华北局、华北军区和政务院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到京的第二天，聂司令员、薄政委、傅作义部长在军区机关召见了各军、师、旅长。他们对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工作，作了许多指示。要求大家加强思想工作，用新旧部队对比的方法，引导官兵提高认识。并指出，起义部队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大家想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人民服务，部队是一定会改造好的。他们还告知准备派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希望大家认真讨论，统一思想，提出具体战略方针和意见。

在这期间，政务院公安部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我记得扣捕前，聂司令员、薄政委找傅作义先生、我和高克林同志开会。会上，聂司令员就把刘万春在起义后，派军直一个营长偷偷去香港，与蒋帮特务勾结联系等罪行、证据讲给我们听，拿给我们看，还讲了张朴、鄂友三的一些罪行。他们问我们怎么办？傅先生听了很惊讶，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我作为率他们起义的领导，又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觉得起义后竟出了这种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实在惭愧得很。我含着眼泪说：“既然他们背叛人民，罪证确凿，请司令员和政委依着革命纪律办吧！不过，念及他们都是参加过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考虑从宽处理！”聂司令

员、薄政委听完后，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商量了片刻，回来后对我们说：“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当天晚上，华北军区在东交民巷前日本领事馆，宴请各军、师、旅长，宴会结束后，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指挥，扣捕了刘万春等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周总理接见了绥远军区来出席会议的同志，傅作义先生、我和高克林同志一起受到接见。周总理在会议上讲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和胜利消息，国内恢复生产建设等情况，他对起义部队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作了较高的评价。他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开出绥远，进一步整训部队，创造条件，准备赴朝参战。

听了周总理指示后，我觉得一年来部队解放军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不少。如部队中曾发生过多起小范围哗变。尤其是发生了刘万春等人的事件之后，尤其觉得由我带起义部队赴朝参战，有很多顾虑。会后我和傅先生去见总理，我向总理提出：绥远部队起义刚一年，潜伏在内部的特务分子未彻底肃清，不时进行破坏和捣乱，带这支部队赴朝参战后，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它主力部队出国作战。

周总理听后对我说：“匪特捣乱早在预料之中，你不要着急。相信这支部队中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正在不断提高，你要有信心。”我又向总理提出，抗美援朝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光荣的使命，何况我是起义军人，正是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我把生命置之度外。但让我带这支部队赴朝，总是觉得信心不足，把握性不大，最好选一位参加革命时间长的老同志来担当这个重任。周总理听后大声说：“这样做不好吧！不能向困难低头嘛！要正视困难，鼓起勇气，整训好部队，赴朝参战。我等你们

的胜利好消息。”他又接着说：“你离开绥远后，把家眷也接出来，住在北京。”这时，傅作义先生说：“请总理放心，我替他安排。”我一看总理对我如此信任和关怀，心中十分惭愧，悔不应该在总理面前流露畏难情绪，于是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十二月一日早七时，我率军、师、旅长回到归绥市，大家即分头回防地，做移防的准备工作。我在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向副主席杨植霖同志做了移交，就一心一意地抓兵团的组建和移防工作了。

十二月十日，傅作义先生从北京来绥远。十二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成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移驻河北衡水地区，整训补充，做为抗美援朝的二线兵团。任命我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任副政治委员，边章伍兼任司令部参谋长，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潘瑞征任副部长，三十六军副军长王建业代理该军军长。

这个会议之后，我立即召开了兵团机关组建和部队移防会议。各军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骑四师政委、副师长、政治部主任等人参加了会议。决定从绥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抽调百分之六十的人员组建兵团机关。责成袁庆荣、裴周玉、张升初三同志负责组建工作。会议还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完成部队东进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希望各部队搞好思想动员，对武器弹药、物资装备、马匹等进行认真清理。土地、粮食、仓库造册移交当地军分区。检查群众纪律，损坏东西照价赔偿。真正做到“五不要”：政治上弄不清的人不要；年老体弱者不要；有

疾病者不要，坏武器不要，老、弱马匹不要。

各军、师受命回部队后，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研究移防中的具体问题。之后，各级层层传达，层层深入动员。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决心：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听从指挥，叫开到哪里就到哪里，保证完成易地整训任务，并立即进行了检查武器弹药、补充给养等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各团级单位在接到命令后，马上收拢部队，拟定行军计划，组织设营队和行军收容队。对出绥后善后工作，各级机关都抽调干部走访群众，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做到损坏东西就赔偿，借东西归还，秋毫无犯。各军、师成立了留守处，统一组织留后方人员的学习和工作，组织家属生产，安排他们的生活，使移防东进干部解除后顾之忧。

部队完成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后，我和高克林政委向各部队下达了出发命令。我记得三十六军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包头乘火车出发；三十七军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从陕坝各地乘汽车或徒步行军至包头集结，二十五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骑四师从武川县乘汽车到归绥，十二月二十九日从归绥乘火车出发；分别开往到河北沧州地区驻防整训。我和高克林同志率兵团机关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乘火车离归绥。在这之前，绥远省党、政、军各领导机关纷纷举行宴会、茶话会，欢送部队出绥，赴朝参战。这天，在火车站又受到了党、政、军及各界人民群众几千人的夹道欢送。此时我回想起自己从一九三〇年底到绥远，经过绥远清剿土匪、长城抗战、绥东抗战、绥西抗日三大战役、主政绥远、率部起义的二十年历史，心情极不平静，洒泪挥手和欢送队伍告别。我心中默念着：绥远，再见了！绥远的父老兄弟，各界、各族人民再见了！我一定带着胜利的消息再来看望你们！



一九五一年的元旦节之夜，我和兵团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伴随着火车的轰轰响声，在车厢里渡过的。次日，列车通过北京火车站时，又受到了华北局、华北军区领导同志的欢迎，并命我、高克林、裴周玉三人留京开会。我们三人在京参加了华北局四天会议后，即乘车赶回部队。

部队到达衡水地区后，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接待。不仅部队的住房安排得好，而且粮食、蔬菜、马草饲料都准备得非常充足。驻地的青年妇女还深入到连队、机关帮助拆洗被褥、缝补衣服，此情此景使起义干部深为感动，我也感动。起义前老百姓见了旧部队，能躲就躲，能藏就藏。现在变了，他们对我们都是笑脸相迎，亲亲热热。

部队在东进的一路上，干部、战士情绪高昂、愉快，全兵团没有发生叛逃的事。在绥西检查群众纪律，赔偿损失费用约两亿多元（折合人民币二万余元），受到群众的称赞和表扬。对于部队的进步，我十分高兴。兵团于一月二十日将部队的这些进步情况，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即转傅作义先生阅，在报告上写道：

宜生兄：

廿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阅。阅后请予掷还。廿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对部队称赞，使我的精神为之振奋，增添了带好部队

的信心和干劲！在我离绥不久，我的家眷从归绥市搬到了北京居住。

## 龙 华 整 训

龙华，是河北省衡水地区景县的一个镇子。兵团机关住在这镇上，部队分别驻周围地区。在这里，我们开展了一系列赴朝参战前的整训工作。

由于出绥时间仓促，兵团机关的成立大会，到了龙华镇后才正式举行。一月十一日，在龙华镇兵团驻地召开了成立大会，我和高克林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在这之前，分别成立了兵团党委和兵团的最高领导权力机关——军政委员会。高克林同志为党委书记；姚喆、边章伍、裴周玉同志为常委。我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同志任副主席，姚喆、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等同志为委员，王克俊任秘书长。

兵团司令部下设：作战、侦察、通讯、军务、管理五个科；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文化、保卫四个部和一个报社、检察院、总务科及文工团；后勤部下设战勤、军需、财务、军械、卫生、管理七个科及医院、运输团、战勤大队、驻北京办事处等。

二月十九日，我又和高克林同志到华北军区开会，接受军委要我们兵团在半年内完成入朝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指示。会后，我们分别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和紧急会议。决定：在团结改造的总方针下，加强阶级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发扬民主，争取早日完成解放军化的任务。同时，努力完成部队整编，骑兵下马，补充新兵，改换武器，军事训练等任务。

整训运动是从二月中旬开始，至四月初结束的。内容是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忆苦、自我教育为主，以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使部队彻底解放军化。对于开展民主运动，我是积极拥护的。自从我在部队东进前，在绥远提出五不要后，满以为部队基本稳定纯洁了。不料，初到河北又有两排人逃跑。部队在思想作风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起义前的许多不良影响，有的相当严重。所以，我感到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执行任务。为此，我在兵团召开的军政干部反对军阀主义的大会上，带头解剖了军阀主义的种种恶劣现象和危害。我说：“军阀主义的思想就是特权思想，作威作福，把部队视为个人的财产，个人升官发财，个人争夺权力的工具，个人专横独断，站在人民头上，站在士兵头上，压迫人民，压迫士兵。这是封建主义思想在部队中的反映。”

部队中的广大干部、战士对这一运动表现积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亲人的血泪史，控诉军阀主义的迫害，检举和揭发隐藏在部队、地方的特务反革命及坏分子。在这场运动展开时，我的思想模糊，认识不足。总觉得在旧军队中，我存心善良，做事沉稳，循规蹈矩，对战士一向很爱护，对人从来很和气。可以说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军阀主义思想和作风不严重。谁知在运动高涨的一天，我陪军区张致祥副主任到部队视察工作，在召集的大会上，大家向我提出了许多质问，当时就有二、三百人递条子，要我解答问题，使我长时间下不了台。最后，还是张致祥副主任向大家解释说，等下去后召集干部会议，再来解答所提的问题，我才下了台。后来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的问题也很多，也是下不了台，使我十分伤脑筋。有一次，我去部队，一个战士拿出一件血衣，控诉特务分子，对一个逃亡士兵杀了三十七刀，挖出

肝肺。他本人泣不成声，当场晕倒在地，全场群众悲愤地拍着胸膛，要为死者报仇。通过这件事，才切实地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旧军队中的许多罪恶黑暗事实，多半是旧军队中一长制，个人大权独揽，压制民主造成的。我曾在兵团的军干部会上做了深刻检查，批判了自己思想上残存的种种余毒，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称赞。以后，我常常以群众的意见检查、对照、鞭策自己，做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心甘当小学生，以昨死今生、脱胎换骨的精神改造自己。

但是，当我看到群众对我有这样多的意见和不满时，确实难免顾虑重重。总觉得如此下去，个人的威信失尽，何以负得起重任，何以做好部队统率工作？在一次到京开会时，我特意去见周总理，向他汇报我的苦闷心情，周总理对我说：“民主运动对你是‘解了旧甲换新甲’。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随着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只要你努力工作，威信很快就恢复。到那时的威信才是真正的威信，同时部队才真有力量。”亲聆总理的教诲，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打消了顾虑，变苦闷为愉快，进而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改正错误，真正发扬民主作风。

在群众揭发检举中，我记得共检举出反革命分子一九〇五名，参加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共一九二四名；交出私藏长短枪一三三支。对以上这些人，经兵团党委重点审查，扣捕、管训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二名，其他人调离学习，继续考查。通过民主运动，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起了本质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空前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大多数旧军官得到教育，体验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军阀主义思想的流毒被捣毁了，使部队的真正解放军化，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但是，在民主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有些人、

有些事的处理失之过激，也可说是扩大化、过了头。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找我谈话时，我谈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反对军阀主义，开展民主运动，对起义部队真正解放军化起了关键性作用，在使我的思想彻底走向新生方面，也起了根本的作用。但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实在不能不痛感一部分人的极“左”流毒害事之深。

为了赴朝参战的需要，在民主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又一次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华北军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起义部队的情况，制定了具体方案。主要是充实步兵师，撤消各军暂编骑兵师、旅。我记得在三月底，我、高克林、边章伍、裴周玉四人联合签发了兵团的整编命令。兵团辖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三十六军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三个师，三十七军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三个师，原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四师独立骑兵旅、三十六军骑兵旅、三十七军骑兵旅番号均撤消，部队分别并入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的步兵师内。具体并编方案是：充实一〇六、一〇七、一〇九、一一〇四个师，一〇八、一一一师部留后另有任务。一一一师部队编入一〇六师，以一〇六师为主，由一一一师副政委、副师长、政治部主任三人，率领部队前往并编、三十六军骑兵旅，一个团编入一〇六师，由骑兵旅指定负责同志率领部队前往并编。另二个团编入一〇七师，以一〇七师为主，由骑兵旅政委、副旅长、政治部主任率领部队前往并编。原骑四师与一一〇师并编，以原骑四师为主，编为一一〇师，由一一〇师副师长、政治部主任率领部队前往并编。三十七军骑兵旅编入一〇九师，以一〇九师为主，由骑兵旅安恩达旅长、廖政委率领部队前往并编。成立兵团师级教导大队。一〇八、一一一师为空架子师，一〇八师负责接收管理留后编余人员。

各军、师长、政委大致是：三十六军由副军长王建业代理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一〇六师由赵晓峰任师长，杨毅代理政治委员；一〇七师由副师长段吉祥代理师长，慕湘代理政治委员。三十七军由张世珍任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化博之任参谋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一〇九师由温汉民任师长，曾威任政治委员；一一〇师由副师长王孝模代理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教导大队由孟昭弟任大队长，彭正谟代理政治委员。

整编命令下达后，各部队深入动员，迅速地行动起来。尤其是撤消番号的四个骑兵师、旅的骑兵，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坚决执行命令，愉快地下马，改建步兵。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心爱的马匹洗刷干净，给马挂上大红花，号码牌子，披好马鞍，高兴地将军马送到指定地点。有的还把入伍时从家里带出的马、也交了出来。大批编余干部愉快地服从命令，积极移交工作。有的干部还拿出钱，买来日用品赠送给一些战士为纪念。有的凑钱买来猪肉、鸡、鸭、鱼等给大家会餐。由于上下一条心，使这次整编工作于四月十三日前全部胜利完成。

整编后，部队精干了，战斗力提高了。但是，缺员严重。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江苏、河南征集了两万名新战士补充部队。这些战士都是志愿入伍的，年轻体格好。有的是老解放区的干部，有的是翻身农民子弟。他们的到来使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大大改变了部队成份比例。看到这些新的力量，我无比高兴，他们一到驻地，我们就前去看望，在欢迎大会上，我们还亲自给他们佩戴大红花，发生活用品，使他们一到部队就在精神上、生活上得到安慰，感到大家庭的温暖！

新兵补入连队后，全兵团掀起了练兵热潮。主要是进行以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爆破五大技术为重点的军事训练。我和兵团司、政、后机关干部分赴各军、师指导训练，各军、师、团的领导同志也都把军事训练当做中心工作抓，深入训练场具体指导，亲自示范教学，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干部的这种行动，有力地鼓舞了战士的练兵热情。训练中，我们要求以老带新、包教包学、互教互学。通过示范教育和实地演练后，技术都有很大提高。同时，我们加强了对干部思想、作战指挥能力的训练。通过沙盘作业，研究战略战术的运用、部队兵力布置、火力配备、开进序列等问题，又通过实战演练，使他们基本掌握了战时指挥本领。

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后，思想面貌、技术、战术本领都有了很大提高。赴朝参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与日俱增。八月初，绥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派出慰问团，来兵团进行慰问。我和兵团的其他领导同志，陪他们看了战士们的射击、刺杀、投弹、战术演练等军事表演。他们亲眼看到战士们的精神面貌、技术本领，新的军民关系等，都称赞部队几个月来进步迅猛，一切都变了样，一个进步的新型军队出现了！

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中朝最高统帅部拟在冬季组织一次反攻，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迫使他坐下来谈判。党中央决定调几个军赴朝参战，充实志愿军的作战力量。八月二十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二十三兵团，我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边章伍、姚喆任副司令员，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王克俊任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李振智、潘瑞征任副部长。并要求我们在八月底，完成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主持召开了兵团的军政委员会会议，

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到十天，出国前准备工作完全就绪，只等一声令下，马上出发。

在这里，我需补充一点。部队准备入朝前，干部子弟的托管上学成为难题。我把部队东进前，傅作义先生拨给二十三兵团干部的福利费四十万元，在北京办了一个兵团子弟学校——绥光小学，后改名为曙光中学。

## 赴 朝 参 战

九月一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我兵团于九月三日，由沧州现地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命令中对兵团入朝后行军路线作了详细规定。还命令兵团副司令姚喆同志率必要的参谋人员、电台一部，提前于九月二日，由北京乘飞机到安东，与军委空军司令部后勤部政委杨尚儒同志以及空军联司进行会商，联系兵团入朝后执行修建任务等具体问题。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兵团军政委员会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进行了传达布置。同时，还派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袁庆荣率先遣队于九月二日赴安东，筹备部队驻房与入朝前的物资补充问题。我记得三十六军于九月三日早六时从景县乘火车出发，三十七军于九月五日乘火车出发，兵团直属队于九月八日下午五时乘火车出发。我们离开驻地时，受到了河北省委、政府、省军区领导同志和驻地群众的热烈欢送。当我们几个兵团领导路过天津、沈阳时，还受到当地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与接待。我坐在火车上，看到沿途各火车站，给部队准备了充足的茶水、饭菜，一些手持彩旗与鲜花的学生端茶送水，表示自己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敬爱



心情。

三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于九月七日车运到安东省附近的长甸河口。安东，与朝鲜一江之隔，三面环山，一面临鸭绿江，苍松翠柏，景色秀丽。但是，她被日寇的铁蹄蹂躏了十三、四年。解放不久又被美帝飞机轰炸得弹坑累累，房屋倒塌。联接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鸭绿江大铁桥也被炸坏。战争空气十分浓厚。从此，一切活动都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着投入战斗。

在这里，我们调整了部队开进序列，还请志愿军代表向部队介绍了朝鲜战场前线的情况以及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军政委员会听取了空军对修建三个机场的具体要求。同时确定三十六军率一〇六师及一〇七师之三一九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云山，进入价川之院里，担任院里机场的修建任务；三十七军率一一〇师及三二五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清城镇，进入龟城郡之南市郊，担任南市机场的修建任务；兵团率兵直及一〇七师（欠三一九团），一〇九师（欠三二五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龟城，进入泰川郡，担任泰川机场的修建任务。

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任务明确之后，即开赴朝鲜境内。我记得兵团的先头部队于九月九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向祖国告别，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尔后，各部队按照预定的行动时间和行军路线，分赴各修建机场的场地。我们进入朝鲜后，就碰上种种困难。如语言不通，道路生疏，敌机干扰，行动缓慢等。我乘坐的吉普车，在弹坑累累的公路上经常受阻。部队为防止美帝飞机袭扰，夜行晓宿。又加一出发就下起雨来，但干部、战士却个个情绪高昂，勇往直前，向目的地进军。兵团机关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克服体力差的困难，一时一刻不掉队，她们顽强的斗志，使我非常感动。我几次下车，劝他们乘坐我的吉普车，但他

们总是笑着挥手，大步追赶队伍去了。一路上，看到朝鲜人民的房屋被炸，人民遭受残酷杀害的凄惨情景都十分气愤；同时也被朝鲜人民的顽强斗争，保卫家园，支援前线所表现出的精神而鼓舞。

九月十八日前，各部队分别到达施工地，受到朝鲜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的欢迎。他们把修好的房屋，让给我们居住。朝鲜老乡，无论老幼，个个满脸笑容，热情相待。有的还把开水、饭菜送到部队驻地。我们的部队也马上帮助朝鲜人民抢修房屋，收割庄稼，很快建立了协同战斗的亲密友情。

为统一集中领导，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修建委员会。我任修建委员会主任，高克林同志任政治委员，姚喆及空军司令部后勤部政委杨尚儒、朝鲜检阅相金元凤任副主任等。九月十六日，修建委员会在泰川郡山城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司令部修建机场的指示及要求，并确定成立各机场修建委员会分会。价川郡院里机场为第一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一分会，代军长王建业任修建委员会第一分会的主任，张惠源任副主任，康健民任政治委员；龟城郡近郊南市机场为第二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二分会，军长张世珍任二分会主任，卫景林、冯梓任副主任，帅荣任政治委员；泰川郡之泰川机场为第三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三分会，兵团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王克俊任三分会主任，兵团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同志任政治委员，工程大队长王连峰、泰川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得兰任副主任，兵团干部部长吴中瑞任副政治委员。各分会设指挥部、政治部、工程部、材料运输部，分别贯彻执行上级施工计划、指示，保证施工质量和物资材料供应等。

院里、南市两机场于十九日开工，泰川于二十日开工。由于

我们广泛动员，合理组织劳动力出勤，南市、院里两机场每日可出工八千人，泰川机场每日可出工九千五百人。但是，由于部队行军疲劳未得到恢复，加以组织施工不严，分工不科学和工具缺乏，前三天不能按时完成每日施工任务，效率较低。为此，我们除电请志愿军司令部从速解决工具缺乏问题外，还发动广大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创造工具。经过大家的献计献策，制造出了用铁丝自织筛子，抬工架，草绳抬石筐，抽板装砂箱，在打洋灰时，开辟了水渠，以代替抽水机。仅泰川工区即自制工具六七四四件。这样既提高了施工效率，也为国家节省了财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部队战胜困难、争取早日完工的信心。

同时，我们加强对施工的领导，科学组织施工。组织成立了采石、筛砂、平整跑道、打水泥、装卸、运输各种专业队等。南市机场还创造了一元化的抬土法，使身材高矮与体力强弱协调一致。在采石上，如石场坚硬，就采用掘开采石法，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由小到大，由浅到深，或在石场内挖一条沟，使石子从上面流下，与沙土分开，既便采又便运。在人力运石上，倡导接力运石，各部队组织整连、整排的大接力，夜间挑运，白天将路铺平，并用石灰标好，积土区规定好记号，以免混乱误工。在汽车、大车运石上，明确任务，改进装卸使用办法。院里机场用三面装车法，比原来的装车时间缩短了二倍。南市采用循环装车法，装一车最快的只用两分钟。泰川采用接力传递装石草袋法，工效平均提高二、三分钟。在开凿山洞上，泰川找出死洞眼爆破性小，活洞眼爆破性大的规律后，费药少收效大。在打洋灰时，多搅拌少掺水，夯实压平，以保证质量。

在修建过程中，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带头出工，深入到施

工现场，就地指导。各军、师、团的机关、卫生所、文工团都搬到工地，演出文艺节目，鼓舞士气。炊事班把热饭、热菜和开水送到现场。这些大大鼓舞了部队的修建热情。他们把多担一担砂石，多打一块水泥板，看做是向美帝多射出一颗子弹。他们每天在太阳不落山就进入工地，第二天太阳升起很高才收工休息。我记得有一个连长在工地上劳动两昼夜还叫不回去休息。兵团后勤部刘双喜同志在装卸水泥时，衣服被汗水浸湿、磨破、手被碰伤，但仍不休息，一股劲用肩扛装卸水泥二十吨。采石小组，不畏艰险，由原来每人每天采石零点一五立方，提高到二点一立方。刘成义采石小组每人每天采石五点二立方，超过当天指标的三四倍；打水泥的小组在十三个小时内，打了十一个方格，提高工效两倍。我看到部队这种任劳任怨，不怕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心中无比激动和兴奋！

在修建机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棘手的是美帝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排除定时炸弹问题。在机场修建之始，兵团就着各部队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进行夜间施工等。修建一个月来，虽有飞机不断在机场上空侦察、盘旋，但均未造成太大损失。可是十月十八日九时三十分，价川郡之院里机场，突然遭到了美帝当时的王牌重型轰炸机B29九架的轰炸。他们分三个梯次，从八、九千米的高空进入机场工地上空，倾刻之间，成百吨的重磅炸弹，象流星一样倾泻下来，一时间机场上空飞机马达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炸弹的爆炸震得地动山摇，到处火光冲天，硝烟滚滚，尘土飞扬，新修好的机场水泥跑道，被炸得弹坑累累，工棚、木材等被炸毁燃烧，防空壕沟、掩体被震塌，里面掩埋了不少干部、战士，新修机场破烂不堪。但我们的战士并没有被美机的轰炸吓倒，待飞机刚刚离开机场上空，便冒着硝烟，

冒着飞机再度来轰炸和定时炸弹随时爆炸的危险，从四面八方奔向机场，展开了扑灭余火，抢救伤员战斗。他们拿起铁锹、镐刨开震土，有的人找不到工具，就用双手不停地扒，有的双手被石头磨破，流着鲜血，还是拼命地扒着，被炸弹声震得耳聋和负伤的同志也不下去息休。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将被土掩埋的数百名同志抢救出来，送至安全地带。在这场战斗中，干部、战士齐心协力，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本色。

美机轰炸，广大指战员看到一个月的劳动毁于一旦，十分伤心。但是，他们怀着“你炸你的我修我的”，“敌人有钢铁，我们有石头”，“修好工程，誓为死者报仇”，“上刀山，下火海，不修好机场不下战场”的豪情壮志，于第二天晚上，精神抖擞，浩浩荡荡地开赴机场工地，抢时间恢复修建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九时三十分，二十二日八时四十分，兵团所在秦川郡秦川机场和龟城南市机场，都遭到美机B29重型轰炸机各九架的轰炸。一周以后又有成批的敌机进入机场上空轮番轰炸。据当时不完全统计，美机共向我三个机场投下炸弹四千九百二十五枚，定时炸弹一千九百二十五枚，我伤亡数百人。

美机投下的定时炸弹，不断在机场内爆炸，时刻威胁着广大干部、战士的生命。排除定时炸弹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我十分焦急。十月二十四日，我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排除定时炸弹的措施。决定加强防空，增挖、修整防空壕沟、掩体，禁止人员、车辆白天进入机场施工，组织力量排除定时炸弹。院里机场一个营长带领三个战士，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才将落在机场水泥跑道上一颗定时炸弹挖了出来，司令部专门进行了总结，并通报各部队，立即组织挖掘定时炸弹的突击队。部队、机关迅速行

动起来，积极踊跃地参加。文工团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也报了名。有的咬破手指写了“挖出炸弹，为死难烈士报仇”的血书。有的表决心要在挖弹中立功当模范，争取入党。

根据当时情况，我们着每团成立二至三个突击队，每队约五六十人。每个突击队分侦察、挖弹、爆炸三个组。侦察小组从工兵中选择三至五名有经验的人组成，负责勘察每个定时炸弹的准确位置、深度，判明它的危害程度，并用各色旗子作出标志。例如，把在一天内将要爆炸的定时炸弹插上红旗，表示随时可能爆炸，不准人员接近。炸弹爆炸时，对跑道和施工影响不大的插上黄旗，表示不用人挖取，待它自行爆炸等等。水泥跑道及附近的定时炸弹，又不会马上爆炸的，爆炸组一定把炸弹就地爆炸。或是将弹体拉至预定地点，放在挖好的弹坑内引爆。许多同志坚持几个小时不要别人替换，肚子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直至挖出炸弹才稍事休息。有的特型重磅炸弹入地深达三米，他们往往费时二、三天才挖出。有的炸弹突然爆炸，许多人牺牲、负伤。但他们没有人打退堂鼓，没有人被困难所吓倒。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中，共挖出定时炸弹九一五枚，有效地避免了人员、物资的损伤，保证了工程的如期完成！

由于兵团广大干部、战士的艰苦奋斗，南市机场于十月二十日，泰川机场于十月二十九日，院里机场于十一月四日，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共投工一百零七万一千四百个。完成跑道三条，各长二千公尺、宽六十公尺。停机坪八个，共长一千五百公尺，宽三十公尺，滑行道、联络道共长九千四百三十七公尺，推机道长八千七百五十四公尺。飞机掩体一百九十三座，以及各种附属工程三十余项。

在整个修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革命干劲和英勇无畏的精

神，对我教育很深，有几件事至今难忘：一、在排除定时炸弹时，突击队给我的印象是：钢铁的战士，钢铁的兵，他们的意志比钢铁还硬；在修建中他们的情绪之高，士气之旺盛，是我在旧军队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尤其是绥远起义的干部、战士，在修建机场中往往起着骨干和支柱作用。我看到这种情景，使我感奋不已。

二是有一次美机投下了一颗重型定时炸弹，埋得很深，挖了好久还没挖出来。我怕出意外，就亲临现场指挥。挖弹的干部、战士一看我来了，立即把我拉到远处，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说：“出了问题我有责任。”战士们说：“你是首长，我们有责任保护你。”硬是不让我靠近。干部、战士这种高度自觉的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三是在修建机场中，朝鲜人民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在开工之初，价川、龟城、泰川郡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场址选在哪里就在哪里建，哪里有砂石就在哪里挖，在土地十分奇缺的情况下，他们把最好的水田交出修建机场，有的稻子还未成熟，就提前收割，给我们创造了修建机场的有利条件。尤其是价川郡院里机场被美机轰炸后，附近的人民群众，将自己剩下的几间破烂房子腾出来让伤病员住，拿出鸡蛋、母鸡给伤病员做可口的饭菜；给伤病员洗血衣、端屎端尿，晚上轮流看护，有的怕伤病员苦闷，就唱歌、跳舞、讲故事以减轻痛苦。这些充分体现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

## 光 荣 的 勋 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原拟定在我们修建机场的

任务完成后，调我兵团到东海岸前线，参加同美帝直接作战的光荣任务，并令我们派人去东海岸前线的四十、四十七两军参观学习。经过兵团军政委员讨论，派兵团副参谋长袁庆荣，三十七军副军长冯粹率领兵团、师、团及机关指挥员一百余人，前往参观学习。他们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到泰川兵团驻地，向我们汇报了前线作战的情势和经验。

部队在修建任务完成之后，就地进行了休息整顿，总结评比工作。我们兵团的几位领导同志，将三个月来修建三个机场的工作情况，给志愿军司令部和华北军区写了一份总结报告，并报告朝鲜人民政府。他们接到报告后，当即发来贺电，向我们表示祝贺。中央军委的贺电是：

“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地完成了任务，甚好。”

华北军区的贺电是：

“部队经过此次修建任务的锻炼与考验，涌现了很多英雄，情绪更加旺盛，斗志更加坚强，部队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觉悟有显著提高，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各种工作有了成效。对全体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胜利完成任务，特致热烈的祝贺；对在修建中牺牲的烈士，致以哀悼；对负伤的同志，致诚挚的慰问。望在部队中很好宣传这一胜利，并做好评功工作，以激昂斗志。对牺牲烈士做好登记，转知地方政府及其家属；对伤员、病员做好慰问工作，为部队进一步提高，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还授予我、高克林、姚吉、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等六人一



枚自由独立二级勋章，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信的原文是：

你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为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授予自由独立二级勋章各一枚，以表示朝鲜人民之热爱和感谢。并望再接再厉，为争取朝鲜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结束而努力。

此致

敬礼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

金科奉

以上这些祝贺和勋奖，是给予全兵团的荣誉。她是全兵团指战员艰苦奋斗，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换来的，功劳应属于英雄的战士！功劳应属中朝两国的英雄人民。

部队在休息整顿之后，又开始了军事训练，时刻准备着开赴东海岸前线直接参加战斗。其时朝鲜人民军和我志愿军密切配合，曾发起多次反击，扭转了战场的局势，板门店谈判对我方十分有利，朝鲜停战指日可待。党中央、军委根据战场局势的变化，于十一月底命令我兵团回国整训。这一命令传达后，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想不通，不愿回国。有的写血书要求留朝参战。经我们在部队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才使干部、战士想通了道理，准备回国。

我记得兵团于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先后由朝鲜北部

之秦川、龟城及院里出发，分两路徒步行军回国。兵直、三十六军从新义州过江到安东；三十七军从清城镇过江到长甸河。十二月五日，全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登车，于十二月十一日胜利回到河北保定地区定县。从此，我们在这里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 从二十三兵团到六十九军

定县，位于石家庄市和保定市之间。京广铁路从县境内穿过，人口众多，文化教育，农业生产较为发达。兵团机关驻在定县尧房头村，各军、师、团分别驻附近地区。在这里，我们开展了三反运动，部队缩编，军事训练等一系列工作。

一九五二年一月份，兵团遵照党中央、华北军区的指示，结合我兵团的具体实际，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我记得运动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检查领导，以反官僚主义、反浪费为重点，为反贪污做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是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打贪污大老虎高潮；第三阶段是定案处理与思想建设。广大官兵经过深入动员后，士气旺盛，积极投入战斗。有的贪污分子主动在大会、小会上坦白交待。大到万万、千万、百万元，小到一双鞋、一块胰子，都做了交待。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刘澜涛副政委，对我兵团的运动十分关心，多次给予指导，要我们做到：党内从严，党外从宽，对起义干部思想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民主运动后从严，民主运动前从宽；追脏定案从严，计算时间从宽，退脏处理从宽等。帮助起义干部过关。我记得，当时划定的贪污计算时间由原定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起义之日起，后推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份政治工作制度建立之日起计算。这样就将贪污千万元以上的人数大大减少。在追脏

定案时，一九五一年三月民主运动前，既不追脏又免于刑事处分，以体现党以教育改造为主和治病救人，宽大为怀的政策。这样做，处理面缩小了，有小毛病的人，欢呼庆幸。一些起义干部更深刻体会到毛主席、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关怀和宽容。

在三反运动之初，我想将起义前的经济情况向党组织讲清楚。但因爱虚荣，顾面子，既想交出财产，又顾虑以后处世、做人。内心思想斗争很剧烈，有时真是晚间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说话张不开嘴，走路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在兵团机关帮助工副科长的会议上，我亲身听了同志们对他的批判教育，也使我深受教育，觉得再也不能让经济上的问题压我了。二月五日，我在兵团军政干部汇报会上，几次想讲话，但话到嘴边又难以说得出口。后来我把过去的经济问题仔细地反省了一下，写了个明细材料，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深刻检查。在这个材料中，我将在起义过程中伪中央拨给绥远部队、地方款项，“九·一九”起义后剩余的二千九百多两黄金，一一做了说明：在我东进时，以安置部队干属就业用为名，留给孙兰峰先生九百二十两。到龙华后的一、二月份，交给兵团后勤部一千一百两。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折合五百两，做为兵团的家底。民主运动后，使我在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交出四百两。兵团的绥光小学盖好教室后，我又交出三百两让他们给教师盖了宿舍和大门。此外我还将几处小买卖做了说明：在抗日战争前，共有一万元积蓄。我写了一张清单，其中给我母亲二千元养老费，老伴二千元生活费，一男二女各二千元教育费，自己准备随时牺牲在战场上。不料经理人竟以此为资本，开办小买卖，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七个。公私合营时，我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使我甩掉了思想上的包袱，思想觉悟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但是，在三反运动中，也有一些“左”的过激行为。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他和杨成武同志谈话时也曾谈到过。

总之，应该肯定，三反运动对我兵团是一个彻底解放军化的改造运动，是真正的大整军运动。旧社会遗留的旧的思想行为，以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得到不同程度地扫除。全体官兵思想上受到了深刻教育，各方面呈现出新气象。

兵团在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军委精简紧缩，增强国防建设的指示进行了整编。在此之前，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提议：把部队改成建设部队，从事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这样做对国家有很大好处。这个意见我也向高克林同志谈过。后来他告诉我说：“这样做不行，上级不同意”。既然上级不同意我的建议，我就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

我记得整编的情况是：以三十六军的一〇七师及三十七军的一一〇师合并编为重装师。番号是一〇七师，下辖三一九、三二九、三三〇团。以三十六军一〇六师、三十七军一〇九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一、二师，拨归中央财委建制。以一〇八师及一一一师与龙华留守处合并编为兵直学习团，原番号一律取消。三十六军、三十七军军部拨归中央财委，编为建筑部队。兵直按军部的机构编成，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管部，还有军法处、警卫连、通信连、后勤医院、运输连、修械所、野战仓库、驻京办事处等。兵直教导大队改编为速成文化小学。此外，中央军委将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拨二十三兵团建制。一〇七师和二十八师的各团，各以一个建制营互相调换。

编成的工程一、二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三十六军代军长王建业、三十七军副军长卫景林的带领下，分别开赴河北定兴、

北京通县两地区。临出发前，我和高克林、裴周玉、袁庆荣特意给他们写了一封慰问信，希望他们保持光荣，爱护荣誉，加强学习，每个人都成为掌握专业的技术工人、工程师与技术专家。

拨归我兵团建制的二十八师，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锻炼的老部队。具有不怕牺牲，肯打大仗，敢打硬仗的优良传统。他的前身是一九三八年组织的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而这个纵队是以一二九师李聚奎同志及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在鲁西北、冀南地区抗战老人范筑先所部组织的群众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四〇年改编为冀南三分区新八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二纵队四旅，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正式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该师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经历大小战役、战斗二千三百九十三次，歼灭日伪军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八人。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时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的上党战役、进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后作战和进军大西南等。这支部队编入二十三兵团给兵团增添了新的血液，更加强了战斗力。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刘澜涛四位领导共同签发命令。根据部队今后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决定撤消第二十三兵团番号，改为军的番号。原二十三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六十九军军长，并定我为正兵团级，裴周玉任政治委员，马卫华、张世珍任副军长，曾威任副政治委员，袁庆荣任副参谋长。从此，绥远起义部队实现了解放军化，我和他们率领六十九军开始了正规化的建设。

中央军委定我为正兵团级后，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毛主席见到我时，问对任六十九军军长职务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接着对我说：“按照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直接带兵，不离开老部队，有职有权。当军长好！”

# 原国民党三二〇师起义、整编、 抗美援朝经过

行 定 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国民党驻绥远部队在董其武将军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我当时在“华北总部归绥指挥所”工作。一九四九年底指挥所撤销，我被分配到原国民党一一一军三二〇师工作，现将我所在的三二〇师起义、整编和抗美援朝的经过概述如下：

## 一、基本情况

三二〇师是一九四八年底新成立的部队，其成份是由绥远省地方部队和一部分游杂部队组成。师长马逢辰，副师长张型，参谋长王××，该师辖九五八团“团长郑文华”，九五九团“团长卫刚”，九六〇团“团长王增盛”等三个步兵团。马逢辰是傅作义守涿州的老人，行伍出身，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多年来不在傅的正规部队工作，一九四八年傅部势力伸向华北五省，四八年我军将傅嫡系部队大都消灭在北平附近，傅要在绥远扩充部队，因而又起用他充任师长。马有一般旧军人作风，对上级较能服从，而且多年来脱离部队，本身没有基本干部，因此，给刘万春造成安置亲信的有利条件。一九四九年春，九五九团在和林县活动时，卫刚曾计划率部起义。后

仅带了几个人到了解放区。刘万春便委派他的旧部梁兴充任九五九团团长。刘万春为了更牢固地掌握这个师，一九四九年又将一一一军军部学生队负责人原炳耀充任该师参谋处长。并将原十七师他的旧部刘万福委为师部政工处主任，营连长也委派了他的一些旧部，同时又将学生队一部分学员充当师、团政治处和连队的政工人员。因而这个师可以说是刘万春的基本部队。

## 二、起义前后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后，三二〇师和三二一师相继西撤后套陕坝附近。九月十九日马逢辰曾在起义通电上签名。起义后，刘万春立即赶往陕坝，亲率三二〇师郑、梁两团向宁夏进军，师长马逢辰、参谋长滕德钦随刘前往指挥部队。同时派人指示李骥程积极与马家取得联系。据滕德钦说：刘曾有这样的设想：起义后董其武仍任绥远省主席，他本人系回族，部队到宁夏后，首先收编马家军队，他任宁夏省主席，邓宝珊任甘肃省主席，这样甘、宁、绥就连成一片了。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因而当时刘又提出“宁绥一家，天下回回是一家”的口号。刘的这个幻想，由于我西北野战军迅速地解放了宁夏全境，马鸿逵部全部被歼灭而成为泡影。李骥程也由银川逃回绥境，刘万春等人到达三盛公以后，被我军阻止，不能再往宁境前进，在那里停了二十天左右，于十月份又返回陕坝。

三二〇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坚决反对起义，想方设法破坏起义的。他们曾以“反共救国青年团”的名义，油印反对起义的传单和标语，张贴在陕坝市内外，进行反对起义活动。

起义后，该师领导人奉刘万春的指示，想方设法保持这部分



武装力量，阻止解放军化，实质就是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他们知道我军对战士要进行“诉苦运动”。因此，在我政治干部未到部队之前，他们就急急忙忙地进行所谓“诉苦运动”。士兵们在原来的军官主持下进行“诉苦运动”，他们该诉谁的苦呢？一九四九年底我政治干部到师以后，他们声称士兵们已进行了“诉苦运动”，不用再进行了。

三二〇师起义以后，士兵中有的开小差回家，有的原系惯匪，因而也有携械潜逃沦为匪徒者。当时九五九团有一个中尉排长贾恒升，曾率全排三十余名战士携械叛变，逃跑在伊盟地区没穿上棉衣，因衣物食宿问题难以解决，所以他们又自动的返回部队。梁兴将贾恒升扣捕送交师部，马逢辰等人将贾暂押禁闭室，说是另有他用。十二月份解放军派的政治干部到达师部以后，他们便使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提出要枪毙贾恒升，使政治干部初到就和起义官兵隔开一道鸿沟。政治干部以部队虽然起义，但还没有进行整编，贾恒升又能率全排战士自动返回部队，因而应按不咎既往，从宽处理，这样他们的阴谋又未能得逞。

### 三、改编过程和人员配备

绥远起义部队约有官兵五万人左右，于一九四九年底开始整编，当时决定军事干部由起义人员充任，政治干部由华北军区统一委派。十二月份政治人员开始进入部队，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三十六和三十七两个军，每军辖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原一一一军改为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我所在的三二〇师，改编为一〇七师，师长马逢辰，副师长韩天春、张型，参谋长滕德钦，副参谋长孙柏绿。师辖三一九、三二〇、三二一三个团和师直小

部队。三一九团团团长郑文华，副团长孔景高，参谋长王锡正，政委王友一，政治主任×××（失记），三二〇团团团长梁兴，副团长贾××兼参谋长，政委郭振邦，政治主任赵某，三二一团团长李民济，参谋长廖献礼，政委苗树森，政治主任陈琦。每团辖三个步兵营和团直小部队，每营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各营连有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各一人，师、团政治部虽都配备有政治干部，但为数不多。因而在这样复杂的部队短期内要真正做到解放军化，确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任务。

#### 四、一九五〇年参加生产情况

一九五〇年三月底一〇七师改编完毕。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军、师、团都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政治干部和军事人员共同组成。这本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但那时一〇七师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及其他反动分子，却利用这个合法的机构与党争夺部队领导权，他们尽可能多地让军事人员参加该机构，以争取多数，便于他们左右会议，控制部队，当时他们在部队还散布了许多反革命言论，阻止部队解放军化。突出的有这几种言论：一是“借水养鱼、等待时机”；二是“整体进步、反对突出”；三是“真落后比假积极好”；四是“老实人落后、投机人进步”。因而部队改编后，一〇七师进驻中滩地区，叛变与反叛变就成为该师非常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部队整编后，我师奉命参加生产。当时上级给我师规定了两项生产任务，一是在中滩开荒种地；二是在黄河以北修筑防洪提坝。生产地点军部确定我师在中滩公庙子附近，这个地区距包头五原各二百四十华里，北靠乌拉山，是绥远多年来惯匪经常出没之

地。刘万春将郝游龙部派驻在公庙子（有人说郝是刘的干儿），又将他军部警卫、工兵两个营也驻在中滩外恒号。在部队驻地问题上，师部一些军事领导人以中滩地区居民稀少，部队驻房困难等等为理由，要将全师驻在汽路以北靠近北山地区。当时我师的工地在公路南边，珊瑚河以南地区，部队若驻在公路以北，远离工地二、三十里，怎能种地筑坝呢？政治干部说明部队驻地远离工地几十里，无法参加生产，使他们理屈，只好同意部队驻在珊瑚河以南工地附近。

四月十日左右，我师由陕坝移往新驻地，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工作。他们又在生产和其他问题上进行捣乱和破坏。生产上调人，他们不给；生产任务的分配上，他们百般刁难；筑坝工程，他们不按规定的尺寸修建，致使因质量不合格，而交不了工。在播种时，有的根本就不下种籽；有的虽下了种籽，但事先将种籽煮熟了才下种，致使不能生芽。

## 五、反叛变斗争经过

一〇七师从改编之日起，整个一九五〇年就是叛变与反叛变斗争的一年。开始叛变分子是搞秘密串联，五〇年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绥远起义部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认为叛变时机成熟，因而便开始行动，曾发生了多次的叛变事件。乌盟西公旗保安二团团团长卢万辉于五月二十六日率部叛变。这些叛变分子大白天明目张胆地从我师营房东边向北山逃去。师长马逢辰等人不加阻止，一〇七师原炳耀等人不仅在积极地策划组织叛变，还想方设法掩护、支援叛变部队。卢万辉团叛变的当天，原炳耀就以作战科长的身份召集师直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未通知政治干部参加）。

原炳耀竟然说：如果叛变部队来到我们师部，也只是为了抢些弹药，决不伤人，为了避免人身伤亡，他们来到后，我们一律不要出宿舍。他的话立即遭到同志们的反驳，并且提出质问说：我们是解放军，怎能不抵抗而将弹药拱手送给叛军，这算什么样儿的部队。同时又有人质问他：他们既然是叛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怎能保证他只抢子弹而不伤人呢？难道说他能听你的指挥吗！问得原张口结舌，无言对答。最后大家决定：叛军如果来到师部，师直属部队一定要坚决抵抗，彻底消灭。

卢万辉团叛变之后，我师直部队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策划组织进行了两次叛变。

一次是师直通信连骑兵排的叛变事件。当时正是放青季节。我师马匹都在珊瑚河以南黄河以北河滩放牧，有时也到黄河南放青。但当时师领导和通信连长黄锐峰私自决定，马匹放牧回来不圈在师部，而是圈在师部北边三华里处牛犊庄。有一天，骑兵排带上全部马匹逃跑到北山，后来才找了回来。

第二次是警卫连以几个曾是惯匪的士兵为首，组织了二十多个人准备叛变，他们推选了“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等人选，他们在组织叛变过程中，有一次夜间正在开会，被运输连排长李国才发现，李报告了师领导，师党委结合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以团结、改造稳定这支起义部队出发，作了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将那个“司令”予以镇压。其他人从宽处理。

原炳耀组织叛变，是一〇七师范围较广，人数较多，有计划的一次叛变事件。而且在未暴露之前，他们在全师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刘万春和师某些领导，采取公开支持的态度，有的公然出面大骂反对原炳耀的人是“投机分子”，出卖整体的人。原炳

耀在这些人的支持鼓励下，以作战科为基地，在师直各科网罗了一些骨干分子，组织串联了一些营连长，草拟了叛变行动计划。原炳耀也将他女人由包头接到公庙子，待机行动。

一九五〇年卢万辉叛变之后，三十七军一一一师副师长庞茂青、师长张璞迫使我党进入该师的政治干部，全部撤出部队。继而庞又率一部分人叛变。原炳耀等人也想效法一一一师的作法，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妄图也将我师政治干部赶出部队。师党委的对策是环境再恶劣也要顶住，决不撤离部队。但那时政治工作干部和靠近党的起义人员，处境十分危险而艰苦。有一个时期同志们夜间都不敢在室内睡觉，而是躲在野外或其他地方。刘万春曾亲自出面向慕湘政委威胁说：现在特务活动很厉害，到处暗杀人。

一九五〇年七月份以前是部队最混乱和反动分子最猖狂的时期，七月份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广大起义军官与战士要求进步的愿望更为强烈了。同时绥远军区学习团分配来一批结业学员，这些同志学习后思想觉悟都有所提高，有的同志还加入了团的组织。一些受骗的人，思想认识也有所转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开始感到自己陷入反革命圈套，因而有些人不同程度地向党检举揭发了原炳耀等人的叛变活动，表示向党靠拢。这样原炳耀等人的反革命市场日益缩小，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也开始暴露在群众面前。

原炳耀等人在上述不利的形势下，其反动气焰毫无收敛，还是积极地物色叛变人选。他们认为贾××去年起义时曾率部叛变，便派人去联系。贾是贫农出身的穷孩子，深深感激上次事件党对他的宽大处理，经过半年多的学习，认识到今后跟党走方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因此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检举揭发。那些去串联贾的人也承认了事实，而且进一步揭发了原炳耀的叛变活动。慕

湘政委多次长时间地向原说明了党的政策，严肃而诚恳地指出了他的出路，原在此众叛亲离的形势下，部分地交待了他的叛变活动。对一些参与叛变活动的营连长，让他们暂时离开连队，到师部交代问题。经过学习和领导多次谈话，使他们确实感到共产党对他们的挽救和温暖，原炳耀又作了些交代，其他一些师直干部也都作了交代和揭发。他们在这样形势与事实面前，也各自作了交代。由于态度较好，在此基础上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反叛变大会。

反叛变斗争是我师接受党的领导和开始自我改造的一个转折点，参与叛变活动的人大都有一定的悔改表现，有的人痛改前非，真心实意地接受党的领导，认真地改造自己。原炳耀反叛斗争后，表示愿到学习团学习改造，但他到学习团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结果二罪归一，于一九五一年被绥远省人民政府镇压。

## 六、部队东调和民主运动

我师决定参加抗美援朝，必须先将部队调离绥远，进行必要的整顿和补充，方能入朝参战。于十月份我师首先由公庙子移驻包头西四十华里麻池地区，清理准备部队东调的一切事宜（刘万春案件就是这个时期处理的）。

一九五〇年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之后，直接归绥远省军区领导，为了参加抗美援朝，绥远起义部队又成立了二十三兵团部，司令员董其武，副司令员姚喆、边章武，政委高克林，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兵团部在部队东调前组成，因而部队到达河北之后，兵团就直接归华北军区领导。这时我军、师领导干部也稍有变动。刘万春被扣，由王建业代理军长，张型自行离队后耿光英调任我师副师长，我师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九两日，由包

头分乘火车经丰台、天津到达新驻地沧州地区。师部驻城东南大葛村，各团驻大葛村附近各村庄。到达新驻地后，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克服干部战士恐美崇美思想。

一九五一年二月，首先由兵团党委向全兵团师以上干部进行了动员，接着各师团党委分别向全体干部战士也进行了动员。这样我们全师就开展了民主运动。当时提出了反军阀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响亮口号，要求部队迅速解放军化。

我师这次民主运动虽有些小的曲折，但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在运动整个过程中还是健康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为我师解放军化奠定了牢固的可靠基础。经过学习批判，大多数同志提高了思想认识，基本分清了两军军队的不同本质。干部战士普遍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些落后的群众也感到形势逼人开始要求进步向党靠近。因而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要求进步接受党的改造，成为广大干部的一致行动。当时许多干部曾提出比工作、比学习，比进步的倡议书。

民主运动结束后，我兵团二次又进行了整编，干部也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配备。全兵团骑兵部队一律撤销，所有干部战士都并编在三十六、三十七两个步兵军。三十六军骑兵旅并编我一〇七师，师长马逢辰调兵团教导大队学习，尔后转业到河北省人民政府工作。原一〇九师师长温汉民调任我师师长（编者按：董其武同志文章中由段吉祥代理师长），原三十六军骑兵旅副旅长田绥民任我师第一副师长，原一一一师副师长沈金声任我师第二副师长，耿光英任我师副师长；三一九团由一〇八师团长柴映堂接充，参谋长由骑兵旅团参谋长张悦民接充；副团长贾××调走，由骑兵旅副团长罗××接充；三二〇团由骑兵旅副参谋长罗锡庚接充。三二一团团长仍

系李民济，参谋长廖献礼。政治干部也作了较大的调配，慕湘同志仍任师政委，原骑四师骑兵旅政治部主任贾汉英调任师政治部主任，三二一团政委苗树森同志提为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

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我师又进行了审干和镇反学习，清洗了少数坏分子，并召开大会控诉了这些坏分子的种种罪行。同时对干部中年岁较大的不适于在部队工作的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对其中一些老弱病残者，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和复员工作。这样一〇七师就基本解放军化了。开始补充兵员进行战备训练，准备参加抗美援朝。

我二十三兵团决定入朝的部队是一〇六、一〇七、一〇九、一一〇四个师和兵团部以及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部。当时华北军区决定我三十六军一〇六、一〇七两个师的兵员由安徽、湖南两个省补充。新战士接回后，驻在衡水西三十华里的贡家台附近各村庄，军部在贡家台设立了新战士接收分配站，华北军区派政治部民运部范部长参加领导，军部参加的有副军长张惠源，副参谋长李骥程，一〇六师参加的是副师长魏以全，一〇七师领导派我参加，负责新战士的接收分配工作。经过补充，我师战士达到满员。这次入伍的新战士，大部分是经过土改翻身的贫下中农子弟，因此，我师战士的成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尔后我师完成各项任务，起到保证的作用。为了表示我们这支部队已经完全解放军化了，由兵团首长给我师举行了隆重的授军旗典礼，这样全师的干部战士感到无限的光荣，纷纷要求早日入朝参战，打败美国狼。我师接收新战士之后，由师拟定了统一的军事训练计划，从五月中旬开始至八月底，各连队积极地进行战备训练。在这期间，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巡回汇报团，曾到我师向干部、战士作了实战情况的报告和他们在战斗中的英雄事迹，大大提高



了部队的士气，增强了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克服了个别人的恐美崇美思想。同时后勤部门也加紧进行入朝的物资准备工作。八月底我兵团的战备训练和物资准备工作均基本完成了。

## 七、抗美援朝经过

全师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备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是雄纠纠气昂昂，要求早日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鬼子。

我师奉令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出发入朝，按三一九、三二〇团、师直、三二一团的序列分别在衡水、清风店两个车站乘车。师直是九月二日在衡水车站乘车出发的。在入朝前经德州、天津、山海关、大虎山、辽阳至终点站长甸车站下车。当天夜宿上河口，第二天白天休息了一天，夜间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第一天宿水丰。到朝鲜境内后，部队就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美帝飞机时有扰乱，但我师始终未受到任何损失。我奉命率参谋、翻译及各团人员白天行军打前尖，负责分配各团及师直各单位宿营地。大部队夜间行军，天明前到达指定地点宿营。沿途也很平静，但不时发现有特务分子打信号弹的。我师经朔州、大馆、龟城、最后到达目的地平安北道泰川。

我师入朝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泰川修建飞机场，三一九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院里与一〇六师共同修建一个飞机场。我师直和三二〇、三二一两个团及兵团直属部队与三十七军一〇九师的两个团，归兵团直接指挥，共同在泰川修建一个飞机场。地址在泰川南约五华里的大青江北岸，机场规格跑道二千公尺长，六十公尺宽，还有指挥塔，停机坪，机窝等设施。当时具体任务分配是：我师从东起，一〇九师从西起各修建跑道九百公尺长，

兵团直属部队在中间修建跑道二百公尺，在各自修建范围内的辅助设施，由各承建单位分别修建。在我们部队到达之前，工程技术人员早已勘测完毕，并绘制好图纸，规格和要求也在现场标明。当时除总工程师外，我师配有两名工程师和几个技术员，负责现场的工程技术指导。我师与他们密切配合，尊重他们的指导，从而保证按期按质地完成了分配给我师的工程任务。当时师领导为了更好地联系，并便于指挥修建部队和及时解决问题，在现场设立了工地指挥所，指定由我负责率参谋贾守城等二人白天黑夜住在大清江南岸架设的帐篷内，作为工地的指挥机构。

我师于九月十日左右到达泰川。这里于一九五〇年冬曾一度被美帝侵占，在此期间有些地富反动分子，曾投靠美帝充当朝奸，惨害人民。我志愿军五一年收复泰川，美帝逃窜时，这些民族败类，有的随美帝南逃，有的留在当地逃入深山密林沦为匪特。我师入朝初期，美国鬼子的飞机经常昼夜在泰川上空扰乱，夜间我们驻地周围及机场附近山林内暗藏的匪特时常发射信号弹。因此、我师为了部队的安全和保证机场免遭敌机的破坏，决定首先清除附近这批暗藏的匪特。师领导决定组成搜山部队，由我和地方干部率领，进行搜山。半个月时间，前后搜捕了二十多名匪特，交由地方处理。从此我师驻地周围直至我们离朝回国，很少有发射信号弹的现象出现。我师到达泰川以后，略加休整，作了些物资准备，随即投入紧张的机场修建。为了加快工程速度，首先要保证干部战士的全出勤。部队的各项勤务工作，由体弱者和妇女同志担任，如工地的日夜警戒均由宣传队女同志值勤。就是炊事员、饲养员也抽调一部分参加工程建设，这样就保证了干部战士全出勤，加快了工程的速度。

经过全兵团同志的紧张修建，十月中旬前已将机场跑道修建

完毕。十月中旬一天的下午，忽然一架美帝鬼怪式飞机在机场上空凌空而过，那时我机场也有雷达设置，并派有高射炮部队掩护机场安全。每次美帝飞机来袭击时，雷达都事先发出警报。而这次却没得到警报，一位工程师告诉我：这架飞机是从山沟内钻出来的照象走了。恐怕不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机场，我们要注意。果然第三天下午，美国鬼子派了九架 B 二九轰炸机飞临机场上空，投掷了一千三百多颗定时炸弹。当时我和一位工程师听到空袭警报后，进入我师机场的防空壕内。投掷时，我说没投在跑道上，工程师说在跑道上。结果飞机走后我们到现场一看，确实都投在了跑道上。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立刻到了现场。机场总指挥部通知慕政委连夜到兵团部开会。贾主任当即命令我首先亲自查看汽路上有无定时炸弹，以保证首长的安全。我迅及查看了汽路，并清点了我师工地的定时炸弹数目，两小时后就开始连续的爆炸。慕政委在兵团开会之后，当夜就召集各团团长、政委以及师部科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了兵团会议决定，并对我师工程进行布置，要求各团当夜传达。次日天明，就按布置开始行动。当时兵团认为定时炸弹虽然对人员的伤亡率不大，但对建筑物破坏性很强，而且投弹后爆炸时间需要一星期之久，若等待定时炸弹自动爆炸完毕后再进行修建，势必将整个跑道破坏，连地基也松动了，不仅工程不能按期完工，工程质量也不能保证。因此，兵团决定工程仍要照常进行，不准停建，各部队应立即组织人员挖掘定时炸弹，师领导当即命令我负责组织人员挖掘，并决定师直各团先各组成一个小组，黎明前到达工地，进行挖掘，吸取经验。次晨，师警卫连赵副连长和三二一团姚弟渤营长各带一个小组到了机场。我为了取得经验、将这两个小组合并为一个组，由我和姚、赵二同志亲率小组在机场东边汽路旁边挖了一颗定时炸弹，

约需一个小时就顺利而安全地挖出来了。随后三二〇团罗副团长也带一个小组到达机场，我们将挖掘的经过向罗作了介绍，同时我将挖掘的地区给师直和各团作了具体的划分。在对挖出来的炸弹，领导研究决定进行引爆。因而我们又另行分工，两个团专门挖掘定时炸弹，放在指定地点，师直不再挖掘而专负引爆定时炸弹的任务。当时我师在大清江南岸空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将挖出来的定时炸弹放在坑内，绑上黄色炸药进行爆炸。开始我们是两个战士抬一颗炸弹（二百磅），这样速度慢，而且两个人行动不一致，因而有的战士就自报奋勇，要求一个人扛，师司令部饲养员段明远同志一个人就扛过一二百颗炸弹，尔后荣立二等功。我师广大干部战士，在挖掘和引爆定时炸弹过程中，都充分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在短时间内把一千三百多颗定时炸弹全部消除了。

类似上述我们这支经过党的团结、改造、教育而成为真正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听党的话，不怕苦、不怕死的事例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叙述。

前次美帝B二十九轰炸机投弹后反航时，途中被我军击落几架。因此，美帝再不敢白天向我机场投掷炸弹，但随后夜间又投过几次炸弹。美国鬼子的飞机夜间投，我英勇的战士们白天挖，他们投多少，英雄的战士们就挖多少，引爆多少。我师挖掘引爆定时炸弹过程中，曾牺牲过两名战士，他们的热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凝固着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整个工程进行当中，干部战士都集思广益，开动脑筋，改革工具和操作方法，以加快工程的速度，如三二一团排长张立同志，他感到用担土筐子装倒土都慢，他改制了一种筐子式样，经过实践装倒土速度都快，而且所用柳条当地就有。干部战士夜间

编筐，白天使用，很方便。我师即把这种筐子命名为“张立筐子”，加以推广，从而加快了整个工程的进度，张立尔后也荣立三等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师修建的飞机场工程基本完成。部队原奉命在朝鲜过冬，随后部队又奉命回国，回国时，未走原来去的路线，而是经龟城、新义州过鸭绿江到达安东。当时我们在朝鲜北部已基本掌握了制空权，因而部队没有夜间行军，而是白天沿公路到达安东的。我师乘火车到达新驻地定县。师部驻城西十里的东西甘德村，各团也驻在甘德附近各村庄。

## 八、三反运动和部队再次改编

我师到达定县以后，总结了抗美援朝工作，评选了有功人员，召开了全师的庆功大会。华北军区派丁黑部长到部队进行了慰问活动。并参加了庆功大会。春节后，我师就开展三反运动。首先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成了各级三反委员会。先党内后党外各级都进行动员报告，从而三反运动在全师范围内展开。在运动过程中，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一再放宽，如开始贪污数字以起义之日算起，尔后改为政治干部到部队后才算，最后放宽从民主运动后，部队基本解放军化以后有贪污才算，过去的贪污一律既往不咎。这样三反运动结束后，经三反运动委员会宣布没有一个“老虎”。

三反运动结束后，二十三兵团改编为六十九军，撤销了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的番号，全兵团所属部队整编为一个国防师，两个建筑工程师。原一〇六、一〇八两个师合并编为建筑第一师；原一〇九、一一一两个师合并编为建筑第二师；原一〇七、

一一〇两个师合并编为国防军六十九军一〇七师。我师在并编前，对老弱干部战士进行了妥善安置。按照军委当时的规定，办了复员转业手续。新编的一〇七师编制是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和师直小部队。原一〇七、一一〇两个师的直属部队合编为新一〇七师师直小部队；原一〇七师三一九、三二〇两个步兵团编为新一〇七师三一九、三二〇两个步兵团（每团又编入一一〇师一个营）；原一〇七师三二一团编为新一〇七师炮兵团，坦克团由一一〇师部队改编；新一〇七师三二一团也是由一一〇师部队改编的。部队整编就绪后，原二野第十军二十八师拨归六十九军建制，这样，一〇七师各团与二十八师各团各调换一个整营，这样我们这个师可以说彻底解放军化了，尔后两个师的干部又互调工作，我自己就曾在二十八师任作战科长三个月，进行实习。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九·一九”起义往事杂忆

任秉钧

时逢“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之际，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不禁回忆起当年自己参加绥远起义的一些情况。

我原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住在南京。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纷纷把文件装箱运往台湾。一般官吏，人人垂头丧气，各谋出路，或走台湾，或奔四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蒋军士气不振，兵无斗志，人心涣散，官有门户之见，多思保存实力。

再看绥远形势，由于八年抗战，拔兵抽丁，罗掘俱尽，十室九空，为了避免再遭战争的破坏，当时绥远有识之士，均主和平，不主战争。

纵观上述形势，深觉自己年逾不惑，再不能盲人骑瞎马似地追随国民党逃往海外，自贻伊戚，急宜改弦更张，另谋正当出路。回忆在广州时，我这个绥远人，何去何从，反复思维，昼则长吁短叹，夜则捣枕捶床，一时定夺不下。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走起义之途，回归故乡，参加绥远起义。遂于七月二日离开广州，毅然乘机归来。

在返绥途中，于兰州曾会见马鸿逵。马对我说：“你可告知董其武，请他早日靠拢宁夏。今年冬季不好过，军衣军被不好接济，物资缺乏。”等语。

行经宁夏东部时，在三盛公西面路上，碰上原伪蒙古军参谋长包贵廷，正率领苏克巴图尔旅西进，劝我随他去巴音浩特（即定远营）。据说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定远营成立西蒙自治政府，劝我同去参加。我婉言辞谢。

我回到归绥后首先见了董其武，没有言传马鸿逵之意，只是将我在国民党中央所知的情况详尽地转告他。并婉言劝其勿听信拥蒋意见，勿出走，从全国形势看迟早要解放的。

再则，我见到绥远参议会议长张钦和阎肃、于存灏等，坦率交谈，言明利害，陈说绥远早日和平起义是唯一光明之路。希望大家认识一致，以便共同向各方面倡议，进行酝酿。至于我和荣祥、胡凤山等人更是朝夕相聚，畅所欲言。这对于促进绥远和平起义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记得，我还在归绥中学参加过两次座谈会，有各界人士参加。我曾发言，本着维护地方安宁、不流血、不破坏、维护人民安全生活为原则，表明自己拥护和平之意愿。

傅作义于八月下旬来呼和浩特时，我往车站迎送。傅曾单独约我到其卧车上询问国民党中央（广州）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我尽其所知举以奉告。又在新城阎伟宅内与傅见面，傅又问及×××与我之个人关系，并笑着说：“你可早日回来，到北京见我，则较今日更好，不过现在也可以。”我直言绥远应走起义之路，傅点头表示同意。

（一九七九年）



#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前后

康保安

绥远起义三十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整个中国由贫穷落后，支离破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变成了经济繁荣，安定团结、人人丰衣足食的新中国。在这建设改造旧中国的过程中，个人也参加了思想改造，从事过经济建设。因此，在兴奋与感念的心情下，回忆绥远“九·一九”起义话当年，对于今天我们迎接伟大祖国又已揭开了“四个现代化”新的历史篇章，更有新的意义。

## 一、我当“真心代表”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我充任绥远省干部训练团的教育长，不时与董其武主席接触。他经常找我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绥远应采取的具体对策与措施。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一致认为：绥远必须坚决和平解放，跟傅先生一道走和平解放的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我们爱国家、爱民族的初衷。为了达到军政人员全部，而不是部份的起义，还得做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使若干思想复杂的军政干部统一起来。如果轻率地举起义旗，那就很容易使思想比较顽固的人，脱离领导，铤而走险，不利于达到全部起义的目的。在这个过渡时期，董其武

先生仍须暂时作一个时期的蒋家王朝的封疆大吏；另一方面要真心地与共产党谈判起义工作。董先生派我充当他的“真心代表”，参加绥远和平解放的谈判、联络工作。从此，我就在董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出入解放区，奔走和平工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华北局根据毛主席报告的精神，照顾到绥远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傅作义先生商谈拟订了绥远和平解放草案。傅派安春山（原傅部一〇四军军长），刘庸笙（原华北“剿总”办公厅副主任）二同志携带这个《草案》于四月下旬来绥远，征求董的意见。董召集高级军政干部研究后，我这个“真心代表”就正式上任了。出发前，董其武主席给我的使命是：到北京后，在傅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听从傅的安排和指挥。我于五月四日从归绥秘密出发，五日到了集宁，谒见了姚喆司令员、并蒙设宴盛情款待，举行晚会，随后即介绍我前往北京。到北京后，于五月二十八日参加了在华北局举行的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华北局方面有董必武主席，薄一波政委等参加，董必武主席在协议上签了字；傅方参加者有傅作义、周北峰和我，由我代表董其武主席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的签订工作很顺利。

关于和平协议的内容方面，由于党中央对起义部队的客观形势考虑比较充分，因而所拟有关过渡的办法和措施，是容易使对方接受的。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为：①双方军队划界，各守防地，互不侵犯；②政府人员不变动，照常工作；③在归绥设一个党的联络处，以便进行党在过渡时期的一切工作；在归绥设立贸易公司和新华书店门市部，通火车、通邮政，等等。通过上述协议的实施，在沟通思想、促进团结和加强经济流通的基础上，使人们顺乎自然地走向解放的道路，一般的都认为是必要和可行的，当然谈不到反对。但是，在华北解放后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分子逃亡、

聚集在绥远西部，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这个新局面出现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阻挠，甚至派了武装行动组，打死了一位中共联络处的同志，致使和平协议几乎濒临破坏。

## 二、“胖护照”

流血事件发生后，董其武先生感到惊恐惶愧，十分不安，除坚决挽留联络处（经中共批准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等同志坚持联络处的工作，其余人员由潘纪文同志率领全部撤回丰镇），又曾派我到丰镇（当时解放区绥远人民政府所在地），作过联络。往返归绥，丰镇之间，必须经过双方岗哨，查验护照放行。我无处请领护照，只好自我报名，请求通过，双方关卡岗哨习以为常，都默然承认我的来往自由，验人放行（我的特点是胖子），不加阻拦。七、八十天过去了，华北各地的特务分子，纷纷潜来绥西，极力破坏绥远和平起义，一时间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形成白热化。对此，董其武先生帷幄运筹，军政兼顾，可以说煞费苦心，但听得他以双手拍大腿的声音终日不断（董先生着急时习惯于拍大腿）。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商请傅先生亲来绥远进行工作。来绥之前，我与解放区联系做好铁路接轨事项。来绥之日，我带铁甲车卫队迎接到集宁。

## 三、迎接中共绥远省委来绥

九月十九日，天空格外明朗，人民群众心情分外欢畅。这一天，蒋介石代表徐永昌狼狈逃窜，起义通电发向四方。谁人不歌颂毛主席的统战政策英明伟大，谁人不感戴共产党的恩德无量！

为迎接中共绥远省委迁来绥远首府归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通火车、通邮、统一币制、维持社会秩序、取缔特务活动等等。都必须落实到实处。董其武主席对这些做了布置，并要我负责办理，同时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中共绥远省委机关迁来之前，对于省委办公、住宿方面的一系列事务性工作，也须办理得妥善周到。记得当高克林书记到达归绥下车时，见面时曾对我频频点头，亲切握手，使我感到给人民做了点工作，倍加安慰。

# 随傅作义先生 来绥策动绥远起义经过

李 上 九

我是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新保安被俘，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兵团前方训练处学习了近十天，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奉派回北平工作，不久便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

四月间，傅把自己原属系统的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被俘的各军、师、团长以上军官袁庆荣、杨维垣、冯粹、温汉民、李思温、张副元、王和卿、张振耀、王大治、孙绍先等约三十多人，由石家庄、永年学习团要回，在北平西郊原华北总部设宴招待，唐文佐和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在宴会前，傅作了简要讲话：“过去我们走错了路，还自认为是爱国为民，实际上是充当了地主、资本家的保镖，想起来我非常痛心，这是我把大家领导错了，责任完全在我，不在大家，这个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采用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现在我已领导大家走上光明大道，希望今后我们大家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改造，积极工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有人再犯错误，那就要由自己负责了。”饭后，通知我们都去经理处领钱，发给我们每人几十元人民券。

八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刚从医院看病回家，原总部办公室

任主智南屏来家找我说：“傅先生今天下午就要坐火车去绥，要你随行。请你下午三时前，携带简单行李到史家胡同傅家集合，一起乘车赴绥。”我下午到达傅公馆，即同李世杰、王克俊、袁庆荣、于纯斋、潘瑞徵、唐文佐、李竭忠等约卅多人坐汽车到达前门西站上车，开始西行。这个列车只有一个软卧车厢，其余都是铁棚子车。除傅及少数几人坐软卧车厢外，我同其他人都坐在棚子车内。上车后，看到绥远省委统战部潘纪文部长。他陪同傅到丰镇即下车，改由鲁志浩副部长陪傅到旗下营。从北平出发时，中央还派了一部分解放军随车警卫。

车行过了张家口以后，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傅把潘瑞徵、唐文佐和我三人叫到他的卧铺车厢内谈话，说：“咱们这次到绥远见了那些老同仁，同他们谈话时，应注意着重谈以下几点：

- 1、北平解放后，社会秩序很好，各行各业都照常营业，市场繁荣，生意兴旺，人心安定，充分说明共产党、毛主席有办法，得人心，比国民党强得多。

- 2、解放军纪律非常好。过去咱们自认为我们三十五军纪律好，到了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称赞；今天我们看到解放军的纪律，比我们好得多。就单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佩服共产党的伟大。

- 3、关于绥远今后前途问题，你们先不要表态。可向他们说，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说该怎么办？听他们说完，你们再说：从当前全国局势看，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过来的客观规律。我们在国民党阵营内几十年，深知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上到处打败仗。我们如果继续跟着国民党，肯定没有前途，只有陪它殉葬，自取灭亡。现在只有倒向共产党一边，走和平起义的一途，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当晚十二时左右，车至丰镇。中共绥远党政领导同志高克林、苏谦益、杨植霖等到站上车看望傅先生，谈了片刻。他们下车后，火车继续西开。行抵卓资山时，约九点钟左右，车停的时间较长，驻卓资山的解放军高中级将领均上车来看傅，寒暄了一阵，他们下车，车就西开至旗下营，从归绥派来的火车头已到站候接。当时尚未恢复通车，东来的机车不能西开，由归绥派机车来接，只换机车，不换车厢。午后二三时，始到达白塔。原国民党绥远省军政界领导人、中层干部和步兵一个营都在站台列队迎接（这个营即张世珍独立第七师十九团的一个营）。傅即下车与来接他的绥远省军政界官员见面并作了讲话。傅说：“我知道你们都想念我，我也很想念你们，我现在一切都很好，所以我特来看望你们。”这次讲话，言虽简而意却深。因为在傅未来前，绥远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傅现已被共产党扣押。傅这次一来，谣言不攻自破。傅讲话毕，即上车开往归绥。抵归绥后，傅同其他少数人下车分赴绥远省政府及指挥所吃饭、休息。车上东西都未动，由潘瑞徵、唐文佐和我等留车上看管。傅晚上又回到车上休息。

次日即集合驻归绥部队在龙泉公园（即现在呼市人民公园以东附近地区）讲话。下午又集合绥远省军政界全体干部在奋斗中学（即现呼市第二中学校）礼堂讲话。讲话主要精精与在北平西郊原总部给团长以上军官讲话的内容基本相同。

傅从北平来绥时，携带有一部分现款（银元），专门发给驻绥军队官兵。团长以下军官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三元，在包头签字起义的军、师、旅长每人五百元。另发给原由三十五军调来的团长以上干部每人三百元（此款原系三十五军储存的干部福利基金）。

对驻归绥部队及绥远省军政界全体干部讲话毕，当天即坐车

开到麦达召(为预防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傅住在天主教堂，在该地住了不到十天，也曾给驻在该地附近的高理亭骑兵十三旅等部队作了同上述给军队讲话的内容，并设宴招待了驻在该地的部队长。

九月初由麦达召移住至包头市东南城外皮革厂。在傅未来绥之前已将驻在河套的张世珍独立第七师张银则的十九团调来呼包，专负警卫傅的安全任务。由于该团连长以上各级军官都是由三十五军各师团抽调来的，我们都很熟识。我们随傅到包后，经常与该团各级军官保持接触并宣传毛主席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和傅对原所属系统干部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傅这次来绥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都是为了把他的老部下引导到光明大道上来。

傅初到包头，即分别传见在包头的军政负责人，通过多日谈话，做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均能认清形势，明确方向。

九月十四、五日，原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奉蒋介石命乘飞机来包头。徐来包后，由傅接至皮革厂，同傅住在一起。傅与徐私交甚好，关系密切。他二人原来都在山西阎锡山部下任军长，徐任三十三军军长，傅任三十五军军长。他们同住包头皮革厂楼上，楼梯口由傅的警卫副官把守，任何人都不准上楼，他们谈论什么，谁也不知。事后我们得知徐某这次来绥是对傅专做说客，说服傅勿叛蒋投共，仍回归国民党，免遭国人非议。但徐没有说服了傅，遭到傅的严词拒绝。蒋的为人国人皆知，我在北平和平解放，蒋岂能容我，我若见他，必遭不测。同时从当前全国形势看，国民党必败，再跟蒋走，最终也只是陪他殉葬。我不唯不愿替他卖命，自去找死，我劝你也不要回去了，你也投向共产党，咱们一起走这条光明大道，否则是自我灭亡，还得落个千古罪人。徐看到他说服不了傅，倒被傅把他反说了一阵，他很灰心丧气地呆



了两天，便失望地坐飞机南返了。

傅离北平来绥时，党中央还拨给一部电台，抵归绥后仍留在火车上，到麦达召同傅住在一处，移到包头后即安排分住在包头发电厂，派部队严密警卫，外人谁也不知。傅每日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情况，即由该电台发报。

傅来绥后经过二十来天的紧张工作，特别是对高级军官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启发、动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所提高，条件已经成熟，又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将要开幕，傅便决定于九月十九日召集绥远省全体军政高级官员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举行会议，决定起义。全体军政官员三十九人都签字后，即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绥远省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投归共产党。傅于正式签字后设宴招待全体签字官员，欢庆光荣起义。欢庆宴会毕，傅在该分行礼堂对全体高级官员讲话，讲话内容主要是传达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次全会上关于解决绥远问题方针政策的全部讲话。讲话完后，我们都随同傅坐车返回绥。抵归绥后。傅偕同孙兰峰同志及少数人当晚即乘车返回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我们多数人都留在归绥办理东返干部（即从北平、天津、新保安、张家口等地返回绥远的原傅属系统的军政人员）的登记工作，以便今后送这些人员参加学习团学习，统一安排工作。

以上是我随傅来绥策动绥远起义经过概况，由于时隔三十多年，难免有错误之处，请知情者，予以指正。

# 从北平到绥远

肖如芝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后，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实际上，和平方式并不比武力解决容易。当时东北、华北都已解放。反动残余纷纷潜集绥远，情况相当复杂。要把绥远这片地主富豪恶势力压榨剥削下的旧世界变成光明灿烂、平等自由的新天地，谈何容易。何树声同志的回忆写得好：“不动干戈的战斗。”是的，这场战斗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天翻地复，你死我活斗争的。现在，回忆起三十多年前，为了绥远解放，我同共产党代表一起工作，从北京到绥远的一段艰苦历程，不禁感慨万千。

## 一、北京到丰镇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我以傅作义随员身份留办移交我所管辖的汽车队、油料库、胶车队、零件库等单位。办事处设在西四北石碑胡同二号，一连好几进院，留下的吉普车，警备司令部发有通行证，我们每人一个傅作义随员证，包括傅作义每人一身白灰色布派力司制服。从此便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服。迄至五月末移交完毕，下一步如何？心中无数。

正是此时，华北人民政府和董其武方面双方代表，在北京西

交民巷东口银行俱乐部达成绥远和平解放协议。这座旧式宏伟建筑，室内宽大，沙发地毯，设置相当华丽。共产党方面代表、绥远省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就住在这里。协议决定要求先进行四通（通车、通信、通邮、通商），彼此都为绥远开展工作做准备。六月十日左右，傅作义在他住处的会议厅——西四小酱房胡同、坐西向东二层楼下（小楼虽不宏伟，沙发地毯，倒也雅静）召见了我们留办结束人员。除我而外，其中有新闻处长王克俊、课长李竭忠、办公厅副主任刘庸笙、电务主任余咏辰，军械主任张启瑞，经理主任潘瑞徵，参谋高授予等十余人，都是傅作义身边上校以上得力人员，也是傅最后剩下的一部分班底。傅从楼上下来便说：“这里现在没有什么工作了，绥远省工作要做，大家到绥远去。过去大家跟我多年，靠我来负责。今后我再不能为大家尽责了。今后我们从新做起，跟共产党走，到绥远听董其武的安排……”。

傅的一席临别赠言，分明是和大家隶属关系，从此结束。大家不由热泪欲零还住，相顾而散。

傅事前曾和共产党代表议好，为连络方便，要派人去绥远。傅即指派我带吉普车和潘纪文一同前往。潘在傅任八战区副长官时曾担任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国共合作破裂后又回到延安的，我对他有些印象。他是个赤红脸，性情刚直、肃穆沉默的人。当时我负此重托，内心有些不安。一想反正听他的，我多办事少说话就行了。后来王克俊不放心，又找我把派车及跟潘走的事重交待一遍，特别强调路上要少说话。当时我想是怕我多嘴，说出不应讲的话。

我蓦地想到，这是傅作义让我做的又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派车。北京解放前夕，围城期间，傅让我秘密派好车一部，要可靠司机，只管开车，不要问谁坐。于是，我派一位姓甄的师傅送邓宝珊、

周北峰出去，接回共产党谈判代表，最后产生了和平方案，解放了北平。这次派车，让我随共产党代表一同做工作，解放绥远。这两件事使我毕生难忘。

第二天，我就到西交民巷银行俱乐部，找潘纪文接头商议走的事情。潘一见我就说：“听说你和我一块儿走，很好！”寒暄了几句，便向我介绍他的秘书于峰同志，于和我握了手，相互坐下，潘说：“你们俩商量走的日期，我还有事，你们要带汽车，恐怕不能一趟车走。”

从此，于峰同志成为我第一个相识的共产党朋友。他的眼睛高度近视，中等瘦弱身材，满口雁北应县、山阴一带口音。未走以前，经常与他联系。在这个时候，我一方面交待经手的事务，一方面联系车皮装汽车，准备走的工作。我挑选了一辆好吉普、两名好司机：温兰荣和一位姓段的司机。一切准备就绪，于六月十九日我同于峰和两名司机、我的勤务人员共五人，搭混合列车，从北京前门站发车西行。于说：“我已发电报告我们出发。”

路上，我们无话不谈，毕竟我有些拘束，多半听他讲。我们有时站在车门口，有时坐在吉普车上，望着八达岭和长城，他说：“这里也打过仗。”车到新保安，城堡上的弹痕、残壑，以及郊野上的单人坑，仍然清晰在目。于说：“这里就是傅作义三十五军王牌队伍被消灭的地方。毛主席真英明伟大。同蒋介石斗，步步都是按毛主席战略部署计划行事，一步一个胜利。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解放全中国。”他说着我连连点头。沿途车站、村庄、一个个从眼前闪过。我初次接触到共产党，毛主席伟大在什么地方，我是一点也谈不上来，何况我的许多旧想法还在脑子里盘旋。

二十日下午，车到绥远省人民政府临时所在地丰镇。没想到

潘已回到丰镇，接到电报，即派曹文玉等到车站接我们。吉普车一到站，马上围满了人群，都来看稀罕。这时丰镇连大汽车也少见，哪有吉普车。人们纷纷议论说，一定是什么大人物来了。其实我们也不过是个陪同开展工作之一员罢了。我们都上了吉普车。进城碰上鲁志浩同志，经曹介绍，相互握了手，我们继续前行。这时丰镇街上象是逢期赶集的样子，人山人海，走不过去。杂摊小贩、做买卖的人相当热闹。当时我在想，共产党占领区，也能这样轻松愉快，热热闹闹吗？这些情景和我原来听到的宣传说共产党占领区私产没收，人人不自由等说法截然两样。

车一直开到辘辘把巷城工部大院内，早已给我们准备好了一家民房住下。先是曹文玉同志陪我单另吃饭，把我当贵宾招待，经我谢绝，方一块吃。当时困难时期，解放军上下都吃小米，让我们吃白面、炒菜，每天换样。

见到了潘纪文部长，他首先就问：“临走再见傅先生没有？”我说：“就见了一面”。他接着又问：“傅给你讲什么了？”

我答：“傅告诉我路上听你的，车到绥远归你用。”

“咱们大家用嘛。你怎么不把家眷也带上，到那儿要工作了。”

“老人、小孩挺多，以后再说吧。”

随后又讲到与董其武联系的问题，他说：

“先打算让你送联络信，后考虑旗下营是解放军，就让其他同志去送了。你们先住下，等几天董来了回信，咱们再走。”

在此，我们每天没事便上街转游。有时上到城北高梁上俯瞰全城。远远看到红旗在飘杨，听到解放军嘹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有时老曹同志把我们引到球场上打球。他们让我

也玩，我谢绝。这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何树声同志，二十几岁小伙子，论外表、论身体都很标准，打起球来，投篮很准，无人与敌。同时我看到许多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和大家一块儿玩球，不分高低，相当随便。那时起，我开始学会称“同志”了，渐渐地有所习惯。

## 二、从丰镇到绥远

我们等了一个多礼拜，不见董来信，万没想到联络信被刘万春军长扣留，未交董其武，后来决定让鲁志浩同志带一部分人员先走。

七月一日从丰镇出发，预料到旗下营董会派人来接。

到了旗下营下了火车，出乎意料，根本没人来接。决定由我同何树声先过去与董取得联系。此时我心里有些嘀咕。我穿一身白灰色便服，头戴一顶小沿细草帽，何穿一身半旧灰制服，头戴八路军八角帽。我想，会不会出危险？打主意先找绥远部队团或师部，要是能和董其武说上电话就更好了。他们把我们送出解放军岗哨线外，我便同何继续前进。走到西边高头梁交界处老远即被董占区哨兵喊站住。我告诉何不要讲话，我过去走近至距哨兵几步远的地方说：“我有任务，姓肖。你把我们送到你们团部或师部，这里不能讲。”接着一个哨兵看我们，一个哨兵回哨所去报告排长，用电话请示师部。不一会儿，那位排长出来说：你们过去吧，师部在豪沁营子。

我们在前进中看到不少全副武装的军队在田野里操练、演习，车一直开到豪沁营子村，二五八师师部住在一个大门院内。车到门前不远停下，除有几个小孩和妇女走进我们外，很少见

男人出来。我向卫兵说我要见你们师长，卫兵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参谋长说：师长不在，有什么事对我讲吧。相互一见，他对我的名字还熟悉，让我们进屋坐下。我说傅作义派我来和董其武取联系，我要与他通电话，于是，他马上要通了电话，我接过电话筒：“你是董主席吗？”

“是的。你和谁一起来的呢？”

“我和一位姓何的，其余几十个人都在旗下营等候。”

“为什么不先来信呢？”

“信发出去已一个多礼拜了，未见回信。我们一行几十人，认为在旗下营会有人接，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所以我先来一步取得联系。”

停了片刻，我在耳机里听到旁边有人插话，接着董回话：

“好吧，我派人到东门外接你们去。”

当时，刘万春也在场，但我不知道。

不一会，我们到东门外飞机场，便看见王克俊、刘万春都来接了。王把我叫到一边，带有气色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先来信，就把他们引过来呢？我说：早来信你们没收到？刘万春当时在一旁歪着脖子跨着手枪，走近几步，问我这位是谁？我看到他那副面目，并带怀疑的神气，只回答说是姓何的。说话间，王景泰、张国林也都来到，他们受董的指示，没让何进城，而是又一起返到旗下营，去接鲁志浩、曹文玉等几人。我进城门时一看，沙袋堵塞，里外双岗，仍是临战状态。

到了省政府，见到董其武，首先就问：信为什么未收到？董也非常奇怪，认为其中必有文章。吩咐我们先住下再说。后来共产党联络处的同志们被接来了，在建设街德王府见到董。经我们一

一介绍和董握手坐下，董告王景泰让他们先洗脸，此时，天已昏黑。董其武晚上在德王府大厅内设宴招待共产党代表。我们和王克俊、张国林、康保安、王景泰、曹化蔚（善初）、李竭忠、张启瑞等一些军政人员作陪。席设三桌，此间大部分官长都在，唯独没见到刘万春等人，这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此，提高了警惕，说话、行动都比较谨慎。共产党代表们住在西落凤街原来的厚和旅社。我们住在德王府里院。相距虽不远，见面也得小心。这时，外面传言说我也是共产党。李上九同志告别人说：万没想到肖子香也是共产党。老朋友们问我时，我回答：我是傅先生的学生，他向左转，我跟着走，我哪是共产党。

### 三、与反动分子展开斗争

不久，我们就接到反动分子从墙外掷来的恫吓信说：你们这些人，在北京把傅作义出卖了，又来绥远出卖董其武来了，小心你们的脑袋……。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不要说开展工作，连行动都感到不便了。我们由傅董派的几个人都认为集中在一块儿危险性大，决定分散居住为好。于是，我搬到旧城兴隆巷一号乡亲那里。从此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半明半暗地开展工作。对一般人都说是没事了，做小买卖。以此做为隐蔽。

后来，特务发现我们和共产党代表有联系，有人便开始跟踪。外出到大南街时，看到特务分子张贴了许多反动标语，我告诉代表们多加小心，他们都说，革命就是要不怕死，怕死就不会来了。

毕竟是老共产党人，比我们胆大，他们照常出去开展活动。但万没想到，七月下旬的一天，联络处王士鑫同志被反动分



于赵元德等人指使武装特务，打倒在新旧城之间的马路上。等同志们把他抬到医院，已因流血过多而牺牲。董其武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对王士鑫同志进行了悼念。从此联络处长潘纪文同志带领大部分人员撤回解放区，只留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等同志留下坚持工作。为了保证安全，让共产党代表搬住建设街德王府。并加双岗，里外守卫。此时，共产党代表们考虑，在此是否能再工作下去，是个问题，于是特意把我找去，鲁志浩同志问我。

“老肖我们不能把你当外人，你说董其武究竟是什么态度。”

我回答：

“董其武，你们不必怀疑。董一向赞扬八路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是傅作义多年培养，提拔起来的心腹，也是傅的膀臂，傅让他怎么走，他一定会照办，绝对不会含糊，象刘万春这些人就不敢说了。”

接着，我又继续讲：

“绥远形势已看得很清。内部来说对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大致可分三种人：一是以董其武为首的大多数，都是傅董嫡系，坚决听傅、董的；其次就是一些持怀疑态度，担心上当受骗的；第三种就是顽固、反动分子，受特务嗾使持反对态度的。”

我返回后，即把这些情况报告董其武。董很着急，一听说代表们想撤，马上派康保安教育长给代表们解释并道歉说：千万不能撤。董后来亲自见大家说：傅先生来电，坚决不让大家走。同时，共产党代表也接到指示：要坚决顶住，不能离开，这样，他们才安下心来，继续与反动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联络处的同志们四处接头，宣传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

坚持不变，不因特务破坏而动摇。这时我才得知，我向何树声到毫沁营子二五八师师部打电话时，政工处长赵元德，本来认识我，他都认为我也是共产党，根本不露面和我谈话。并扬言要收拾我们。后来的恫吓信，就是他发的。果然，这些人向王士鑫同志下了毒手。这时，又听到国民党上校于鸿儒，北京解放后回到安北，因说话不慎，被当地驻军以煽动军心罪为名，活埋了。这些事不由使我感到有些后怕，特意到大南街照了一张原装相，留作纪念。这时，董其武也采取了有力措施，他派我到原绥远军官总队，以教官名义做思想工作。我给大家上课，主要讲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声明，大意是：

过去走的路，实际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看家，为名门富豪保镖。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胜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大家都是傅先生的老部下，跟着他走是不会错的。同时，董还分别派人沿街洗刷反动标语，张贴进步标语。

这时，傅作义要来绥远的消息，也传遍了全城。

八月二十八日，傅作义乘专车来到绥远。分别接见了绥远军政各界首脑对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作了讲解，使他们安下心。我去见傅，傅问我现在哪里，我说：在军官总队。他又问到军官总队的情况，我告诉他有四个队三百多人，都盼你来，有些人说你已失掉自由。傅笑了笑说：告诉大家放心，共产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给大家带来光明前途，我们要重新作起。

之后，傅即乘专车去包头。途中曾在麦达召下车住了些时，召来军政上层开会。后来我听傅的随从副官郝德振说，就在这时候，国民党绥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跟到麦达召想找傅作义，作最后的进言，劝傅南飞。一到站，卫队长张景涛正忙着从车上收拾行李。傅进到院里回头一看，张庆恩也在后头，傅说了

一声：他怎么也进来了？阎又文即把张引到西屋应付一阵支走了。张一看傅不见他，便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到包头。后来又乘徐永昌的飞机跑掉了。

经过各方面努力，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斗争，九月十九日绥远终于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宣告于全国人民。绥远一度险恶的形势，立刻明朗化了。那些猖獗一时的反动派、反动分子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九·一九”绥远起义也将成为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革命行动。

今天，我们有幸拿起笔来忆往昔，再现当时的历史情况，再现“九·一九”起义艰难曲折的过程，以便同经历过及未经历过的新、老同志们一起吸取经验，努力奋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一份余力。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于呼市）

# 往事回忆

——记“九·一九”起义前后

## 我的一段经历

王 静 山

“九·一九”起义前夕，我正在国民党骑兵十二旅（即鄂友三部）任代理参谋长职务。由于北平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致使骑十二旅军心更加动摇，军官、士兵思想混乱，惶惶不可终日，时局迫使人们对自己的出路迅速地作出抉择。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 一、官兵思想状况

骑十二旅原是一支由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部队，不是中央嫡系，傅作义也不十分器重，人员复杂，装备也较差。处在穷途末路的蒋、傅对这支部队很少过问，军饷常不能按时发放，士兵生活艰难，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这支部队的思想更加混乱。

主张垂死挣扎的，认为自己是骑兵，有四条腿，又是地方部队，土生土长，人地两熟，能挣扎一天，就挣扎一天，否则就向西流窜，或化整为零，爬山头、打游击，就是平常流行的一句话：“一人一马一支枪，天涯海角当大王。”这些顽固分子，认为投诚起义就是任人宰割。他们的想法是：能活一天算一天。

还有的迫于形势，想暂时投诚起义，借水养鱼，待机东山再起。鄂友三本人的思想，在临近“九·一九”起义前夕，就是这样。

也有经过长期内战，产生厌战情绪，希望解甲归田，只要共产党不杀，当个顺民也就是了。我当时就有这种思想。

鄂友三本人，一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当然是反对起义的。由于鄂的淫威，在其他军官中，即使有人愿意跟傅作义、董其武起义，也不敢说。绝大多数是看鄂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特别是有兵权和土地房产的人。

士兵中间的思想状况是与其所在连队的长官有亲属、裙带关系的、有房地产的，都是长官怎么办，自己怎么办。

有因生活困难或被迫当兵的，大多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反正我是个当兵的，没什么可怕。

## 二、参加归绥会议

大约在四九年的五、六月间(事隔三十余年,时间记不确切)一天上午,鄂由他临时住的一个小村子里(可能叫圪妥忽洞)打电话给司令部驻地(王全小井村)找张汉琰副旅长和我说,速去他的驻地开会。接过电话后我们即乘马前往。当时到会的记得还有郭熙智、王孝模两个副旅长、参谋处的库秉衡等,大约八、九人。鄂在会上首先说:“今天有件重要的事向大家说,我接到归绥指挥所的电报,令部队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以上人员去归绥指挥所开会。据说开会是要摸一下各部队现有人员、马匹、武器、弹药等实力情况。”又说:“估计会上虽不便公开提出要投诚的话,但一定要探索各部队对投诚的态度。如果是研究投诚的

事，我们不能任其摆布。我们要看风使舵，会议不能不参加，但我不便参加。以后我将以患病为名，从明天就去北面的小村子（可能是高四喜圪旦）暂住，凡是指挥所来电话，我不亲自接，你们接到呈报我。这次会议由张汉琰、王孝模、王静山前去参加，走时可选带精骑二、三十人，好枪二、三十支，以应不测。到归绥后驻旅办事处。”并对我、张汉琰、王孝模说：“如果会上讨论投诚问题，你们可说回部队请示鄂再作决定。如果受逼，可乘马速回后山。”

第三天，我们即策马出发，到归绥后住旧城通道街十二旅办事处。

到达归绥后的第二天，我与张汉琰、王孝模即前往“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现内蒙党委地址）报到开会。会议大约开了二、三天，内容以听取各部队的汇报为主。由于当时绥远局势还不十分明朗，董其武主席不便公开说明要跟傅作义走北平方式的道路，但希望还是听傅的话为好。我们亦能领会其意。

### 三、参加董其武的便宴

在会议就要结束的一天下午，董其武先生在绥远省政府的后院（现高级人民法院院内）的一个大房间内设便宴，并用小汽车把张汉琰、王孝模和我三人接来参加便宴。出席便宴的还有河套屯垦办事处田××、达拉特旗王爷——汪鹏程等共十多人。这些人大都不是傅、董的嫡系，有的是地方部队的头头或代表，有的是地方派系的首脑。席间，董首先讲了些旧官场上的客套话，其后谈了北平解放后傅作义的情况，部队的情况，以及一些其它人的下落等。最后，着重谈了绥远当前的情况，虽未便公开说要起

义的话，但用意是相当明显的。他希望大家能听傅作义的话，并希望回到部队或地方能起到促进起义的作用。

饭后董用小汽车把我们送回十二旅驻归绥办事处。

#### 四、归绥会议以后

会议的情况本来应由张汉琏、王孝模两个副旅长直接向鄂友三作出汇报，但是，就在这时张汉琏突然被调任保安第四旅旅长职务，驻地乌兰花，令他急速上任。王孝模因病留在归绥就医。鄂友三电令速返部队汇报会议情况，结果只有我一人先头回到后山十二旅司令部驻地。记得当时十二旅官兵已不能按时发饷，只是不定期地给部队部分银元维持生活。当时办事处刚刚领到三、四千银元，为了安全，决定趁我带有武装士兵回部队的机会，由军需人员用白布缝成子弹袋形式，将银元分装于内，然后分给士兵带上。我们于会后的第六天，由办事处出发，当行至大青山蜈蚣坝时，登上山顶已是中午，大家一同在关帝庙打尖休息。庙中有个老道，又备有算卦用的签筒。当时我对时局有许多犹疑不决，前途未卜，见景生情，想借助神灵看个究竟：听鄂的话好，就讨个上签。结果讨了个下签。再加我对归绥会议情况的考虑，这就坚定了我听傅作义、董其武的话的主张。

回到司令部天色已晚。第二天，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鄂去汇报，他就只身来到我的住处，迫不急待地向我了解会议的情况。

开始，鄂的态度比较自如。我向他传达了董其武先生对他的问候，并说：“董主席还是信任你的。”又说，会上并没有要求部队长官对投诚起义表态。听到这些，鄂当时还流露出高兴的样子。

当话题转入绥远局势，目前已处于走投无路的时候，鄂板着面孔严肃起来，脸上的气色也变了。当我又谈到董其武先生趋于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我又流露出还是以听董主席的意见为好，这时鄂就不耐烦起来。由坐着听我的谈话，转而仰卧到靠枕上，一言不发，突然，他生气地说：“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 五、我的被押

在起义与顽抗的问题上，我与鄂友三在思想上的分歧随着时局的演变越来越严重了。自从我和他谈话以后，鄂就认为我已经开始背叛他了，认为我不忠实于他，涣散兵心，瓦解部队，从而怀恨于心。再加上后来我在每星期一的例行集会上，向司令部各处人员和直属连队官兵的训话中又流露了投诚起义的思想，同时在以后与个别人的谈话中，也有同样的论调。这就使鄂友三更增加了对我的不满。事后知道，自从我与鄂谈话后，鄂即派人观察我的情况。注意我的行动，认为我已经不可靠了。当然我的这些行为也瞒不过鄂的耳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鄂对我的不满加深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以后，一天上午，鄂由他的驻地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参加会议。当我来到时，其它人已到齐。参加会议的都是团以上军官。

鄂宣布开会，突然他恶狠狠地说：“王静山！你来到这里，我对你怎么样？”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摸不着头脑。当即说：“不错！”鄂又说：“可是你对我不怎么样！我叫你整训部队，你不但负责任，反而涣散兵心，松懈斗志，纵兵殃民……我已电请指挥所，撤去你代理参谋长职务，你的随从、马匹，一齐交出。暂委你为司令部上校部附，从今以后不许你回司令部，



只能跟着我，不能随便行动。……”

会后，跟随我的五个士兵和枪、马，被分散到其它连队，又由鄂派了他的两个亲信士兵给我，名义上是照顾我，实际上是看管我。从此，我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

大约一个月后，上级来电，令鄂本人到包头开会（可能是讨论起义问题）。他临走时把我又交给二十四团毕宝熙团长，毕又把我交给他的通讯排的刘排长，由两个士兵日夜监护。

有一天，房东的女人对我说：“你还不快点偷跑，司令说从包头回来就枪崩你呀！”（这句话是否确有其事，不得而知）由此可见，由于我关于部队要投诚的主张，鄂已对我记下了仇恨，欲置我于死地。

幸而“九·一九”和平起义实现了，鄂的阴谋未能得逞，我才被放了出来。逼于当时的形势，经过当时在鄂部任政治部主任的潘儒等人的建议下，把我调至骑兵独立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我任旅部副参谋长。

我对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的“九·一九”起义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对党的起义政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 “九·一九”起义片断回忆

刘 天 宝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我在国民党绥远省固阳县县长任内起义，弃暗投明，投奔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怀抱。谨将“九·一九”起义的片断情况，忆述于后：

## 一、晋见傅作义先生顾虑得解除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其武先生的随从副官王全福，由包头来电话说：“董主席陪同傅作义先生已到包头，叫你速来包汇报固阳驻军和后山一带地方情况。”第二天一早，我即乘运粮汽车由固阳到了包头。先到包头西街原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见了董其武先生。他告诉我很快就要举行起义的一些简要情况，叫我立即到皮革厂晋见傅作义，向傅先生汇报固阳驻军情况。我到皮革厂后见傅先生穿一身灰色中山服，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不减当年，我很高兴。他让我坐下后，首先问了固阳驻军陈秉义部和驻在固阳、武川一带的鄂友三等部队以及地方现状，还问了固阳到百灵庙，固阳经高台梁到河套公路情况。我领会到傅先生想到固阳、百灵庙及河套看看，当即说：固阳、后山一带的杂牌部队，纪律很坏，地方秩序很乱，兵匪不分，加上原察哈尔省的部分地方团队及家属，逃到固阳、后山等地就食，闹得地

方秩序更为混乱，并劝他还是不要去为好。傅先生点了点头笑着说，你在那里当县太爷，也要注意安全。接着傅先生简要地向我说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的愉快心情，还给我讲了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胸怀，对投诚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并说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绥远军民非常关心等等，最后他说，绥远很快就要起义，问我有什么顾虑。我说，一九四八年我在集宁县长任内，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对我颇为优待。但我不久就乘机逃回绥远，又担任了县长，与解放军为敌。要是绥远解放了，共产党能饶恕我吗？另外我把六月份有一次到省府开会，曾在省府德王府会见了共产党派到归绥的联络组负责同志鲁志浩，鲁还鼓励我好好为人民做事，不要有顾虑。傅先生当即告诉我说，战场上的事，过去的就过去了。共产党不会追究你被俘又逃走的问题，安心工作吧！并说共产党对蒋介石特务系统的人员和民愤很大的人是要追究的。你从小就跟随我和董主席工作，知道你不是共产党要追究的对象，你安心参加起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好好学习、工作吧！快回县上去，做好驻军的粮食供应工作，维持好城乡治安，督饬县区乡工作人员，尤其是地方团队，不要发生意外行动，安心继续工作，听候新的省人民政府安排。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做好县政结束工作，办好新旧政府的交接手续。听了傅先生的教导，解除了我的不安和顾虑，增强了我走向革命征途的信心和勇气。

## 二、当时绥远的混乱情况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李宗仁鉴于绥远的混乱残局，想拉董其武的后腿，给董其武先生一个“西北军政副长

官”的头衔，仍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并还给了几个军、师、旅的番号，企图稳住绥远军政民各阶层。当时绥远号称有军队十万之众，向国民党中央经常要钱要枪，实际上绥远部队过不了五万。除傅、董老部队张士珍的步兵第七师和赵晓峰、王崇仁、张副元等五个师比较有些战斗力外，其余如鄂友山、陈秉义、安恩达、乔汉魁，高理亭、邬青云等旅和师，都是些扰民有余，不堪一击的豆腐兵。绥远混乱局面正是这些部队造成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法币与金元券已成废纸，军政人员领不到军饷，都是就地追逼劳动人民缴纳粮食，供应军队。当时我在固阳县担任县长，每天派遣大批县区乡工作人员给军队打闹粮食。各部队都按应编人数向地方逼粮，实际上实有人数均不足半数。好多杂牌军官兵拿上领到的粮食，有的向人民换大烟，有的在城乡高价出售。而在乡村还经常发生散兵游勇刁抢人民财物，调戏、强奸妇女的案件。

当傅作义先生来绥促进起义工作时，毛主席、党中央让傅先生带来大批银洋，犒赏官兵。按军官每人银洋五元，士兵两元。这一下可忙坏了带兵官——团、营、连长们，到处向区乡借乡保自卫队员，以便冒名顶替领钱。每名顶替人领两元，自己得一元，交雇他的官长一元，骑兵队不但人能领钱马也能领。为了领钱，他们就把驻地周围老百姓的骡马和马驹借去顶数领钱。国民党反动集团丑态百出的事实，当时人们还看得惯，不以为奇。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啼笑皆非，不能不加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

北平和平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给了原绥远省一个时期的苟安局面。董其武先生为给将来走北平解放道路作好准备，就在绥远成立了革新学院，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当时的绥远虽然蒋匪帮特务仍在横行，而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

论》《论联合政府》《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人们已能半公开地阅读。

绥远特务头子张庆恩等知道董其武先生决心要走傅先生北平和平的道路，他们云集到包头，离间董先生与孙兰峰先生的关系，利用孙先生的刚直性格，百般设法拉孙先生的后腿。尤其是拉拢游说驻包头的国民党军长刘万春等，还制造什么所谓主和的投降派是以董其武为首的实权派；主战的抵抗到底派是以孙兰峰、刘万春、鄂友山为首的外牌派等，从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刘万春当时还以其回民的身份，想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等人联络，并组织了一个所谓“西上联防团”。这个联防团的成员有青海驻包头办事处处长朱子信，包头三青团主任阎宥琛，包头参议会一位副议长和包头回民协会一位理事长等四、五个人到宁夏、青海等地做联络工作，同谋反对董其武将军走和平起义的光明道路。

当时包头还有一个被张庆恩特务匪帮利用的机构，名叫“察哈尔干部训练团”，简称“察干团”。该团大约有二百来人，其中有些是由河北、察哈尔，大同和北平、天津一带逃到包头暂停观望局势再往西逃的人。当时包头街巷经常发现攻击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标语、传单，据说就是“察干团”内这群人与张庆恩特务匪帮们搞的。记得傅作义先生到包头后，这群人也在街巷贴过咒骂傅先生的标语。董其武先生得知后、曾多次责令包头治安当局追查并派人撕刷反动标语。包头市警备司令陈玉甲，警察局长刘志强都曾亲自领人撕扯过这些标语。

一九四九年夏季，华北人民政府已组成驻归绥联络处，派潘纪文、鲁志浩等同志带领工作人员从丰镇到归绥为推进和平协议进行联络工作，而逃避到包头的蒋匪帮特务们和包头治安机关在

一些人的支持下，曾在城内进行过两次户口大清查。我当时虽在固阳工作，但家仍住包头，黑夜清查户口，军警人员虽没好意思进我家搜查，可是我知道他们是要寻查共产党人的。后来听说抓获了一些贩卖与吸食大烟的人，还把一名吸毒的孕妇枪决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包头财神庙街有两处政府公开设立的大烟馆，门口小牌上写着“清水净烟”的字样。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是这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刘万春的老婆在家公开摆着大烟灯，政府的大烟馆还经常挑选好顶花奶子清水地大烟送到刘万春家。这是我的一位在“清水净烟”馆工作的小同乡告诉我的。

（一九七九年七月）

## 记邵力子与景梅九两先生

杨 令 德

邵力子、景梅九两先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两位前辈报人。景先生仅在抗战前、抗战时期晤谈过，邵力子先生则于抗战前、抗战期间、抗战后直至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均有所接触。其中由于右任先生的介绍，特别是在邓宝珊将军处，有几次较久的晤谈，总算是“认识”了（多年来我当然“认识”邵先生，但邵先生却并不认识我，虽然其间也经过几次同桌吃饭，而且还有我对他的一次“专访”，但直到一九六二年最后在邓宝珊将军处又有几次晤谈时，邵先生才开始说他认识了我）。我们年轻时，作新闻采访，总以为见过的人，谈过话，而且还是较长时间的，就一定是认识了的。其实不然。有极少数人是能在一、两次谈话甚至一次谈话后就是隔时颇久也会记得、认识你的；一般要人，他接触的人多，便忘怀了。从邵力子先生那里，我才悟出这么一个道理来。

邵先生与于右任先生都是中国老一辈人，他们交谊甚深，彼此极为敬重。邵与张季鸾交谊亦好，我虽然未亲眼见过邵、张往来情况，但在一九六二年于邓宝珊将军处，与邵谈及张时，从邵对张表露的感情上，可以看出来。那时王芸生、曹谷冰两先生所撰《大公报回忆录》的文章，刚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对张不无微辞，邵表示不以为然。他说，对季鸾有些失之于苛。他肯定张是一位爱国者。

那时（一九六二年前后），邵先生几次谈到他有“江郎才尽”之感。他说：“‘江郎才尽’是指当时为文多重辞藻，江淹年纪大些了，便觉得记不起偌多辞藻来。而我则是真老了，记忆力衰退，把许多事忘怀了。”有人背后议论，认为邵先生参与蒋介石机密，而他本身经历，具有宝贵历史资料，“江郎才尽”云云是一种托词。从“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文史资料撰写者的种种污蔑、甚至迫害来看，邵先生也许当时就有什么预感也说不定。

有一次邓宝珊、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还有杨明轩先生，在颐和园邓寓漫谈，他们都对“三面红旗”显有微辞，并表示了忧虑之情。

这些我将在别处作较详纪述。现在主要回忆我于一九三六年在西安对邵先生的一次“专访”。

一九三六年秋，邵力子先生甫由甘肃省主席调任陕西省主席不久。那时东北军已调到陕西，杨虎城将军任西安绥靖主任。在一次杨、邵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同杨虎城将军立谈数语，竟无多攀谈的机会。杨衣着极朴素，好似拙于语言，不多讲话，人看去也很平易。我当时只知杨为很厉害的“陕西王”，一见之下，觉得出乎预料，印象甚好。我在采访手册上写下几个字，觉此人以“刚毅木讷”四字足以尽之。

邵先生望之如六十许人，无胡须，颇似旧剧中之老旦，人颇活泼，无习气，与之谈则极善躲闪。此前辈新闻记者，竟以老报人的老经验，对付当时（一九三六年）的新闻记者，亦殊好笑。在这种场合，无法多谈，决意另觅机会作一次“专访”。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晚上，竟得到一个和邵先生谈话的机会，使我很高兴地作了这次“专访”。虽事隔多年，印象尚深。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在全国兴起，新文学运动蓬勃



发展。《北京晨报》的副刊《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成了青年爱好文艺者的必读之物。这三种副刊每月末另出合订本，销路颇广。《晨报副镌》主编为孙伏园，他是鲁迅的学生，鲁迅之弟周作人，当时几与鲁迅齐名，他们的文章在《晨报副镌》发表的多，当然还有在北京的不少作家，也为这个《副镌》撰稿，一时为《北京晨报》大增声誉。上海《时事新报》当时为张东荪主持。在政治上《时事新报》与《上海民国时报》是对立的。它的副刊《学灯》却另有特色。也受到读者的欢迎。那时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诸人尚在日本留学，“创造社”未出世前，郭老的一些处女作如《女神》等诗篇就发表在《学灯》上。《学灯》发表的其他当时引人注目的文学、哲学、社会学各方面其文章也不少。邵力子先生是《觉悟》的主编，《上海民国日报》为国民党机关报，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民国日报》宣传革命，宣传新文化运动甚力。《民国日报》总编辑为叶楚傖。当时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叶也写了不少好社论。邵力子先生主编的副刊《觉悟》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当时国共合作，许多青年共产党员为《觉悟》撰稿。诗人蒋光慈就是先以蒋光赤为名在《觉悟》发表诗篇而驰名文坛的。后来改名为蒋光慈也是在《觉悟》上。

我当时是上述三种副刊的热情读者，所以对邵力子先生主编《觉悟》颇有所知，而且早在精神上对这位前辈甚为敬重。所以第一次谈话，开始就从《觉悟》谈起。

邵先生说：“现在想起当年办《觉悟》来，也殊觉有味。那时有特约稿，是不修改的。其余投稿都是青年的作品，都须修改。不过只要原稿稍有可取，决不抹煞。”他是当过国文教师的。为学生改卷子，总要使原作的意见保留。对修改投稿也是如此。不

过这样太苦。自己写东西倒没有什么，唯有改别人的东西最苦（这一点我有同感）。他还提到有的文章是改不得的，因为作者不愿意。

对于有反对意见的文章也一律刊登，不过加以头尾的反驳而已。这样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来。

请他谈谈对于过去和现在报纸的比较。他说，总是现在进步得多了。但马上反问我的意见（他惯会反问人）。我说：“您是老前辈，以前的事，我不会知道。”他感慨地说，我们从前总是太偏激。不过非如此不可，因为我们要推翻满清政府，掀动革命的。现在的报纸，似不应如此（从以下他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且不说辛亥前，就是五四后，北伐前，邵力子先生的态度如依他当时的说法，也会成为偏激了。可见国民党成了执政党，邵先生以在野文人而身登政坛，地位变了，思想认识自然也就随之而变了）。接着他发挥了“现在的报纸（一九三六年时）似乎不应当如此”的论点，说：在清末比如有《官场现形记》一类谴责小说，现在如仍以此态度来对待，便不妥。现在也不能说没有像《官场现形记》中所描绘的人物，不过大多数是进步了。中国人对于“官”有两种看法，其一是羡慕，看重得了不得；其一是鄙视，觉得“官”都不是东西。两者均不对。人们现在说党（指国民党）不对，说党不延揽党外人才，其实不然。行政院各部长有党外的，其他各地官吏中党外的人也很多。

这方面我不想多和邵先生攀谈，便又转到副刊上来，请他再发表意见。他说：现在副刊之不能如过去发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杂志多而且很有可观的；其二是不能发偏激的言论，不能出风头，也不易办好（他避而不谈新闻检查）。

谈到对报纸的见解，他说，一个报总要始终如一。如果初办

时注意到甲种读者，有相当时间，甲种读者果然注意了，而你又变化，供给乙种读者。结果会甲、乙两种读者都失去的。

对报纸的批评，他说，现在技术上进步，也有助于报纸的发展。他称赞当时西安出版的，由赵雨时办的小型报《民报》。

请其批评当时中国的报纸，他说，很难下批评。最后还是说《大公报》好，眼光远大，遇有重大问题，能提出好论文来，有见识（这时《大公报》已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了，自然与邵先生政治观点一致）。

末了，又谈到北伐前的《上海民国日报》。他说，最初《民国日报》和上海各报竞争，上海人不管消息真伪，只要你的报没有登出去，便认为你是遗漏了消息，比不上人家。后来没有办法，《民国日报》也登，但加以批评，辟其荒谬。这样就好些了。还有过去访员有捏造消息的，按旧报编造，很不好。他说，现在（指一九三六年时）的报纸，似亦有此情形。围绕新旧报业情况，当时谈的很多。事隔多年，今仅回忆此片断而已。

邵力子先生与景梅九先生当时在西安有朝野之分。其后也一直是在朝景在野。一九三〇年曾在太原一度晤景先生，并曾约谈，但未果。后在西安于景先生家中作“专访”一次，漫谈颇久。景为三晋名士，清末民初，从事新闻工作，蜚声文壇，特别在西北，为众所瞩目。他的自传式白话作品《罪案》一书，流传甚广，且在“五四”前后为白话运动前驱。

景先生当时为“癡君子”。到他家中，略事寒暄，他躺在大烟盘畔，很随便地与人攀谈起来。他的夫人，在他所著《罪案》一书中多所描绘，当时似乎也老了。他本人极和气，在烟榻上时卧时起，娓娓而谈，如话家常。他是中国早期宣传世界语、推广世界语言者之一。大概清末民初，中国一些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潮

的在法国、在日本留学的人士，即接受了柴门霍甫博士创设的世界语（E S P C R A N T O）在国内宣传推广，如吴稚晖、刘师培诸人，景先生也是其中之先驱者。景在日本学世界语，多年从事世界语的宣传运用。他办的《国风报》，很早即辟有世界语专栏。《国风报》停刊后，他还单独办过刊物《出路》，专门宣传世界语。他用世界语译但丁《神曲》，即在《出路》连续刊出，本来日本人亦有《神曲》世界语译本，但无韵。景先生系以《离骚》体译《神曲》为韵文。他认为《神曲》不以韵文译出，对原作大有损失。谈到日本以世界语译中国经典著作，他认为译得不好。如日本对《论语》的世界语译文，把“澹台灭明”还译成两个人，太不应该。当时我国世界语运动不甚发达，景先生对此深感不快。

谈到邵力子先生，梅九先生说，“邵力子一生最精彩的是办《觉悟》。那时领导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确有极大成效。我在《觉悟》写的文章不少，没有拿过一个钱（没有稿费）。那时吴稚晖在《上海民国日报》编一副刊《抗育》，也很出色。还有沈玄庐、刘大白诸人，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了不少好文章。”

“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是邵力子的学生”，景先生说：“他们结婚时，我送的贺联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他对当时（一九三六年）新闻记者国学常识不足，很为感慨。说有一个大报登了一篇游记，是游玄武湖的。写到郭璞墓，说“郭璞不知何许人也”。这样一位经学专家，《山海经》的注者，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时地下坐着一位先生，很年轻，说《中国人名大辞典》郭字第四行就是，怎么不查一下呢。后来这位先生走了，知是一位眼镜商，也居然如此风雅。

最后谈到《国风报》。景先生特别欣赏他自己为报纸“开天

窗”的事。本来报纸开天窗是因为稿件被检扣，临时无法补上，只好留空白，称为开天窗。这在清末是有时在报上见到的（国民党时代，检查新闻极为严厉，后来不许开天窗，扣留稿件，临时需补白）。《国风报》在宣统三年出空白，为中国报纸开天窗之始。景先生说到这一点，极为得意。他说，那时候的善琦管理报纸，和今日相比，也不算严。我在北京出版的《国风报》上，故意出了空白，开了天窗，人们一见报上开天窗，以为革命党有什么重大行动的新闻稿，被官方检扣了，立时引起猜测、议论甚至动荡。

他还说了一件得意事。说，辛亥革命前，山西巡抚沈宝楨，是他在《国风报》上骂倒的。沈的去职，对辛亥革命在太原取得胜利是有好处的。因为沈的后任不像沈那样顽固，而且这位继沈任山西巡抚的人的公子还是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当时在太原牺牲的。

《国风报》在北京与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办的《民立》、《民呼》、《民吁》报南北辉映，辛亥革命前夕，即发挥了很不小的宣传作用。《国风报》几次起伏，民初以后就再没有延续下来。

景先生还是一位“红学”专家，他研究《红楼梦》同蔡子民（元培）先生一样，是“红学索隐派”。当时他印有《红楼梦真谛》上下两册，蒙即题赠给我一部。

解放后，景梅九先生仍定居西安，曾写了不少歌颂新社会的诗作。景先生擅长旧体诗词，不少篇什，为朋辈所传颂。文化大革命前，尚见到解放后景先生新诗作的小册子，以后连他本人的情况也不知晓了，更不用说他的诗作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于呼和浩特）

# 回忆晋绥军六十一军天镇抗战

## 兼述李服膺之死

杨 维 垣

### 前 言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发生，充分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亡我之心毕露。伟大的中华民族举国一致奋起卫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当时我六十一军所辖一〇一师（两个旅）、独二〇〇旅（三个团）、驻防平绥铁路沿线天镇、阳高、大同、丰镇和兴和等地，正在积极赶筑国防永久工事，实际已处于战备状态，奉令隶属傅作义将军的第七集团军建制。傅自率其三十五军主力（马苦寿独七旅、孙兰峰独二一一旅）、正循平绥铁路乘火车经大同、张家口向南口驰援中央军汤恩伯十三军与山西军陈长捷七十二师之作战。同时，三十五军之董其武独二一八旅，由副军长曾延毅（设有副军部，参谋长郝莘田）指挥，经集宁、向察北商都伪蒙古军李守信部进攻。我六十一军奉傅作义将军命令沿平绥铁路随后向东续进。正当三十五军主力部队两个独立旅先头已过张家口、下花园东进中，我六十一军先头独二〇〇旅进抵孔家庄车站附近之际，日军东条英机旅团与伪蒙古军突由张北向万全、张家口挺进、企图截断平绥铁路南口守军与三十五军后方联络线与退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率其二十九军（宋哲元）的新二师（已扩充为一个军实力），自动经察南向南大撤退。南口守军向

蔚县、广灵转进。此时，傅作义奉阎锡山电令率其三十五军主力又经张家口西返晋北大同、令该之军独二一一旅的四二一团（刘景新）在孔家庄车站下车配合六十一军之独二〇〇旅（刘谭馥）向万全城南山地对敌进行阻击，掩护军主力安全西撤。李服膺军长奉傅作义、阎锡山电令，率本军由柴沟堡等处后撤于天镇、盘山、阳高占领既设阵地，拒止日军西犯，掩护二战区主力军傅作义三十五军、王靖国十九军、赵承绶骑一军等部在大同地区集结，准备与日军进行会战（绥东仅留中央军门炳岳骑七师与石玉山等部，三十五军之独二一八旅与副军部撤至大同归建）。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原任晋绥军六十一军之一〇一师（李俊功）的二一三旅旅长，所属第四二五团（李在溪）、第四二六团（高朝栋）。抗战初，曾亲身经历六十一军在天镇东盘山、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迄北山瓦窑口之线与天镇城抗击日军西犯，浴血战斗，迟滞日军之西进达十余日之久。现就回忆所及，略述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一带抗击日军进犯的战斗经过于下，供编史者参考。

## 一、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抗击日军

### 进犯的战斗部署

军长李服膺先是奉到固守天镇东盘山迄北山之线和天镇城防守三天以上任务。由于与军参谋长刘金声和独二〇〇旅旅长刘谭馥（原是李服膺的老参谋长、关系密切）三人对敌情、任务估计不够周详，在匆忙撤退中，率尔作出如下的一线式消极防御的兵力配备：

以独二〇〇旅的四〇〇团（李生润）占据盘山制高点固守尚未竣工的国防工事阵地。以一〇一师占领盘山北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迄北山瓦窑口之线阵地（临时构筑野战工事），由李俊功师长负统一指挥天镇东第一线作战之责。于师长所率计有二〇一旅（旅长王丕荣），杨维垣旅之位置于天镇城内第一线之四〇二团计有四〇一团、四〇〇团共四个团兵力。以独二〇〇旅之三九九团（张敬俊）驻守天镇城防工事。军司令部与独二〇〇旅旅长及其×××团（白儒卿）位置于阳高县城内。

## 二、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一带战

### 斗经过实况

我二一三旅和二〇一旅之四〇一团（刘庸之）进入自盘山北侧经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之第一线阵地，赶筑野战工事，未过两天，大约在八月中旬末，即发现正面日军东条旅团与伪蒙古军先头部队，开始逐次展开，自北而南，向我北山瓦窑口迄盘山主阵地攻击前进。其攻击重点直指盘山，志在先得。敌凭飞机等侦察，对我军的兵力部署，瞭如指掌。对我一〇一师自盘山以北迄北山之线的进攻，则是助攻，目的在于牵制我师兵力，不得抽出转移，增援盘山。战斗发生后，我第一线官兵由于不多日前，先后受到军长李服膺亲莅部队讲话和告全军官兵书的激励，士气旺盛，战志昂扬，对于敌人频繁多次的步、炮（空）及战车进攻，均予迎头击退。此时，军长李服膺在阳高城内坐卧不安，率幕僚人员与军直属骑兵连进驻天镇城西村庄，亲临前线后方，指挥作战。敌人连续进攻七天，夜间则是彻夜炮击，敌我双



方伤亡日甚一日，敌我对比，敌重于我。我守盘山的四〇〇团伤亡较重，计阵亡营长高保庸和伤亡连长以下五〇〇多人，我旅的四二五团伤亡亦重，再次是二〇一旅的四〇一团和我旅的四二六团，综计我一〇一师伤亡官兵已达千余人。我旅四二五团团团长李在溪对抗战一直持悲观消极态度，在阵前竟越师、旅长多次迳电军长请病假辞职。军长知他无病，复电责以大义，指示他勉为其难。我见他指挥不力，将原以该团抽作旅预备队的一个营，加入该团阵地，也不起作用，以致该团程琮营被敌人突破一个口，全团溃退下来，幸我严令该团立即反攻上去，虽未完全恢复原阵地，总算稳住全线，未受严重影响。但不幸的是：盘山之四〇〇团因伤亡损失惨重又极度困惫不堪，而又始终得不到后援，陷于弹尽粮绝之境，团长李生润（曾任过李在溪团的副团长）在敌人继续猛烈压迫攻击下，掌握不住部队，纷纷向后撤退，自己亦跟着下来，盘山就是这样失守的。我师全线阵地战况较前益趋激烈起来，又坚持奋战了一天，始奉到师长李俊功电话命令，撤离原阵地，分两路绕经天镇城南城北向天镇以西方向转进。因为是在白天撤退的，正面敌人亦分两路对我紧跟尾追，误认为天镇是座空城，亦分经城南城北而过。但当它的后勤官兵几十人进至天镇城，叫开城门，冒然鱼贯而入时，被潜伏城内的三九九团，全部消灭，把被杀日寇的人头挂在城墙上。因此，敌人后续部队，对天镇进行攻城战斗，该团与敌对峙三天以上，予敌人以较大伤亡。该团虽伤亡不多，但因弹尽粮绝，为了避免被围歼，乃自动突围向广灵附近转进。日军进城后，迁怒于天镇城内居民户，实行三光政策，大肆屠杀抢掠和奸污妇女，惨不忍睹（这是在抗战后期，由天镇城内来人向我面述的）。

### 三、盘山、天镇失守后六十一军之转进

我一〇一师继独二〇〇旅四〇〇团弃守盘山之后，向天镇以西撤退。当我率本旅四二五团转进至阳高以西南山区白登村附近，闻知军长李服膺尚在该村内，当即前往面见，报告前线战斗经过概况。军长告知我，已指示一〇一师和独二〇〇旅向广灵以西地区集结，令我率四二五团续向广灵以西转进，将损失伤亡甚重的各营各缩编为一个连，营长赴后方接领新兵，注意掌握好部队，准备继续抗战。又说：四〇〇团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谭馥及军参谋长刘金声，已到后方军部与副军长贾学明一起，听候我回去作战后检讨，当时我看见军长面带戚容，顺便谈到盘山、天镇之战，虽超时限（连后又追加三天共六天）完成作战任务，但对尔后战局影响甚为不利。军长流露出来那种沉痛语气，我亦深有同感。

### 四、李服膺军长被冤杀的经过与内幕

当李服膺与军主力转进至广灵以西地区，经应县向雁门关撤退途中，忽然奉到阎锡山召开军长会议的电令。李军长原拟开作战检讨会后去见阎，于是提前应召见阎报到，谁知竟遭到阎氏莫明其妙地扣捕关押。不久就未经过正式军法审判，只由阎氏本人亲自对李服膺军长面训了几句话，便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杀害了。事实上，阎锡山知道如交付当时二战区军法总监张培梅依法判处，李军长必然是无罪的，更不是死罪。听说张曾向阎请求将李军长释放或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听。相反，后来转到晋西地区继续抗战中，张培梅曾以死力争要杀王靖国军长，阎氏偏袒

王靖国，执意不肯。张培梅以“抗战无力（无兵权）。执法无权”而喝大烟土自戕。嗣后，傅作义将军曾向我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主力军各军准备与日军板垣等师团进行会战。先是令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固守三天，迟滞日军的西犯，掩护主力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盘山任务三天，共计六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迳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关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于大同会战的原计划。于是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盘山已超过时限完成作战任务，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社会舆论哗然。我曾告诉李军长不要离开部队，急于应召去见阎。而李军长平生为人尽忠厚有余了，对上级长官一向绝对服从惯了，不听我的话。到达太原以北太和岭口长官部前进指挥所，就遭到逮捕关押，准备处决。”后来傅将军又一次向我说：“当你们军长被扣押起来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国防永久工事阵地的失守，影响天镇城之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以励军心和应付国内社会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李军长可以获释回军。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大混蛋、也太窝囊，李生润团长太蠢种，没骨头怕死。竟让李生润回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潜逃西安。即使如此，应当一面派宪兵追捕李生润，一面将贾学明与刘谭馥逮捕问罪。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而结果保全了一卒、一车、一相，而丢了将。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

李服膺军长遇害后，当时报纸报道说什么阎锡山亲自审问李

军长：我将你以排长提拔到当了军长，不想你指挥失误，以一个军兵力，竟固守不住本战区门户盘山坚固阵地和天镇城防永久工事，让敌军很快长驱直入……如此影响战局，罪责实难宽恕。既不提李军长远超过六天时限完成固守任务的实战经过，也不容李军长置答一词（事实上李军长之为人，一贯忠诚有余，而又勇于承担责任，绝非幸生之徒，此时也绝不会说什么话的），就让左右人将李军长架上汽车拉出去予以杀害了。

## 五、六十一军主力部队继续投入抗战

我六十一军主力部队向雁门关转进途中，经过在应县大小石口、茹峪口等处与日军先头部队战斗后，即奉令向雁门关内繁峙、大营镇、平型关一带转进。在日军飞机侦炸下，又奉令向五台山转移，归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统一指挥。朱德总司令在五台台怀镇东玉皇阁大寺院，召集我师旅团级以上指挥员讲话，指示作战的方针和任务。我二一三旅奉令占领北台顶至华岩岭阵地，曾派四二五团程琮营乘机不断袭击繁峙、大营一带敌人。后因傅作义将军当时兼任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在忻口一带负责部署大会战，一〇一师师长李俊功奉令先率二〇一旅开往忻口参加会战。忻口会战，因受晋东娘子关方面作战不利影响，提前结束，大军向南大撤退。阎锡山指定傅总指挥所部三十五军及其他等部队守太原城，自己就撤往晋南临汾去了。此时傅总指挥电朱德总司令调我二一三旅开回太原，参加守城战役。到达后，傅总指挥头一句话就说：你们军长不听我的话（不要见阎），你们副军长贾学明不聪明，不客气地说他是个混蛋，不该放走李生润团长。李军长虽然牺牲了，但是，是有代价的！见傅后，我即带全旅军

官、佐属乘大汽车前往军长的坟墓献了花，致以哀悼。关于太原守城部署，本旅系担任整个南城包括新南（首义）门、大南门的防守任务。此一守城战役，也象南京守城战役一样，有始无终，没有打好。这里就不必详细赘述（如有必要当另文忆述）。太原战役后，我二一三旅随同三十五军西渡汾河，向晋西转进，从事休整、准备再战。尔后在河曲见到傅作义将军时，他头一句话又说：你们军长不该不听我的话，离开部队去见阎长官。第二句又骂贾学明大混蛋！不该放走无耻懦种团长李生润！足以说明我们军长李服膺确实是被阎锡山冤杀的，也足以说明阎锡山杀害李军长是颇不得军心的！

## 后 语

李服膺军长被阎锡山无辜杀害后，他的大女儿李颀英为了继承其父遗志，从家中拿了一支手枪出走投奔当时山西青年牺盟会决死队（即山西新军），献身于抗日斗争去了。独二〇〇旅旅长刘谭馥与六十一军参谋长刘金声不几天也相率离晋向西安、郑州而去，分别投奔西安军委会后勤部办事处和一战区长官（程潜）部任高参。据他们分别向熟识同学们透露：李军长之死，并非因作战指挥不当，完不成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抗战开始盘山、天镇、大同、丰镇、兴和、集宁等地国防永久工事，尚未竣工、南京参谋本部城塞组拨发太原绥靖公署的国防工事费，真正发下去的不多。这对二战区战局影响颇为不利。为了应付南京大本营（军委会）和国内社会舆论，阎锡山非杀个把军师旅长，不足以解脱自己罪责。结果连一个团长李生润也让贾学明放跑了，竟成了李军长速死的催命符。

## 我所知道的玉禄

瑞 辑 五

国民二年，我二十岁，刚从归绥中学肄业。归绥这个中学堂，按当时的课程来讲比较深，等于现在的高中课程。在全省来说，它算是最高的学府了。我从该校肄业后，因再没有其它的出路，也就找了土旗蒙人唯一的出路——军队职业。因此，对玉禄的军职、历史有所了解。现将我所知的有关情况介绍出来，以供编史部门参考。

在未谈他的历史以前，我想把绥远城的当年历史情况，简述一下。“归绥”是绥远的首府，分为新旧二城，新城是绥远城，旧城就是归化城，二者合起就是现在的内蒙呼和浩特。当时（即民国二年前）坐镇归化城的主官是个副都统，是一个清代二品官衔的满洲人，名叫麟寿。按土默特旗原有的十二个参领（俗称噶拉达），均隶属副都统节制。有要事须召集他们商酌、研究。但是这些参领都是有名无权，遇事多不能自己处理，必须要申请这位都统才能决定。说明这些参领们如同算盘珠子一样，随人家摆动。而绥远城是由一个将军坐镇，他是满清一品官衔的大将军，名叫坤岫。按清朝制度，他是节制边疆厅道的一位大官，在军事政治上，有很大的权威。在绥远城里居住的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多属满洲旗人，这些旗人分为红、黄、兰旗等名称。这些人的生活待遇，清廷对他们很优厚，所需的生活费用，完全由绥远城

的将军衙门国库开支。凡旗人的男女老少，以及初生的小孩，都有一定不同数量的俸禄。最优越的是“马甲”，是满洲旗的常备军，因其生活十分优越，所以这些人就养成了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自由散漫的习惯。归化城的居民，包括有汉族、蒙族、回族等民族。这是当年新旧二城的实际情况。

谈到军队方面，当时土默特旗的军队，仅有一个步兵营的兵力，它的番号叫陆军步兵第二营。这个营的营长名叫发义，字仁山，系土默特旗人；营附名叫福坦，字兰亭，系我的叔父。全营官兵不过六百多名，每月官兵的餉项，统由土默特旗的煤炭税厘内筹措支付。而陆军步兵第一营是由绥远城满人编制而成，这个营的军队稍微扩大一些，其中还有一个炮兵连。在那时候，新旧城的军队就是这样一点，共同分担着两城的巡防、捕盗等治安方面的责任。这时候玉禄即担任着步兵第二营的少尉排长。民国二年的冬天，张绍曾调为绥远将军后，他即带来警卫军百余名，给他作左右护卫。同时并命令土默特旗增添骑兵一营，以充实绥远兵力。这个骑兵营的第一位营长由福坦担任。该营是以私马队编组起来的。什么叫私马队呢？就是凡去当兵的人，须牵上自己的私马，经过人马检验后方许入伍。经过一月有余这个骑兵营才编组起来。当时全营共分四个连，每连官兵约有百十多名。其中的官兵绝大多数是土旗的蒙人。是年玉禄从步二营调任为马二营第三连的连长。那时候土旗的蒙民因找不到其它的生活出路，只好当兵吃粮。至于地方机关等方面，那更没有蒙古人的份儿。但提蒙古人，当下就被拒绝。所以说蒙古民族在满清时代，直到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期，它也是一个最受压迫的民族。

玉禄在那种反动统治的压迫下，也常抱着不满的情绪，但因为自己没有多大的权力，也没有支持他的后台，所以，只好隐忍而已。

在骑兵营编组以后，张绍曾又要添练一个宪兵连，想以此控制各营。宪兵连的编组办法，是从马步营里挑选产生，计每连要四个稍通文化的士兵合组。这样挑选人数不够时，即从孟效曾统领部下的第一镇补充。当时这些宪兵是在新城南门里的学院内训练的。张绍曾教练这个宪兵连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作为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部队，依靠它来控制归绥两城地方上这些官兵们。

此时，张绍曾饬令马二营全部开往武川县后山一带分头驻扎。当时部队是这样布防的：二营营部驻可镇城（今武川县城）里，奉令后即行开拔；并先令第三连（即玉禄连）驻卢家××村，其它各连分别另行安排了驻地。玉禄到了××村以后，和村里的人民十分接近。他常对百姓们说：“我的官兵如有对你们骚扰的地方，你们可以随时向我来说，我一定给你们作主，不让他们胡闹。”从这以后，该连官兵和当地百姓，相处得很好，团结得也很密切。玉禄对他的部下讲话时也常说：“我们现在离开了长官的管制，总算有权在手可以操纵一切了。能做一番于人民（指蒙民）有益的事业，那才不愧是人生在世应有的英雄气概。”

有一天他的连部，突然来了两个喇嘛，声称要与连长面谈。他们见面交谈了一阵，玉禄便吩咐差人另找了一室，仅他们三人密谈了三、四小时。晚饭后他们又密谈了几小时，次日这两个喇嘛就辞去了。当时谁也不认识这两个喇嘛究竟是谁，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事后，才知道这两个喇嘛，一个名叫龙图，一个名叫达赖，原籍都是土默特旗人，是某召庙的喇嘛。库伦事变后，他们二人就到了外蒙。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勾串玉禄带队投降外蒙。

自从喇嘛走后，玉禄行动上有些不寻常。民国二年的旧历十一月的一天，他忽然命令全连官兵紧急集合，向百灵庙进发。部



队集合后，玉禄向大家讲话说：“这次我们队伍前往百灵庙是有任务的，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要有战事，但是不要害怕，我们的枪械弹药是有办法的。大家要抱有坚定的决心，将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消息当日就传到了可镇城里。人言啧啧，街谈巷议，其说不一。这时营部派骑兵二名星夜前往卢家××村探视。第二天探兵回报，第三连全连官兵确实已向百灵庙哗变了，对地方上秋毫无犯。营长听到消息后，赶紧具文呈报。那时绥远有山西晋军赵友庆部高司令的一点部队，兵少将寡，弹药亦不充足。好在结合地方上一些军队，便兴兵直往百灵庙方向兜剿玉禄的队伍。这些部队到达后，从民国三年（即一九一四年）的旧历二月，双方发生激战，一直对战半年，也没把玉禄的部队歼灭掉，相反地官军日渐受挫，终于陆续撤回绥远。玉禄仍然据守百灵庙。

这时候因晋绥正在划分区域，晋军系统的军政人员奉命离绥，全部调回山西。民国三年十月，二十镇的军队向百灵庙进发，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把玉禄全部歼灭。该镇是正规军，武装齐整，又是步炮营，弹药也充足，交战后，差不多每天都有激战。这时草原上气候严寒，二十镇的官兵每天在冰天雪地中作战，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兵有怨言，士气低落。一日，玉禄的军队突然向后撤退，该镇军队即奋勇尾追。玉禄将军队分作三股，由主力向正面发动反击，另由左右两翼策应，采取包围的态势。二十镇军队，因地理不熟，长驱直入，被玉禄部队将追兵首尾截断，阵地几面受击，终至弃械逃跑，有的迷失方向被捕获枪杀，临退回百灵庙时，士气沮丧，已不堪再战，卒将百灵庙大庙放火烧毁，抢掠一空，然后退回绥远。大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召庙，里边的文物古迹很多，有数百名喇嘛。北洋军队焚毁大庙引起了当地蒙族人民和王公喇嘛的极大愤懑。玉禄部在这场战役中大获胜利，夺

获枪支弹药无数，同时外蒙也给他接济来一批俄造的连珠步枪，士气更加旺盛。这时有人主张，乘胜向绥远的官军进击。玉禄未予同意。

从这以后，绥远当局就把剿除改为收抚。由土旗总管公署会同归化城商会办理收抚工作。当时土旗委派伊参领、森参领二员和商会的段敬斋（履庄）会长负责进行。他们先前往可镇马二营营部和营长福坦磋商，然后派人通知了玉禄，将这次有关收抚的一切事宜告知与他，并说明有绥远商会完全负责。玉禄与部属经过详细商讨，决定接受招抚。并派副官朱海、塔庆额前去进行商讨，双方见面谈得很融洽，首先朱海提出，应编组四队官兵，人数约四百多名，番号要游击队的名称，并要求先给核发一个月的饷项以示鼓励。绥远当局接报后，准予所请。

是年入冬后，匪首卢占魁由绥东隆盛庄窜后山一带，杀人放火，所过为墟。玉禄下令兜剿卢匪。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卢部匪众扩展到两千多名，气势更为嚣张。这时，玉禄部被改编为第四路警备队，玉禄任司令，仍承担剿匪任务。

一九二零年（民国九年）马福祥任绥远都统，玉禄部调驻绥东大滩一带，改编为绥远骑兵补充团。是年又调往包头，编为第九支队，共辖三个骑兵团，支队长为李鹤祥。三个团全由他指挥，后来开往陕北榆林作为地方援陕力量。民国十年又调返包头，分防驻扎。民国十一年六月匪首杨猴小、赵有禄等匪夥，围攻包头，形势危急，玉禄调来军队和股匪作战，由中午一直战至日落西山，土匪才向后撤。在这次战役中，玉禄部下的多才队长，奋不顾身，英勇顽强，和随从士兵数人壮烈牺牲疆场。从此土匪后退，包头未被攻破，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这确是玉禄部队及时增援的结果。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李鸣钟来绥，石友三来包。土匪哥老会群起，地方无一天安静。玉禄亲自率带他的一、三两连赴河西剿匪，在杨三虎圪卜与土匪遭遇。在激战中，玉禄受伤，士兵只顾护卫玉禄，马上被匪包围过来，将玉禄俘虏。大家商讨一面具文呈报，一面推选临时代理团长的人选。一致同意副官满泰暂行代理。正在乱吵之际，忽然探兵回报，股匪已向南梁外溃逃，并悉团长已被杀死，将尸首抛下。经地方上百姓派人将尸体收拾起来，满泰即时调选二十名骑兵，排长一员，护送着尸体到了包头妥为安排。这时石友三转请绥省当下发给治丧费三千元，所有玉团长后人，由国家完全培养，以慰英魂。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一点玉禄的历史概况，有疏漏不恰当之处，尚希社会上了解者加以补充和批评。

# 满泰小传

程景华

满泰，字子舒，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一八八三年出生于鄂尔格逊村。幼年时期在本村私塾读书十年，勤奋好学，通晓四书五经。一九〇七年，山西同盟会派遣王建屏、李德懋等人，赴包头、萨县一带，联络塞外有志之士搞革命。李德懋系大同人，精通拳术，住在鄂尔格逊村，以收徒教拳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与该村塾师富日新先生结为盟友，经富先生推荐，李收满泰为徒，教以武功。这个独具慧眼的教师，“相中”了满泰，断言其为“可造之材”，重点培养，并加强了武术道德教育，明确指出：学武术之目的，“是练筋骨，扶正义，斗邪恶”。李还将同盟会印行的刊物介绍给满泰，由此他接受了新思想。

满泰从师学武以后，勤学苦练，每天五更起身，头顶星斗，一直练到旭日东升。经过几年时间，对轻重拳和少林派的长拳，形意、太极、八卦诸门都已通晓，思想境界也大为开阔，最先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其后云亨（字嘉会，蒙古族，土默特旗水洞沟门人）、安祥（字子政，蒙古族，土默特旗善岱村人）、经权（字子衡，蒙古族，土默特旗美岱村人）等也陆续加入同盟会。这些蒙古健儿在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一一年，阎锡山率革命军进占了包头城以后，绥远的坤岫将军调集了谭诵发的部队和满洲常备队的炮兵，赶到萨县城堵

防，当时满泰见县城内来了清朝的军队，连夜赶奔包头给革命军报了信，使阎锡山的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

满泰在任萨拉齐蒙古谘议员时，和云亨、安祥、经权等同盟会员联合一起，对抗守旧派，成为当时蒙古族青年进步力量的核心。

满泰敢于抨击时弊，敢于同害民的军阀、政客作斗争。一九一五年间，曾与当时任萨县第五区地方团队的领导人安祥起兵反对蒋雁行都统在绥远大种鸦片的反动政策，得到地方绅士的协助，向北京政府告倒了这个北洋军阀。

一九一六年以后，满泰在萨拉齐任萨一一武两厅管带（警备队长）期间，目睹军阀、政客横行，广种鸦片，聚敛财物，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面进行舆论抨击，一面提出了“绥人治绥”的倡议。与安祥、云亨、刘会文、李雨山一起，发起“五英雄”起义，争取摆脱军阀的统治。满泰等率领警备队、矿巡队和各区的团队向东进攻，直捣武川县境，与军阀队伍奋战，因弹药不足，陷于敌人包围。结果，刘会文受伤，李雨山阵亡，满泰逃往五当召，充当喇嘛。

后来他怀着强烈的革命愿望，投奔绥西清乡司令玉禄部任副职，保佑乡里。不久，升任骑兵第一团（即老一团）上校团长。玉禄率队往河西东胜剿除股匪刘喇嘛、苏雨生伙众，在杨三虎圪卜阵亡。满泰深为痛悼，他厉兵秣马，为继玉禄未竟之志，率老一团歼灭巨匪，屡建奇功。以后，满泰升任骑兵第一旅少将旅长兼剿匪司令，又晋级为骑兵第三师中将师长，兼三十一军副军长及绥西镇守使。他爱乡爱国，志在守土安民，素不参予各方内战。

当奉系军阀汲金纯任绥远都统时，委任他为绥远护理都统。不久，汲以赴前方剿匪为名，向东撤退了。附近的杂牌军金山山等

乘机闯入归绥（今呼市），纵兵抢劫扰乱地方，接着王英也率袁占鳌、杨守成两个旅从包头乘火车赶到省城，一时新旧城秩序大乱，满泰挺身而出，立令各部军队撤出归绥，安定了省政。接着晋系军阀商震带兵赶到，接了都统，他重返包头。一九二八年解甲归田后，被挽留为土默特旗总管。以往历任总管的工资是每月五百银元，办公费也是每月五百元，他接任伊始，便说：“从现在开始，把我的工资和办公费都缩减一半，各为二百五十元，其他官员一律不减。”这样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一九三一年，晋系军阀阎锡山利用他在蒙古族人民中的威望，委任他为乌、伊两盟十三旗蒙边司令及绥西绥北两路护路司令，他综理军政，事必躬行，劳累过度，身体衰弱，于一九三四年夏，积病逝世。

满泰一生以热爱桑梓为主旨，是土默特旗蒙古族的一位深明大义的著名人物。

（一九八三年六月再稿）

# 蒙古王公达赉贝子的没落

温大明

清末以来，蒙古封建贵族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没落的，仅就我亲自的见闻，将哲里木盟蒙古王公达贝子父子两辈的奢侈生活和没落情况写出来，以见一斑。

## 从巴户人温家说起

为便于了解历史背景，在未说达赉贝子前，得先从我们巴户人温家说起。

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的王爷，其先世在清初即为驸马，乾隆皇帝把亲生女儿端敏固伦公主下嫁给中旗王爷，这是清王朝“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政策的体现。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端敏公主下嫁时，陪嫁的有各行各业的工匠人等，可谓七十二行，应有尽有。如木匠、瓦匠、石匠、泥匠、金匠、银匠、铁匠、锡匠、皮匠、粉匠、油漆匠、碾子匠、糕点匠、豆腐匠、兽医、中医、厨师和兵役等等，这些人都是供公主驱使的奴隶。我的祖先原是京东固安县汉人，因作为公主的陪嫁奴隶随公主到了蒙旗，就成为蒙古族了。凡陪嫁来的其他工匠人等，也都成为蒙古族，一般称为“巴户”人。后来，在公主死后，我们温姓家族又成为看守公主陵寝的“巴户”

了。共有百户之多，均住在王爷陵村。

端敏公主陵，在辽宁省法库县西北三十五里的大黑山，俗称王爷陵。这一陵寝方园有三十华里，山上布满各种树木，称为“禁地”。管理陵寝的人员，为首的叫陵寝扎兰，四品顶戴（相当知府级），下设有衙门达，五品顶戴（相当知州级），还设有山达等官职。陵寝扎兰就是总管，掌管春秋二祭，并处理陵寝一切事务，官印为“王爷陵寝总管之铃记”，遇事可以对各州府县行文。向王府各上级呈报公文时，也以此官印为证。衙门达主管祭礼和修理陵园，山达主管带兵查山，俗称陵防营队官。我的远祖温全任过陵寝扎兰，我的族伯温有业任过中公益地局局长兼扎兰官三十多年，因而暴富，在法库县有民地两万多亩，并在法库县城内开设永仪德大茶食店、永顺和粮栈，在沈阳西关开设一个东升旅馆。解放前到法库县一提王爷陵老温家，人人都是个大财主。族兄温显池、温莲池和温廷等，都任过陵寝扎兰。族兄温玉堂久任京差，他的儿子温景和给达尔罕王当护卫。

温有业的孙子温永和，字旭东，外号叫“二不吃人饭的”。是说他无论到何处去，都自带厨师，自己做饭，一向不赴人宴会。家中来亲友，他仅坐在旁边交谈，不与人共同吃饭。一九二六年，我到他家吃饭时，论家谱我是他的叔辈，吃饭时摆了满桌子菜，他坐在旁边相陪，一口不吃，只是谈话而已。这个温永和对贫苦家族亲友和雇工农民的剥削压榨，极为惨酷，因此人人痛恨他。每逢大年三十，乘他家接神之际，有很多穷苦家族往他家大门上张贴极丧的讣文来咒骂他。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五日，他的弟弟代表他到王爷陵寝祭灵时，被土匪“绑票”，索取现银五万元，听说这是由于本村穷苦家族愤恨他，暗中与土匪勾结做出来的。他家每年都雇佣五十多个工人，除收地租子外，自己耕种了



五百多亩，房后有个大场院。一九二五年间，本村农民将其大场院的全垛庄稼用火点着，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火灾，燃烧了三天三夜，将满场的高粱、谷子、大豆等粮食都烧光了。但是，他不让人去救火，深怕人们乘机抢他的财物。据说这场大火，烧毁的各种粮食约有三千多石（每石五百斤），他毫不在乎。火后还添置了九百多亩土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温永和逃避北平，因愁家财多不能归理，患暴病身亡。

## 贝子达赉与“京公爷”府

科左中旗的贝子达赉，是清代乾隆驸马的后裔。其祖父棍楚格林沁，任过御前大臣、引马大臣，家中挂有光绪皇帝御赐的“国恩家庆”匾，有慈禧写的“福寿”字。父亲老纳公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曾伴驾去过西安避难。

贝子达赉，人称“达贝子”，大约生于一八七〇年左右，卒于一九二九年左右。他通晓汉语、汉文。在清代，蒙旗王公掌管旗政的为扎萨克，一般称为扎萨克王爷。他虽不是扎萨克王爷，因祖先是皇亲，久居北京，成为哲里木盟十旗的驻京代表，人称为驻京押班贝子，也称京公爷。

清制：蒙古王子都得按期去北京上朝值班（年班），陪皇护驾，实为“质子”。由于内蒙古距北京远，交通不便，哲里木盟十旗即由达贝子这支皇亲，留驻北京，代表各旗承转皇帝下达的旨意、公文，召集蒙王值班或会议。这样，达贝子就掌握了上靠天子之势，下令蒙古藩王之权。随时都能借转达各王公向皇帝进贡之物，从中得利，发财致富。到民国初年，不仅是哲盟十旗王公的代表，还受袁世凯器重，聘为大总统高级顾问，参与蒙藏院

的会议，可乘坐汽车直达总统府。听说每月支给他车马费上千元。加之对贫苦蒙汉民的残酷压榨剥削，不但门第高贵，财产也十分可观。

达贝子在科左中旗的财产，据一九一〇年统计：有牛一千多头，马三、四百匹，羊几千只。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中公益地局一处，在梨树县有中成地局一处，两个地局子一季收租十万元，一年两季收入亩捐二十万元。从光绪年开始，到解放前为止，历时数十年，不知吮吸了多少农民血汗，供他挥霍享受。一九二七年，达贝子又在本旗开荒约有三万亩，出租给百户汉族农民耕种，一付犁杖收租十石，好地十五石，年收上千石。为此，在贝子府专设一地局子负责收租。还有一个家庙，称为“伊克藤格庙”，养百名喇嘛。那时，府有府界，陵有陵界，庙有庙界，各有上千亩土地，由农奴无代价耕种，一年收获，均归他们独占。

达贝子除上述财产外，还有一二万壮丁做为奴隶。其中，有我们温姓的上百户，李姓的七、八十户，德姓的五、六十户，王姓的几十户，刘姓的几十户以及席姓等共五百多户，是为巴户人。在他府中占有上层地位，除我们温姓情况已如上述外，德姓有德本，当过中公益地局局长，德增当过中成地局局长，德玉臣给达尔罕王当过护卫，还有我的岳父德玉林是个大财主，人称“德二爷”。王姓有王守山，乳名香林，当带兵统领官。刘姓则有刘喜亭当梅伦苏，通辽共合地局局长。席姓给他辈辈当厨役。

达贝子常驻北京，在北京设有公爷府，有六十多人；在本旗的公爷府，人称“北府”，有五六十人；几处地局子职员四十多人，庙上还有喇嘛上百人，这些人也都不事生产，全靠蒙汉劳动人民养活。

达贝子在本旗有“公爷府”。而驻北京的府第称为“驻京公

爷府”，即达贝子府。此府原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院墙高耸，虎亮大门，院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房舍有大厅、客厅、书房、家堂和花园、鸽子房等应有尽有，极其华丽。

府内，设有管事处、回事处、帐房、护卫室、厨房、汽车房，并有警察房等等。这些机构的管事人员，多半是北京本地人和会讲汉语的蒙族巴户人。

民国初年达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都是北京人，蒙民称之为王二老爷、晋三老爷。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五年间，又换了汉人蔡珍（京东人）和巴户人敖达（通辽县四家村人）及李景阳等人。一九三一年间，是北京人张庆隆和骆骏。

在京当差的人，分为三级：管事人为一等护卫（三品顶戴），还有二等护卫（四品顶戴），三等护卫（五品顶戴）。我的族兄温玉堂曾为达贝子父子当过二十多年差，仅列为三等护卫。

所谓管事处，是专管王府每日生活和采买，支配府内一切为王公服役人员的工作，奉命到蒙古内地传达旨意和王公手谕、指示等各种事务。

蒙古封建王公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可以用三“摆”来概括：爱摆谱儿，爱摆臭架子，爱摆阔气。达赉贝子亦是如此。

北京公爷府内的生活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达贝子每日早晚必吸大烟，由北京人晋杰臣跪在地上给他烧大烟泡，送到他嘴里抽。每天除早晚喝点奶子茶，还另摆不重样的三种酒席。在吃饭时，达贝子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人一桌酒席，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北京汇文学校毕业，人称多公爷）和多的太太马淑俊（是奉天某道台之女，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酒席，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则单独一桌。至于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又另外开饭。全家一次饭要分成四回开，忙

得厨役、佣人来回跑。王二、晋三和温玉堂等人管老贝子夫妇开饭；骆骏、倭什浑和李明山等人管少公爷开饭；关文信、李明福和丹森等人管阿哥爷开饭；女仆北京人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人管大格格一人开饭。开饭时，各男女仆人和丫环，以立正姿势，环立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菜饭。对主人要有呼必应，有问必答，只准唯唯从命，不许高声说话。

王公们吃饭把酒言欢时，爱摆这样的台谱：常问下人一些事情或是让下人讲故事，说古书助兴。达贝子开饭时，喜欢打听时局消息，询问哪里打仗了，谁胜谁负。我兄温玉堂为了投其所好，特别留心时事，他能做到有问必答。他还常给达赉讲三国故事，又善于阿谀奉承，称赞达贝子如何英明，如何宽宏大度。这样达赉很喜欢他，不但经常赏给他衣帽皮袄，而且也常委派他拿着公文到北府办事，到地局子催征提款，到上海采购物品，温玉堂就可以从中捞一把，因而发财暴富了。

达贝子还喜欢在府内演大戏。每逢他们生日寿辰和小儿满月等，都要找名角演唱，连北京四大名旦，也在召请之列。

民国初年，清朝是被推倒了，但蒙古的封建王公制度，却依然存在。他们在本旗出入时，仍然是穿着长袍短褂，头顶满清式的顶戴，着马靴，挎腰刀，有的乘马，有的坐轿，前呼后拥，跟随一群护卫，他们到处“打公馆”，吃酒席。农民每遇王公贵族来了，都得跪迎跪送，伏地行双腿跪拜礼，还得口呼什么“公爷王爷恩典”。王公们对蒙民们这种屈膝拜见，毫不理睬，装成主人对奴隶的样子，摆出一付臭架子。这里先插叙达贝子的族弟、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王的一件轶事：民国年间，达尔罕王常居于沈阳小河沿的达王府。他和奉派军阀头子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所到之处，都有汉族军政首长、机关团体到车站去欢迎。一九二四

年，当他要从沈阳出发回旗巡视的消息传到通辽后，即有驻通辽的骑兵师长穆春，以及其他军政商界著名人士，和蒙旗章京、梅林等上千汉蒙官员，齐集通辽火车站迎候。那时我正在通辽高小念书，也列队打着铜鼓洋号迎接这个达尔罕王。一时车站各色人物齐集，但见汉族军官中师旅长身穿礼服，头戴将军纓帽。在蒙古上层官员中各有红兰白三种顶戴，在僧人中有的身披黄缎子袈裟，有的头顶红鸡冠式帽。铁路站段长们个个头戴金线。警甲官员也都穿上官服，宪兵挎上东洋刀，成队走入站台。火车抵站时，不许旅客下车，等待达王夫妇两人出站台后，方许旅客出站。达王下车后，但听鼓号齐鸣，军乐大作。此时蒙古官员们都跪地迎接，不敢仰视，口称给王爷请安，求王爷、福晋太太恩典。汉族官员们给他行举手和脱帽礼，齐呼迎接王爷，一时声震天地。可是这个身材六尺，留着小辮，满脸横肉的达尔罕亲王偕着他爱妻朱小姐昂然从欢迎人群中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上了八人抬大轿，使欢迎者个个怒目横眉，心中不快而归。当他走出站台后，有很多军官破口大骂：什么龟孙王爷呀，为啥连一点人情也不懂，简直不如禽兽。还有人说：你别看狗尿台子不好，可常到金銮殿上啦，张大帅的闺女给他儿子啦。当时直气得通辽县长李新榜、教育公所所长马庆武齐说：“达王对人无礼”。学生们也一致非议，引为可笑。

达贝子也是这样。他由府第走出时，先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们都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他乘轿车时，是脚踩着奴役脊背上车，乘马亦同；下车、马时，都是如此方式。到街上闲逛时，不与平民接触交谈。到商店时，装成高贵样子，端然正坐，不与商人谈话。有些商店老板到他面前招呼，口称“老爷”，他也不理睬，表示唯我独尊的样子。购置物品，都交给管家和当差

者去办。因此，一件物品，明明值一元钱，就向他索取三元，而他也欣然接受。他的左右，还以称赞的口气说：“王爷您老还在乎这几个钱吗？”他一高兴，就多买一些，这样，差役们就从中多得几个零花钱。北京后门外的通兴长，前门外的瑞蚨祥都是蒙古达王、阿穆尔灵圭亲王和达贝子府经常买东西的商号。通兴长的门前有蒙汉两文的招牌，瑞蚨祥的楼房专置有招待王公的糕点。用这些来勾哄他们多买东西。王公们上了当还夸说这些商店，下次还要到那里买东西。明明多花了钱，还来个“吃亏乐”，这正是他们挥霍成性的本质表现。

公爷府内等级森严，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和礼仪。凡奴仆进入内宅：第一不许仰面上视，第二不许左顾右盼。如果谁要违犯这两条，即着棍责。当初，我进府内见多公爷时，事前我兄温玉堂教我演习这一套礼仪。可是，我不习惯，一向他们下跪时，由于动作失调，引起了多尔吉之子的讥笑，责我请安时头晃失礼。我一进内宅，但见桌椅多是洁白玉器所制，陈设着各种千奇百怪的古瓶，雕刻之凤屏，古装箱柜等等都是与众不同的生活用具。我好像进入市场一样，就左顾右盼起来，致触多尔吉太太大怒，一声令下，驱我出府。幸亏大格格说情，以初入府第，不懂府规为由，而免责罚之苦。因此，我一度产生了抱怨情绪，叔父温有歧和我兄温振池齐声劝我：“别看在王爷跟前受点气，若把王爷侍候好了，他一高兴了，也许马上叫你发财，他一恼怒，也许要了你的性命。那就看你会不会和他玩心眼了。投其所好者言之，遇事恭维奉承，随声附和，使其捧腹大笑，马上就能放你做官，头顶爷家纓顶戴，到处受人尊敬，既升官，又发财！”这一套官场中生意经，对我的影响是很坏的。

公爷府内部，主人之间，主奴之间，互相斗争，互相欺哄，恨不

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正像《红楼梦》里说的“一个个乌眼鸡似的”。多尔吉的继母陈氏是吸大烟招野犬之流，多尔吉看不惯，怕丢祖先脸，碍于父面不敢公开反对。那时陈氏暗与老管家王二、晋三、蔡珍勾结，盗卖家中宝物，私人娘家腰包，达贝子终日贪花逛柳，尚在梦中。多尔吉告知，但达贝子宠妻正浓，不但不相信，反责儿子不孝，竟予申斥，而且父子情感也日益疏远。一九二六年一夜间，多尔吉偕其妻马淑俊，带其孩子包义，同亲信奴役骆骏、李明山和老妈子关姐、丫环绿叶十几人冒雪上火车跑沈阳。因为达贝子主要收入全靠东北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徵收的二十万地租为其生活费。多尔吉脑其父宠爱继母，为夺其父生活来源计，曾由其岳母马老太太托奉天张作霖五太太之母王松岩（号称王老太太）的门径，由王派其义子邓子镇持公爷的公事到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用武力驱走其父所派局长蔡珍，换了汉人有后台的邓子镇充任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就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多氏夫妇住。多后又下手谕委派我兄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企图从中监督。不料邓凡事不让温插手，在两年多的时间，邓某吞款暴富。达贝子闻讯后，星夜赶奔沈阳到达王府，当由达王太太朱小姐引他见了张学良，才把这个中公益地局夺回来。父子在沈阳由达王说情又重相逢，令多尔吉回旗。在父子互争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主权时，双方齐下手谕直逼得为他办事的奴仆们进退维谷。如中成地局局长德增，给北京达贝子上辞呈中说：“抗违老爷为不忠，不遵少爷为不义，既不忠，又不义，奴才何所取焉，唯有引退而已。”

在达贝子跟前当红差的，温玉堂为首屈一指，哄得达贝子言听计从，人人羡慕他有才能。这里还有个比温玉堂手段更高，专门欺哄多公爷的人叫骆骏，北京菊儿胡同人，外号“骠驹”，此人善

于言词，他见多公爷喜好奉承，欢迎拍捧，是一个完全不通事务的阔少爷，买什么东西向不问价，越贵他越爱。这个骆骏竟投其所好，因此获得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兼提款主任。有一次派他到地局提现洋五万元，他竟暗中吞为已有，回来交差时面见多公夫妇大哭，说款在火车上遗失，无颜见主人，说罢欲拿刀假装自杀，吓得多氏夫妇逃出门外呼喊救人，并安慰他说：“有人就有钱何必寻此短见”。很多人怀疑骆骏与马淑俊两人年貌相当，眉来眼去，有暧昧私情，但畏于其势多缄口不谈。骆骏的对头是多公爷另一侍卫蒙人李明山。李给多尔吉从小当过书僮。后来听说也与马发生关系，又把骆顶跑了。最后骆骏拐走一个蒙女丫环，跑到伪蒙疆自治政府补英达赖那里当差。李明山拐走了环绿叶，回伪满洲国当上蒙奸警察署长。解放后二人悉被镇压。

## 北府面面观

达贝子在科左中旗，建有公爷府，俗称“北府”（距通辽市北七十里地方），民国初年亦称达贝子府。按蒙制，府有府界，在公爷府周围二十里左右的地方不许蒙民居住。此府，有东府西府之别，是仿北京宫殿形式的建筑。大门外有黄砖筑的大影壁，两边置石狮子，上下马石，影壁外有两杆耸入云霄的旗杆，并有罗列整齐的许多拴马桩子，备王公开会时拴马之用。大门内外，有过厅走廊，并有庄严华丽的大厅。还有东西跨院和什么文书阁、内书房、公主梳妆台和会客厅等。在大厅左侧另开一个门，筑有许多房舍，这里是为公爷服务的一群蒙古官员的办公处所。有马棚、押人房、仓库、厨房等。这些官员为首的叫拜生达（三品顶戴），是公爷府的总管。下有“伯门”（三品顶戴），是问事主管。有



“哈番”两员（类似审讯员四品顶戴）。有扎兰一人（四品顶戴），专管户口和人事档案。另有传役达二人（五品顶戴），专管公爷府仓库收支和牛马等杂务。最下设当家的二人（五品顶戴），管理供给伙食和勤杂人员。以上这些官员，分为两班，每月轮流长期驻公爷府承受公爷之命，办理旗下的收租派款，民刑案件，管理达贝子所属蒙民的一切事宜。

这些官员的淫威甚于王公。那时凡属达贝子的奴隶，一切纠纷，一切民事案件，都上公爷府告状，由公爷府的老爷们裁决。蒙民打官司告状，进府后，先跪在地上，老爷们端坐在炕上，炕桌上置放着品级顶戴，蒙民面向顶戴，跪着讲话。侍候这些老爷的家奴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他们面前。每个官员都有一个专用喝茶扣碗。家奴给他们倒茶水时，得用双手捧送。给他们上酒席时，都得跪在地上捧献。稍一失礼，立即鞭打棍责。

这些官员内部的界限也很严格。上级到来，下级官员须出迎，一齐弯腰打躬，行见面礼。然后各按品级依次而坐。下级对上级称老师，如“伯们”官，称其上级拜生达为“拜生达巴克西”，“哈番”官称“伯们”官为“伯们巴克西”。因为蒙民没有什么学校设置，都是以师代徒制，相沿几百年，凡是伯们官多半是拜生达的徒弟，哈番是伯们官的徒弟。这些官员，一律是义务职，王公对他们仅供给伙食，没有薪金。因此他们就到处迫害蒙民，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如每月派粮派草派猪羊等供他们享受，每逢外出下乡勒令蒙民摆酒席招待，打官司要诉讼费，传案要马租子费（即传票钱，传案人骑马下乡，到打官司人家先吃酒肉，后要乘马费）。逢年过节向蒙民索要奶皮和黄油等食物。这些蒙民都舍不得自用，却都被这些官员借题敲诈而去。

公爷府内，私养的牛马有几千头，这些官员经常谎报瘟疫，

假说死亡，瓜分一部分归为己有。王公的安垦局收租原规定为每付犁杖一年十石租粮，他们却从中加倍征租肥己。那时，蒙民有每年派青年男女到北京公爷府服役的义务，去前由这些官员们挑选，有钱人家能花钱免役，他们从中肥己，穷苦之家，常被抓去服劳役，抛下家中父母无人抚养，因而饿死者颇多。

公爷府中，上层官员们的每日生活，一九二九年我在北府当教员时，常同这些老爷们会见，一起吃饭，对他们的每日生活很了解。比如会餐，是在一个宽长几丈的大火炕上，放着一张长条桌子，论官级大小依次坐下。吃上等食品名曰“整端”，即把一条牛杀后剥皮，专把牛肉割成一尺见方的几十块下锅烹调煮熟，用铜盘子由奴隶们双手端到桌子上，用刀随便割着吃。

他们三日一小餐，五日一大餐，都离不开牛肉、羊肉和猪肉。也经常吃些野味，如兔肉和野鸡肉等。吃后，就是喝茶，每人都有一个独碗茶杯，爱喝好似猪血一般的浓厚的白毫茶。每人都有一个玛瑙或珠宝的鼻烟壶。

这些长期驻府的办事官员，由于距家几十里地之远，所以出人都乘马，他们的乘马都是选择的好走马。就连我骑的枣红色走马，也能日跑百里不出汗，他们的乘马就更名贵了。

这样大吃二喝，每天的开支都有数百元之谱，名义上说是吃公爷的，曰“爷家恩典”，实际上完全是从乡村蒙民家里要来的。那时，公爷府分为东西两个班次，每班以一个月为限期，是相互轮换到府办公。每当换班时，就把这一班的食物互相瓜分，带回家去，下一班人来时，再另外往下摊派。仅一个北府就养着五六十闲人。这些人饱食终日，不断地到处敲诈勒索，拘押蒙民，经常罚款。他们迫害蒙民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因欠王租被拘押；有的因对他们招待不周以藐视公爷、图希木勒（长官）之

“罪”被抓入府内惨打，有的因荒年欠收交不上粮草即以抗命论罪；还有的因路遇官员没下马都算犯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九二七年，通辽县北腰伯什吐村老德家是土包子大财主，他住这个庄，南通汉族通辽县管界，北接蒙疆为蒙汉官兵和王公们往来必经之路，成天招待官兵老爷们。有一次公爷府总管老爷盘山达扎兰、杜喜等到达他家，因没有杀猪给大烟吸，致触这帮小子恼怒，以轻视蒙官厚待汉官为名，将德玉林关押黑房子三天，花了一千多元钱才被放回。他们对于没有油水可挤的穷人，一律罚苦力，对于土财主则罚款。

达贝子虽然常驻北京，但他的一切供应，都是由科左旗的蒙民来负担，因此就得经常从北京派人到本旗搜刮。我年幼时，经常听到北京公爷府派来王二老爷，晋三老爷来旗下索要进贡食物和差役人等。他们一到旗下，官员们对他们尊之如钦差大臣，每天设宴招待，向户下摊派款物供他们享受。从北京公爷府往旗下派人时都由北京公爷下“手谕”略称：“今派本府某人，到本旗北府，委以全权，办理什么事，望尔等（指拜生达等）务宜认真办理，不得阳奉阴违，若有玩忽从事者，蒙蔽主人，以藐视蒙制论罪。”公文的封面上，印有兰色大字“科尔沁旗驻京达贝子府封”。

这样，就吓得旗下的蒙古官员们魂不附体，都奉管事老爷如天使一般。奉命出差之人，头戴品级顶戴，故意装出大官的样子，以示威风。这些官员们，平素心中有鬼，忐忑不安，于是就给出差人造成了发财肥己，欺上压下的可乘之机。如在北京达贝子府任管家多年的李景阳，原籍是通辽五区皈理村人，人称为梅伦老爷，其职位超过北府的拜生达，有随时捕人问案，私立公堂，裁判案件和单独处理一切纠纷之权。一九二八年，他常到北府，路经

村庄，吃公馆索取车马费，敲诈蒙民牛马，他以此而暴富。当时人们，一提起李景阳，莫不畏惧。我在北府见过他几次，他终日手拿念珠、闭目诵经，装成假善人，但遇事大肆贪污，对人下毒手。其子狄申加卜，汉名叫李明初，给达贝子多公爷当护卫。父子在公爷府内横行一时。他的侄儿李明山更为凶恶，后来还霸占了达贝子儿媳马淑俊的使女绿叶（有夫之妇）。

这些管家们，张口便说是公子爷的“手谕”，闭口便讲是贝子奶奶的“旨意”，违背爷家之命，马上处死。因此，凡属蒙古大小官员，莫不对他们唯命是从，大量送礼，向其买帐，以便使他们在主子面前说些好话，以维持个人的地位。这样，每个在京的管家和出差者，都愿意奉王命回北府办事，好借势发一笔横财。

总之，达贝子及其官员们的收入全靠剥削而来。同时每年口外的蒙古上层官员，还给他进贡送礼，特别是到了旧历腊月，给他们送炒米、奶皮子、奶豆腐和奶油等物的人络绎不绝，每批都有千斤之多。

那时，北京公爷府有六十多人，北府有五六十人，地局子职员有四十多人，庙上有上百名喇嘛，这些人都不事生产，全靠蒙汉劳动人民养活，迫使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群众说：“达尔罕王的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享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

## 地局种种黑幕

东北的蒙古王公，都有几个土地征收的地局子。在通辽县有卓王的天慈地局，达尔罕王的共和地局，在双辽县有达王的福永地局，在法库县有达王的福安地局，在怀梨两县有达王的恩昌、

东公德、西公益地局子等等。所有这些地局子的局长和局员，都由本管王公所委派，都以其亲信奴才负责领导。达赉贝子在怀德县公主岭设有中公益地局，在梨树县还设一个中成小地局子。在这些地局子的门上写着地局子的名号，并悬挂吓唬人的虎头牌，上写“地局重地，严禁喧哗，倘敢故犯，送县究办。”在地局子的每个征收员的钱搭子上写着“天惠地局征收王租”，“中公益地局征收王租”的字样。每个地局子为首的称局长，下设有会办、帮办、总务主任和委员若干人，必要时设副局长。他们有单独外出丈地权，委员以下还有路头、稽查员、监丈员、雇员、绳头和绳兵等人。一九二七年春，我曾当过通辽共和地局的白凌云委员领导下的清丈地亩的雇员。见到其中黑幕重重，弊端百出，迫害人民之事，层出不穷。

一般地局子分为春秋两季开征：从旧历正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为春季开征期间；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为秋季开征期间。凡届开征之期，所有局内人等，一律提前到局，各按所司，执行征收“王租”任务。地局的狗腿爪牙，纷纷出动，借势到处横征暴敛，私自增加人民负担，农民稍一辩驳，即被抓拿送县衙究办。他们所到之处，逼迫农民杀猪宰鸡供应，同时还得给几块烟钱，否则立逼交款，刻不容缓，好象土匪“绑票”一样，逼得农民诉苦无门，当时群众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地局子把乡下”。正当农民呼天喊地之际，可是地局子的门口大影壁上竟写出：“开征大吉”、“永受王恩”字样，以示庆祝。同时，从开征之日起，所有局办一切人员，都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认为征收是一件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在我幼小时候，就听家父讲：“能熬上地局子差事，就发大财了！你看大罕村的张子杨，取理屯的德本，王爷陵的温四爷，都是住地局子，当王差，成为大饕

户啦。”不但农村人羡慕他们，就是城市的商号，也敢向他们赊东西。

每个地局子设有清丈委员，专为清理丈量地亩而设，他们的任务是“处理土地纠葛，清丈土地余多”。凡是蒙王放荒出卖的土地，在本主买去后，还要三年二次清丈，因为这里的营私舞弊，贪赃作恶非常严重。王公出卖本旗的土地，概不零售，都是论方子往外卖（东北土地很少论亩，都是论方子，一方子土地四十五垧合四百五十亩）。初次丈量时，拉绳牵线人故意将绳子放松一些，留下后手，准备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清丈时，以地多没收相威胁。本主自然捨不得把已开垦的熟地，被地局子没收回去，于是就得花钱贿赂委员，放宽丈地绳子，使既得土地不受损失。象这类舞弊害民之事，不胜枚举。一九二七年春，我随共和地局白凌云（我的姐夫）当雇员，登记丈地证照时，凡属多余土地，地户都得重新贿赂。在通辽县东五道弯等地进行清丈时，仅三个月，我就分得赃款三百六十多块钱。在地局子里，我的职位低，没有什么权，还得到这些额外诈骗之钱，可想而知，象清丈委员、绳头、绘图员、监丈员，他们在一天之内，得压榨农民多少钱了。那时，三年两次清丈，把农民每年从劳动中获得的一点粮食，全给“清丈”完了。

凡是荒务局、安垦局、土地局、清丈局都是迫害人民的机关，凡是住以上地局的人都能发财致富了，人称这些人可“吃尽，穿绝”。

## 喇嘛庙

达贝子北府附近，有一个伊克藤格庙，是达賚贝子的家庙。鼎盛时期，有一百多个喇嘛，领头人叫加福大喇嘛，还有喜乐得木奇，偏头得木奇等管事的大喇嘛，还有经头翁什大喇嘛等。

在庙上，最受虐待的是小喇嘛，他们都从八、九岁即被父母送入庙内，学习藏经，挨打受骂，小喇嘛，是喇嘛的奴隶，百般受害，一言难尽。

大喇嘛不事生产，却到处受人恭敬。他们每月的收入很多。在生活上，每个喇嘛都有个单独住的房间，屋内裱糊一新，在西山坡上，挂有若干佛像和供器。每天喝奶子茶，吃牛肉、羊肉；外出时，或乘马或坐轿车。他们都身披黄缎袈裟和红色法衣。他们所戴的帽子，也有区别，象大喇嘛多半头戴鸡冠帽，显得与众不同。小喇嘛多半穿红色衣服，呈现区别。

蒙制规定：凡属蒙民，每月必请喇嘛念《太平经》（即《太平经》），经主每月得献给喇嘛两三元钱，至于念大喇嘛经，那花费则更多了。

凡是喇嘛，按规定都有庙界地，每人不能少于五十亩，此地都让农民代耕，喇嘛坐吃享受，群众称他们是“喇嘛爷”。

由于封建迷信的宣传，使蒙民精神上深受束缚，再加上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医药设施更差，所以一遇天灾疾病，就得请喇嘛念什么“消灾免难经”、“太平经”、“打鬼净宅经”、“洗手脸除妖魔经”等等。这是对蒙民的麻醉剂，更加重了负担和痛苦。

## 兴办学堂的风波

一九二八年，东北军阀专政时期，一些人为了收买人心，沽名钓誉，提倡创办私立学校，培养为之所用的人材。象张学良、吴俊升（黑龙江督军）、杨宇霆（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都在办学。居住在沈阳的达尔罕亲王及其夫人朱小姐（自称开明夫人），也成立什么“达旗教育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一时，蒙汉官僚兴办学校的消息，充满了沈阳各报纸。

达贝子的儿子多尔吉和他的媳妇马淑俊为了保护私产，收买蒙古青年，也以维新为名办学校。一九二八年，多尔吉亲自坐镇北府，由温玉堂辅佐他兴办学堂，把公爷府的外院拆毁作为校址，把安垦局每年收入的一千多石粮食变为校产。多尔吉自任校长，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我与另一蒙古人为教员，德玉白为学监。规定凡年在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达贝子所属蒙民青年一律入学，所有服装、宿膳和书籍等费用，皆由多公爷负担。并对外扬言，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以私产培养学生，被辽宁省教育局批准，呈南京教育部备案。

为此，奉天报纸以学生名义发表了称颂多公爷的信，其中说：“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建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学生不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

多尔吉此举，其父达贝子是反对的。达贝子说：“办什么学堂，莽堂！我不愿意。热河喀拉沁旗贡王（曾充任北京蒙藏学院总裁），对学生那样好，曾派蒙古青年去日本留学。回来不少人成了他的反对者，这不是花钱买祸吗！还不如叫蒙古人越糊涂越好



呀！”以此为依据坚决反对蒙民上学。为兴办蒙旗学堂，学习汉书和汉文事，我在沈阳小河沿达尔罕王府见过达贝子。我见他时，行跪拜大礼，口称：“奴才温浚池（我的原名），给贝子爷请安！请爷恩典，给奴才指教。”

他歪躺在一个皮椅子上，手持吕宋烟，穿一身带色的绸子大褂，脚着缎子鞋，他的身后，还有两个青年奴仆为他轮流打扇。他把身子稍微一动，用目注视我一下，便说：“你是温浚池吗？”我答：“是的。”他还问我先祖的出身，有无爷家赏赐之顶戴，在蒙旗任过什么官职，然后又详细地问了我的学历。满口汉语，操北京音，问话后仍叫我站立，突然说：“我没有钱在旗上办蒙汉学校呀！为什么没经我核准，就把我的北府拆毁，动用我的安垦局粮食办学，破坏蒙制？温玉堂这个奴才好大的胆子。我已下手谕通缉，念你初次当差，不明蒙制，免究。等达王府办学时，我把你介绍给达王爷那边当教员，有你一定的前程。下去，听候达王召唤吧。”于是我就下跪谢恩退出。

我虽因办学受了申斥，闹了一场小风波，但此时，达贝子不在旗下，对北府有事用公文传达。多尔吉亲临北府坐镇，对达贝子的来文多死压不发，主张兴办学堂。实际上，多尔吉夫妇，也非真心捐资兴学，为蒙民培养人才，而是蕴藏着一种意图，因那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王公封建制度，土地要一律归公。为了保护私产，收买蒙古青年，才办起学来的。

当时对兴学问题，在其内部引起了风波。多尔吉与父亲有新法旧规之争，劝学员温玉堂有借兴学之名图捞一把之实，杜喜也想从兴学之中发一横财。他吓哄蒙民们说：“公爷立学堂，让蒙古人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拉去当兵。”因此，蒙民害怕，竟发生

了用牛换学生之事，杜喜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表面看巴户人赞成办学，蒙古人暗中反对，结果学校断炊，不到半年就宣告垮台了。

## 多尔吉的下场

达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是一个光吃喝不管事的寄生虫，家务大权操在其妻马淑俊之手。

多尔吉，从小生活在北京，一切习惯完全北京化了，是汇文中学的毕业生。马淑俊也是汉族中学生。此人伶俐貌美，被多尔吉看中了，可是达贝子嫌马氏家贫，门户不称。然而，多尔吉与马淑俊，早已陈仓暗度，木已成舟，因而就勉强结了婚。

马氏过门后，达贝子家境，就每况愈下了，收入减少，消耗过大。不久，就把铁狮子胡同的家宅，以十五万现洋卖给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多尔吉随父于一九二三年从铁狮子胡同迁移至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宅院，是每月用一千元租下的。不久，于一九二九年，又从汪家胡同迁移至北京后门外帽儿胡同六号。原是冯国璋大总统之住宅。此时，多尔吉父亲就死去了。

在其父在世时，因抢夺地局子，正当他们争权夺利之际，天老爷又降灾了，天旱歉收，村村户户一片哀鸣，又加上差徭繁重，苛捐累累，致使民不聊生，亡命之徒，乘机做乱，盗匪蜂起。蒙民牧养的牛马，多被“马贼”抢走，生活无路。

可是这些蒙古王公们，深居北平、沈阳府第，终日花天酒地，尽情欢乐，对本旗蒙民遭受的苦难，置若冰霜。那时，达贝子的“手谕”迭下北府，但无人为其推行，都说公爷连吃都不管，

给他看守公府干啥？

正当这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腐朽不堪时，“九·一八”的炮声响了。穷苦的蒙民挺身而出，有的“拉大帮”（土匪），将达旗所有王爷府，公爷府，什么尼玛公，倭拉公等府第，一律拆毁，粮食牛马，尽情抢走，大快人心。达贝子就在此时在北平寿终正寝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达贝子在怀德的中公益地局子被没收了。后来因其宗族另一个温都尔王（杨王爷）出头投降日本，当上了东科中旗伪旗长，代替了达尔罕王职位。多尔吉向这位温都尔亲王求情，才又从地局子收入中得到几万元。多尔吉此时居住在北平后门外帽儿胡同六号（原为冯国璋之宅）。仍然使奴唤婢，摆着贝子的架势。我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因避“日祸”也从通辽县逃入北平多尔吉贝子府闲住，因为有过主奴关系，被他收留。那时，他的府中仍有管事处，管事人叫张庆隆（北平人），另一个叫傲定（蒙古人），随侍人员有晋杰臣、蔡珍、骆骏（均北平人），那木儿、丹森、倭什混（均蒙古人），男仆关文信，女仆关妈、张姐、丫环绿叶、秋菊、汽车司机一人，拉包车的于三、厨师陈二、周三、鸽子把式王二（均北平人），还有两个警察，一个叫马林，一个叫荣华，每天看守大门。

冯国璋这套住宅，是北平著名的官僚公馆，冯是满清末年汉军副都统，民国初年在北平任大总统，就在帽儿胡同修建一片五层到底的住宅。多贝子居住的是正宅。门口有石头铺的马路，大门两旁有两棵大槐树，迎门还有一个水电灯，东西有跨院，有汽车房、鸽子房、书房、客厅、过厅、大厅、中西厨房，后楼花园还有家堂，整个院落极其华美。多尔吉每月花一千元房租租住此宅。

多尔吉每日早起放鸽子，看其飞翔天空为乐，然后喝牛奶、吃早点。早饭在大厅开，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开饭时间不准厨师入内，都由当差的用铜盘往上端。

各个居室内部，都有各式各样的桌椅、铜床、珠宝、玉器，琳琅夺目，别有天地。

这位阔大爷好听离奇故事，什么《鬼狐传》、《今古奇观》、《聊斋》、《西游记》、《济公传》等等，偏偏碰着我这套评词，每当他酒足吃饱之余，将身歪在汽椅子上，呼我为他讲故事，以开心取乐。有时他的岳母与太太和他的妻子也在旁边听讲，什么鬼狐妖魔，我无中生有的捏造了一些离奇的情节，指手划脚地表情讲演，使这些寄生虫们听得欢天喜地，鼓掌称快。有时，在我说得他们高兴时，便让我坐下，好象开天恩一样，我不敢整体而坐，只能将半个屁股依在椅边上微坐一点，使我更加难受。

多公爷的两个少爷包儒和包义，都念过汉书，各占一处书房，有专职教师，对教师的待遇是，月支一百元，每餐四盘菜。

多尔吉对管事人都叫乳名，比如对五十多岁的张某呼龙儿，对年过半百的敖某呼定儿。对蒙奴一律呼小名、不当人看待。对青年女佣，面貌稍美的，就进行奸污、摧残。比如对年轻貌美的绿叶，就被他强奸了。

“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的族兄温玉堂很早就看出了多尔吉不中用啦。他也不辞而别了，并出卖了他的安垦局的很多粮食。至于北府残余的牛马也都被蒙古的官员们瓜分了。什么拜生达、伯们、哈明、扎兰和情役达等，还有陵寝的扎兰，衙门达和山达等，土地征收局长、垮兰达和账达，这三套招财进宝组织的成员，都避而不见了。

到了一九四〇年，多尔吉的生活更每况愈下了，过去奢华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居宅两迁，反映了这个现实，先从帽儿胡同迁到秦老胡同十八号，然后又迁到后门织染局九号，此宅仅是一座四合院落了。这时，我和多尔吉还有来往。我见他的生活费用，多靠典当维持，曾把其父殉葬之珠宝，从坟中起出，卖掉后得一笔钱，还要装爷摆阔。使用的佣人虽仅剩三、四人啦，但还要装成公爷的样子。在他万般无奈之时，忽然异想天开，他要面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妄图从中得到好处。他只身到东北，在长春傀儡皇帝小皇宫中，见了溥仪，溥仪念其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驸马，是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圣旨”颁下，多尔吉谢了恩，穿上朝服，正要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发觉，竟把“圣旨”批驳了，说他建国无功，无资格享受此职，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他碰了一个大钉子，羞愤而归。多尔吉回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做东洋木偶儿，中外人民活笑死，亡国封君狗不如。”从此他不参加日伪组织，可是这个历世百年剥削蒙民，压迫蒙民的权势，则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也就走向了末日。

# 归化城金融史话

贾 汉 新

## （一）归化城商业的由来

归化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旧城。很久以前它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为了从中原取得生活资料，曾与历代的王朝，不断地发生冲突，延及明朝嘉靖八年（公元一五二九年）土默特旗首领俺答，与明朝当局有所纠缠，其主要愿望，就是希望嘉靖皇帝答应在长城沿线各口开设马市。

所谓马市，就是蒙古人民以驼、羊、牛、马换取内地商人的日用百货，解决牧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一种交易形式。当时俺答为“鞑靼国”左翼各部的统帅，他有地位、有权力、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位嘉靖皇帝，是个刚愎自用之人，无论如何也不答应马市的开设，这实为俺答扰边的缘由。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一五五〇年），俺答率部东进，围困北京，嘉靖皇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允许了马市的开设，但是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又借口封闭，俺答于是继续扰边，直到隆庆四年（公元一五七〇年）才因俺答受封，结束了这种麻烦的局面，按年按季，开设马市，成为双方的交易市场。由嘉靖八年至隆庆四年（公元一五二九年至一五七〇年）中国经过了四十二

年的纠缠，才解决了这个互市问题。

爱新觉罗氏，当时也是一个游牧部族的首领，由长白山一带崛起后，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入关之前，蒙古各部落，已公开承认清朝的宗主权。在那个时候，他一方面取得了宗主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承担了保护藩属国的义务。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清朝代替明廷统治了长城内外后，由于满族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与蒙古民族大致相同，所以在他掌握了中国政权后，了解游牧民族对内地商品的迫切需要，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原地带的生活资料可以畅运北来。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逐渐拉开了归化城的商业序幕。

## （二）归化城商业发展概况 与银炉铺的产生

顺治初年，内地一些小商贩与朔平麻一带的坐地商，取道杀虎口等处，用各种货物，到归化城换取蒙民的皮毛、牲畜，这种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自康熙三十五年，清军西征噶尔丹后，逐渐开拓了外蒙古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等处的商路，从此奠定了旅蒙业的发展基础。

归化城是清朝设置的对蒙古贸易的三个中心之一，它是全国各地同蒙古、新疆进行产品交易的一个重要地方。康熙于公元一七〇一年巡幸塞外到达归化城时，曾敕令汉满官员，招商北来，繁荣市面。那时原在杀虎口、右卫一带做蒙汉贸易的山西祁县、太谷一带的商人，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此归化城就有了坐地商。雍正年间各行商业，已见发展。乾隆时，因为绥远城的兴建与土地的放垦，坐地商就更见活跃。根据《绥远通志稿》记载，

归化城的商业，发达于雍正、乾隆之间。所以在乾隆中叶，清帝为了增加税收，曾以筹款实边为名，设置归化关，制定税例，征收印子钱、毛包钱、驮子钱，可见归化城的商业，在那个时期就呈现了繁荣景象。

根据老年商人谈清初归化城的坐地商，以做蒙古生意的货行发展最早。那时曾有三家大商号，范家号、宏图号、天元号，人称三大号。嗣后又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东万和、西万和与王盛斋、商盛斋、聚盛斋、兴盛斋四大斋的开设。那时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三家商号，都是称雄塞外的旅蒙商，一般人也称三大号，并将原来的三大号，改称“老”三大号，以示区别。

归化城在坐地商户产生后，已开始使用货币。康熙末年，曾有三成箩儿铺的开设，这是一家最古老的手工业者。雍正中叶，因社会发展与各行商业资金周转的需要，即出现了万福兴银炉与福茂泉钱铺。乾隆时期，又有永合堂药店、魁记货庄与大城粮店的开张。嘉庆初年，又开设了允和成鞋帽庄与三和兴陆陈行。同时又有祁太帮开设的三晋源账庄，专营借贷业务。根据以上所述，归化城银钱商的应运而生，是与各行商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 （三）银钱业盛衰时期的分述

归化城的银钱商，萌芽于雍正时期。那时当地的座商曾联合组成了崇厚堂，公推四个老年人为“乡耆”，负责与当地官府进行联络，其性质，如同一个小型商会。

乾隆中叶，由于商业繁盛，行业增多，银钱商为了办事方



便，就组织了宝丰社，设总领一人，由各家钱铺轮流担任，办理钱市交易，联络官府与行业中的一切事务，全年开支约计白银二千两，年终时，向各家钱铺分摊负担。

嘉庆与道光初年，是山西票号的开创时期，也是归化城商业的繁盛时期。这时所有平遥、太谷、祁县一带的封建资本集团，为了吸收塞外的财富，纷纷投资，在归化城等处，设立钱铺、票号、账庄，操纵口外金融。从那个时候起，至光绪末年止，归化城的银钱业，就先后开设有：

(1) 祁太帮开设的钱铺。计有东义源、协和成、法中庸、谦益恒、谦益永、德泰和、义成德、隆盛厚、瑞盛庆、谦恒永、永和号、复泉茂、万昌涌、隆昌旺、大德生、达泉牲、蔚隆泰、天亨玉、除天亨玉在光绪中叶改名为天亨永外，蔚隆泰亦在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由山西崞县史载名等接办改组，聘请邢克让为经理继续经营业务。

(2) 忻州帮开设的钱铺。计有泰和昌，聚义恒、德顺和、天生德、丰盛隆、晋义通、双盛成、德和长、乾元通。

(3) 代州帮开设的钱铺。计有大成兴、恒升昌、恒吉昌、德生昌、恒生昌、恒玉昌、谦益永。辛亥革命前后，恒升昌曾改名为日升元钱庄。

(4) 大同帮开设的钱铺。计有双兴厚、元亨泰、义泰祥。

(5) 榆次常家开设的钱铺。计有大厚玉、大丰玉，那时一般人都称它们为“十大玉”。大盛魁开设的钱铺叫裕盛厚。盂县帮开设的钱铺叫谦益恒。丰镇厅隆盛庄常冲铁炉投资开设的钱铺叫昌盛兴。本地商人开设的钱铺叫元恒泰。

帐庄计有祁太帮开设的中兴永；大盛魁开设的天顺昌；法中庸开设的法如春。

银号，亦名银炉。当时开设的计有万福兴、永舟号、兴盛号、瑞兴茂等。

票号，亦名汇兑庄。当时有祁太帮开设的崇义公、大德通、大德恒、瑞生润、合盛元等。榆次常家开设的大德玉、大生玉等。大盛魁投资祁县开设的票号分庄叫大盛川。北京帮开设的票号叫蔚丰厚。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奏准清廷，成立了户部银行，不久又改名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曾在归化城设立支行，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因革命军兴，该支行即行裁撤。这就是归化城出现银行组织的开始。

以上这些钱铺、票号、帐庄、银号，大多数是开设于嘉庆、道光与同治时期，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逐渐侵入内地。当时集中于归化城等处的皮毛、药材，大量出口，一般银钱商受到外贸关系的刺激，在帐面上往来的金额数字日见增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因军费庞大，国库支出，除向民间尽量搜刮，加重各种税收外，因铜质缺乏，曾铸用铁钱与小铜钱。小铜钱有两种，一种叫二皮钱，一种叫沙板钱，它们是与成吊钱混合使用。那个时期，因银根奇紧，归化城的银钱商周转困难，营业上呈现了窒息状态。

同治时期，当地官府如绥远城将军衙门、道台衙门与二府衙门等，每年阴历正月，在各钱铺开市前，由“生息银”的款项下，拨出一部份，交给保丰社总领，贷给各家钱铺，从事经营。当时规定的月息仅为一、二厘，年终才本利清还。这种官款的借贷，对资本薄弱的钱铺，有很大的帮助。

光绪中叶，归化城的面粮店，因农业丰收，曾有预定米面交易，它们所收到的预定款，大部份利息存于各家钱铺。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存款户，以面铺粮店为主顾。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据不完全统计，归化城的钱铺，除停业者外，计有法中庸、双兴厚等三十家。宣统年代，约计有三十二家，这是归化城银钱商的旺盛时期。

清代末叶，票号营业，最为发达。那时，银行尚未兴办，而海禁大开，对外贸易与金融的周转，更见频繁，所有一般的汇兑业务，完全由票号承办。因此票号生意兴隆，都能获得厚利，称雄一时。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旅蒙商受到很大影响，使换取的皮毛牲畜，不能南运；同时祁县、太谷、平遥等地的封建资本集团，由于政体改变，局势动荡，对在各地开设的钱铺、票号，也纷纷收庄，到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归化城的银钱商仅留存义丰祥、法庸中等十三家。这是归化城银钱商的衰落时期。由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至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先后又有祁太帮的晋升恒、晋义祥与大同银号等，忻州帮的义丰祥、晋丰祥、云集祥与义聚昌等，大同帮的丰盛隆与和成钱庄，大盛魁的通盛远（那克让兼任经理）等钱庄开市，这个时期，钱庄户数，又增加至十家，营业情况亦较前发达。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至民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因为军阀混战，银钱商受到很大损失。如山西军阀在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秋，由绥远撤退时，曾勒索了泰和昌、天亨永、双兴厚等各家钱庄的现洋四十余万元。民国十七年夏，奉系军阀，借购买军火之名，提走了平市官钱局的基金一百一十四万余元。从此，归化城的银根，就日见紧张，各种纸币充斥市面。民

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归化城的旅蒙商业大见萎缩，兵灾旱灾也相当严重，因而一般银钱商的营业也随之衰退。及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后季，经济有所回升，银钱业也逐渐转向繁荣。据不完全统计，钱庄有大德通一家，外埠的银钱行商，有仁发公银号、绥西垦业银号、和记钱庄、永利银号、晋兴钱庄、通记银号、溥晋银号与恒记银号等十余家。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寇侵占归绥，银钱业备受摧残。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傅部东进，中央银行与绥远省银行，亦由陕坝镇迁移归绥。那时，绥远省银行除将蒙疆银行厚和市分行与同和实业银行全部清点接收外，并扩大组织恢复了原有的业务。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中国农民银行与中央合作金库，先后派员来绥，设立分支机构。同时还有许多发了困难财的上层人物，他们吮吸了大量的民脂兵血，个个腰缠万贯，除了吸大烟、打麻将、嫖妓、纳妾、置房、买地极尽骄奢淫逸外，勾结以往的钱商，利用歇业钱庄的招牌，投资复业，还依仗政治势力进行超经济盘剥。当时重新开张的钱庄，计有天亨永、裕盛厚、日升元、义丰祥、义震昌等五家。它们的业务，除了放款存款与汇兑外，还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勾当。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前后，龚国华等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在小街成立了“第一信用合作社”，作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资本的策源地。所有社员，都被利用蒙蔽，经济上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同时邢维极与车云生等，也曾在石头巷筹备“第二信用合作社”。但在法币、关金与金元券等不时贬值的情况下，它们都销声匿迹，纷纷停业，从此归绥市私人开设的钱庄、银号，就绝迹了。

票号业务，在清代末叶是相当发达的。那时归化城的票号，

计有大德通、大盛川等九家。因为它们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能根据大势所趋，更张易弦，所以在民国初年银行逐渐兴起后，票号业务，就走向衰落。钱庄营业，多少年来，虽然也有萎缩繁盛的更替，但在抗战前夕因为钱市取缔与金融稳定等关系，曾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根据当时的统计，兹将双兴厚等十六家钱庄的营业情况，列表如下。

公 积 约 数	备 注
36,000元	
10,000元	
30,000元	
15,000元	由天恒玉改组
3,000元	
4,000元	
2,000元	
30,000元	
10,000元	
30,000元	由恒升昌改组
30,000元	
30,000元	
5,000元	
20,000元	
50,000元	原系大盛魁的小号后由平市官钱局接办
30,000元	

县	钱庄名称	资金性质	资金数额	成立年代
大同	双兴厚	独	14,000元	道光29年
忻州	泰和昌	独	15,000元	同治12年
祁县	法中庸	独	48,000元	同治10年
祁县	天亨永	独	15,000元	同治13年
祁太	晋义祥	独	15,000元	民国3年
忻州	义丰祥	独	15,000元	民国3年
大同	义泰隆	独	15,000元	光绪20年
忻州	聚义恒	独	10,000元	民国11年
忻州	云集祥	集股	40,000元	民国7年
代州	日升元	集股	30,000元	民国3年
祁太	晋升恒	集股	20,000元	民国19年
大同	丰盛隆	集股	40,000元	民国12年
忻州	乾元通	独	40,000元	民国8年
祁太	大同银号	独	15,000元	民国16年
	裕盛厚	独	100,000元	民国17年
大同	和成钱庄	集股	24,000元	民国16年

#### （四）银行兴起与业务情况简介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大清银行已改为中国银行，为了活跃市场扩展业务，曾在当时的归绥设立绥远分行。后因营业不佳，缩小范围，遂改组为寄庄，仍由天津分行管理，专营汇兑业务。每年的汇出数约计七八十万元，汇入数约计五十万元左右，库存现款，经常为一万余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它就将业务清理，宣告结束。

绥远平市官钱局，是一个地方性质的银行，也是一个官督官办的金融机构。它成立于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当时绥远官府，曾以救济灾荒的名义，领到了帐款五万元。款一到手，立即改变了用途。他们认为区区五万元帐款，发到灾民手里，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挪用这笔帐款作为资本，开设了绥远平市官钱局。成立初期，曾发行小额铜元卷，不久发行数额增加了，角票也出现了；再过一个时期，发行额更大了，一元、五元、十元的银元兑换卷，也大量发行出来，各项业务也扩展了，从而也就成为唯一最有权威的地方银行了。那时它曾在绥远境内的包头、五原、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等县，设立分支机构；天津、太原、大同各地也设立了分局或办事处。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绥远特别区改建为行省，并将察哈尔特别区所属的丰镇、凉城、兴和、陶和林与集宁等五县，亦划入省境。那时，它为了扩展业务，增加收入，又在集宁、丰镇、兴和等处，设立了分行与代理店。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因营业发达，曾由纯益项下续增资本五万元。营业范围计分汇兑、贴现、存款、放款与仓库等，并代理省金库，经理公债还本付息等一切业

务。根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六月份统计，资产项下，是四百〇五万八千元，负债项下是三百九十八万三千元。实业投资计有绥远电灯公司股本二十一万六千五百元，平记裕盛厚钱庄资金十万元，山西晋华纺织厂股本三千元。钞票流通全省与山西大同等处。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因银根紧张，周转困难，如无电灯公司、面粉厂的支援，很难应付当时严重的挤兑风潮，渡过年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依据它的帐簿统计，流行在市面上的旧钞，仍有四十余万元，尚未收回，折合当时的现洋，大约为十余万元。库存现币，平均约有百余万元。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〇年）绥远省政府为扩展业务，又增加了一部分资本，将绥远省平市官钱局改名为绥远省银行，各地的分支机构，也都改名为绥远省银行的分支行和办事处。在它成立初期，曾设有总办一人，督办全行事务。并设经理副经理各一人，主持全行业务；行内分设营业、会计、出纳、发行、文书等五股，每股设主任一人，股员与练习生等若干人，办理各股的事务。傅作义主绥时期曾聘请地方绅士与财政机关的首长和权威商人等，组织董事会，为该行的最高行政组织。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将它留下的基础，归并于蒙疆银行。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绥远省银行迁返归绥，扩展了原来的业务，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绥远解放，它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绥远省分行接收过来。从此，绥远平市官钱局及其改组为绥远省银行的全部历史宣告结束。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交通银行为了开展塞外业务，也曾设立绥远分行于归绥，后因营业清淡，改为支行，不久又改组为办事处。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前后，业务稍



有起色，又改名为支行，直辖于天津分行，专办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根据统计，每年的汇兑总数约有六十万元，存款数达十余万元，放款数约有三十万元，库存现款大约有一万数千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寇侵占归绥后，它的全部财产即被没收。

山西省银行，曾于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在归绥设立绥远分行，归太原总行管理。它的营业方针以活动市面，调剂汇利为主，而对绥远的政治金融，更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的统计，近三年中，每年平均存款约达六十余万元，以公款居多，放款约有一百五十余万元，其中公家与商号各占半数。汇划每年平均达四百万元左右，它所发行的钞票，也曾有几次挤兑风潮。及至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分行即告结束，迁返太原。

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晋北镇守使张汉捷与高在田司令等，为了吮吸塞外劳动人民的血汗，曾将他们搜刮到的金钱，拨出一部份作为资本，在邢克让的主持下，成立了乾丰银行，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这是私人银行设立的开端。及至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冬，因时局变动宣告歇业。

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京帮商人王赞廷、沈虎臣等，勾结了一些权门名贵，投资二十六万元，开设丰业银行，它的组织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也曾请准官府，发行纸币。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三月，因发生挤兑风潮，一度停业；同年九月，经过整理与充实基金之后，继续开业。根据该行的不完全统计，每年的存款数约计三十余万元，汇兑总数平均为二百万元，放款数约计二十万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侵占归绥后，它的全部财产归并

于蒙疆银行，从业人员亦多星散。

西北银行，是国民军的金库，开办于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左右。总行设在张家口，北京、天津、归绥、包头都有分支机构。当时它也曾发行银元兑换券，流通于察哈尔、绥远两个特别区。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秋，国民军向宁夏、甘肃撤退，西北银行即行宣告结束。

北洋保商银行，于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在归绥大南街头道巷设立办事处，归总行管理。营业萧条，于市面金融影响无几，它每年的汇款总额约达六七十万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交通受阻，它就撤庄清理，从此歇业。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中央银行，由陕坝移来，因为它是当时的国库，对外不作交易与一般商号关系极浅。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中国农民银行与中央合作金库，虽然也经营金融业务，但是开张的时间较短，于市面经济并无多大影响。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绥远解放，除中央合作金库自动歇业撤庄外，中央银行与中国农民银行均由中国人民银行绥远省分行清理接收。

## （五）钱铺的剥削手段与帐庄、

### 票号、银号的业务区划

据年老人谈，归绥城这个市场，在清代，因为它远处塞外，现银缺少，一般商号，假如没有钱铺的支持与过拨转帐，它们的现有资本就很难周转。可见当时归化城的银钱商，对于市面的金融活动，的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雍正时期，归化城就有了钱铺的开设，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又有帐庄、银号、票号等出现，辛亥革命前后，银行才兴办起来。它们虽然都属于金融界，但各所经营的业务，都有明显的区划。现将一般钱商的剥削手段与它们当时的主要业务分述于下：

(1) 钱铺，后改名为钱庄。它的主要业务是存款，放款，对当地的商号往来过帐。凡是能够做到通街过帐的钱铺，才准加入宝丰社。那时地面上通行的货币法码，因为现银奇缺，曾有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规定。这种谱拨银与拨兑钱的比价，是由各家钱铺，每天早晨前往保丰社掌握下的钱市上做数子。这种钱市活动，也是它的一项经常业务。辛亥革命前后，银元、铜元与钞票开始通行于市面。那时它们对于银元、铜元、钞票、谱拨银发兑钱与方孔制钱的互相比价，也是每天上市做数，开盘交易。清代末叶，它们掌握了市场上的金融情况，了解谱拨银与拨兑钱以及吊钱、现银等的需求缓急，就在钱市上以空卖空，获取暴利。民国初年，因有银元、铜元的通行，它们就不断地兴风作浪，大搞赌博性生意。这种赌博性的生意，绥包一带的人们，称做“虎盘”，又叫“耍空头”。直到废两改元，钱市取消，这种活动才告绝迹。

一般钱商，都具有巧妙的剥削手段。例如每年阴历正月初八、初十两日，在所谓小开市与大开市以及标期、骡期的时候，各家钱铺的从业人员就纷纷出动，前往各商号做银钱交易，即使不需要贷款的商号，他们也三番五次地纠缠，让人家或多或少过一笔空头帐，按市例规定提取佣金。这种凭空取水的佣金，当时叫做“利市钱”。各商号所取的银子，又有所谓客银和现银的区别。客银原是谱拨银的化名，客银存放在三个月以上时，即可作

为现银。平时如客银折合现银，每百两可得九十八两，其余二两，作为他们的手续费，过算的时候，因为周转频繁，银根较紧，客银与现银就没有什么区别，可以通行拨用。唯现银在标期三天以内，可得利息五钱，客银在标期十天以内，可得利息四钱五分，十天以外，就停止付息。他们在对同业的交易当中，客银的满加为四厘五毫，现银即为六厘。但是对其它行业，客银的满加为一厘五毫，现银即为二厘五毫。同样的客银与现银，在利息的支付上，就有如此的悬殊，可见当时归化城的钱商，对一般行业的剥削，是如此的严重。

清代，归化城的钱铺，对其它行业都叫做外股子。凡与外股子做银钱交易的时候，他们就极尽剥削之能事。一般钱商，对存放款是按期限长短收付利息的。但放款的日期愈长，付出的利息愈少。利息的支出与收入，有日息、月息与满加等的区别（存款在一个月以上者，都叫做“满加”）。那时存款的日息，大约为三厘、月息为八厘，“满加”为四厘。贷款的日息为四厘，月息为一分一厘，“满加”为五厘。但是对外股子的存款，须在他应得利息内抽取佣金。当通行白银与元宝时期，白银兑换元宝每锭须加手续费二钱五分。每年年终，各行商号所存的元宝与白银，又有所谓“加色费”的规定；客银每锭五十两收“加色费”二钱五分；现银每锭五十两收“加色费”三钱五分。这种“加色费”，其性质类似保管与折旧费。同时归化城的市面，曾有方孔制钱的通行。而各钱商的出放，即以城钱为标准。如城钱规定为，以二十八枚为一百文，在他向外股子贷出时，多按二十五、六枚交付，收回来的时候，多收一、二枚。这种一出一入剥削到的钱，叫做“底儿钱”。

民国初年，一般钱商仍在每天早晨拥集钱市，作以空卖空的

银钱交易。所做的数子，如与权威钱庄的利益发生抵触，它们就贿通官府，张贴布告，勒令撤销，在那个时候金钱确实神通广大。

在银行兴起之后，一般钱庄才兼办汇兑业务，一切手续，取法于银行。当年归化城的经济命脉，完全由钱庄操纵，各行各业，每天的交易，都以谱拨银为标准，晚间归结于钱铺，其它通行的白银、铜钱，都得换成谱拨银，方能通使。可见当时归化城的钱商具有何等的权威。

(2) 帐庄，又叫借贷庄。它是一种专门经营借贷业务的银钱商。它不通衍过帐，也不参加宝丰社，只与一般贷户有所来往。货款要收利，普通借款的利息，大约为四、五厘；存款利息，大约为三、二厘，一存一放便大获其利。光绪中叶，也曾有不少的帐庄，大搞赌博性质的“虎盘”生意。辛亥革命后，在银行兴起的时期，借贷业务即被银行代替，从此借贷庄就销声敛迹了。

(3) 银号，也叫银炉。清朝时期，归化城的市面上，也曾流通白银。这些银子，经过多次的周转，大银锭被破为小银锭，小银锭被破为碎银子，含银质量，也不一致。这在银两的通用上，多有不便；同时也时常发现假银子。因而就有一些钱商，请准官府设立银号。它们把碎小的银子，化开重新铸成含银量一律的元宝和大小银锭子，上面铸以“足色纹银”和银号名称等字样，以资识别。元宝的“平色”也是银号、钱铺、票号的一种业务，可以得不少的利润“平”是论分量，各号都有自己的“平”每平约有千分之五、六的收益。“色”是论质量，即所谓成色。从成色中，约有千分之五、六的盈余。辛亥革命后，元宝多由银元代替，原有的银号业务，即被时代淘汰。

(4) 票号，也叫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银钱

商。归化城的票号，多系行商。它既不通街过帐，也不参加宝丰社的组织，只是和有关系的商号，在营业上有所往来。它所经营的业务，以汇兑为主，兼办存款、放款与平色。道光十四年（公元一八三四年）平遥帮票号蔚丰厚成立后，曾在归化城设置庄口。光绪末年，大盛川票号，因得到了大盛魁的支援，生意兴隆，称雄一时。后因汇兑业务由银行与钱庄代替，归化城的票号从此就逐渐消逝了。

## （六）错综复杂的货币制度 与利率、汇划

归化城在座地商户活跃后，即开始加用货币。那时的货币的流通，仅有方孔制钱与白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现币缺乏不敷市面周转，而祁太帮的封建资本集团，为了提高他们的信用，巩固他们的金融阵地，便产生了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货币制度。

谱拨银是一种以两为单位的虚根本位性质的货币制度。它不是全国一致的制度，而是地方性的制度。据老年商人谈，清代中叶，归化城的市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虽小，而集散的物资数量大；一是商号的家数虽少，而交易额却比较大的城市高得多。谱拨银与拨兑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归化城既然是个物资多，现银少的地方，如果没有虚银本位的货币，各商号的资金，的确是周转不开的。自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货币制度建立后，它的通行是由宝丰社掌握的。所以它的价格是稳定的，而且也是高于各色银分的。那时归化城的银分是极其复杂，名目也很多。如驴耳朵银、马前梁银、馍馍银、国公宝银与晋太官银号所

铸的俸禄锭子等。这些银两的成份也不一致。除国公宝银俸禄锭子外，其它的一些杂银，也都有铝、锡的参混，所以一般人都称它们为各色银子。

各行各业所通行的银分，在那个时期，也有很大的区别。如烟茶庄使用的银分叫做茶银，也叫九二银。它的每两单位比价，等于谱拨银一两的〇·九六；货行使用的银分，叫货银，也叫九四银，它的每两单位价格，等于谱拨银一两的〇·九二九六六；纸庄海味店使用的银分，叫府庄银，也叫做九三银，它的每两单位价格，等于谱拨银的一两的〇·九一九七七，这一种比价是固定的。但是一般商品如互相过帐，或者是和各地商号拨款、汇兑，都是用谱拨银的价格来计算。唯一般居民购买日用物资，则以拨兑钱为主，方孔制钱为辅。拨兑钱又名城钱，也叫街市钱。它的数额也不是一致的，最初是以十八枚方孔制钱为一百，市面上叫做一八钱，以后又有二二、二四、二八、三二、三七等的变动。所以它和谱拨银的比价，不是固定的，而是每日早晨由各钱商在钱市上做“数子”的。所谓“数子”就是拨兑钱与谱拨银的比价。这种比价，每天虽然也小有出入，但都变动不大。

拨兑钱是用出贴子的形式来表现的。它只有代表使用的纸贴子上所写的数字，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如果要兑现的话，则一吊拨兑钱用当时流行的街市钱如二八、三七等数的方孔制钱来代替。谱拨银却不是这样，它有宝丰社铸造的银锭子为代表它的现品，假如要兑现的话，则一两谱拨银可以兑换一两铸有足色纹银字样的银锭子，事实上兑换银锭子的却很少。因此当时一般人都说归化城是真银子假钱的市面。

在白银与方孔制钱流通的时代，官府衙署，曾有库银、国公宝银的区别。当时一般人都称为“七银八色”，如缴纳库银，即

以白银一两二钱五分为一两，这是当时官府的公开压榨，老百姓只得忍气吞声，任其宰割。方孔制钱，除了有拨兑钱与够足数的吊钱而外，尚有“混满钱”的通行。如咸丰时期的“混满钱”，每一枚，即有半数以上的铁钱与小铜钱混合使用。因为钱底较差，所以在那个时候归化城的物价，就较内地为高。光绪初年，铁钱虽然作废，但是每百枚中尚有一、二十枚或五、六枚的小铜钱，再加以钱商扣除了底儿钱，实际上的方孔制钱，落在使用者的手里，仅有九十七八文，可见当时的货币，是何等的复杂。

归化城的市面上，在谱拨银与拨兑钱的货币制度流通后，多少年来，一直通行无阻，有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价值，且高于当时的现银与现钱。咸丰中叶，因为现钱缺乏，一般粮店又发行了贴子。贴子上所写的数字价值，也如同当时的拨兑钱。

光绪末年，归化城才有了现洋的通行，当时它和成吊钱的折合率，是以成吊钱八百文，兑换现洋一元，拨兑钱的折合率，是以三千八百四十文兑换现洋一元，这种比价基本稳定。

民国初年，铜元上市，制钱逐渐作废。它和现洋的比价是由三百八、九十枚至四百枚以内而通行。同时现洋增多，白银绝迹，市面上的交易，就出现了谱拨银与现洋相提并用的局面。但是一般钱商，因积习难改，仍以谱拨银为主。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以后，因为现洋外流，呈现了涩滞状态，当时经过了各行各业的研究，决定仿照谱拨银的办法，通行谱洋，从此谱洋与谱拨银都占了货币上的重要地位。

在现洋通行初期，每元当以白银七钱二分计算。但在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现洋上市做数以后，它的比值，就逐渐增加，有时每元可抵白银九钱二分。这也是在银根奇紧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特殊现象。在那个时期，北洋政府财政部，为了增加辅



银币的通行，曾有以铜钱八十文与一百六十文折合的小银币，携带方便，各地通行。

当白银、谱拨银、方孔制钱、拨兑钱、现洋、谱洋、钞票、铜元通行于归化城市面的时期，仍以谱拨银为标准，其它各种货币的价格，以及汇兑、利率与银分等，仍然是由各家钱商每天早晨拥集钱市，按市面上的需求而定。同时各家钱商与其它行业经常也以空卖空，大搞“虎盘”，抑勒高抬，从中渔利，竟致各种货物的价值，涨落无定，甚至一天就有几次波动。

民国十六、十七两年（公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绥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兵灾。地方官府，藉名施帐，曾有所谓兵灾旱灾救济会的组织。他们见到农民累银，因谱洋与兑钱的折合，吃亏很大，所以就请准上级照令废除拨兑钱的货币制度，同时为整理金融，禁止滥发纸币，并将粮店所出的贴子，一律取缔。这使当时一般粮店的资金周转受到很大的影响。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二月，废两改元，钱市取消，“虎盘”生意无形停止，标期、骡期，亦告废弃。在那个时候，市面上银角币已行绝迹，仅有铜元、银元、钞票三种流通。银元计有墨西哥、大清、表头、湖北造、中山等五种，归绥市上通行的数量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最高时约达三百万元，最低时为百万元，平均约计一百五十万元至二百万元。铜元极少，仅供买卖找零。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新币政策，推行全国。现洋、现银，都禁止流通，只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出的钞票为主，不久，中央银行又发行了一分、五分两种硬币，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当时仍以

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关金券和以后又实行的金元券为主币。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地方当局为了维持金融，曾由绥远省银行发行了新的银元兑换券，过渡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因为市场紊乱，黄金、现洋也都走上了黑市，直至解放，才将市面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彻底消除。

汇兑一项，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左右，银行比钱庄的业务量大，全年汇兑总额，大约有二千万元；汇款地点，以天津为主。所收贴水，交通便利的地方就少，如天津、北京一带，每千元收四、五元；偏僻的地方就大，如山西各地，每千元收六、七元，最高时可达十四、五元至二十元。抗战结束后，放款月息为一分，存款月息为五、六厘。汇款贴水，因法币不断贬值，每千元由五、六元增加至十二、三元，最后达到百元上下，这也是一种少见的现象。

### （七）金融季节的标期、骡期和镖局

归化城各行各业的交易，多按春、夏、秋、冬四个标期和每个月的骡期而收付款项。这种制度，既不是当地官府制定，也不是崇厚堂召集各商号集议而建立，只是由山西祁县、太谷等处的资本家共同议定，遂将下一年的“过骡子”和“过标”的日期，在阴历年前一次通知各地，遵照执行。

为什么叫“过骡子”、“过标”呢？据老年人谈：清代初期，归化城的货币，只有白银与方孔制钱两种。因为这些货币的份量重，周转的时候，就得用骡子起动，所以就将每个月清理债务收存款项的日子，叫做“过骡子”。“过标”的起源，也是这种

意义。当时起动白银的骡驮子叫做标驮子，是由镖局护送。所以又将每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付款日期叫做“过标”。

归化城的“过标”和“过骡子”是商业上极其严格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互相往来，常有余欠。定在“骡期”、“标期”进行结算。有存款的收回来，有欠款的付出去。每年的“标期”和“骡期”，大约都在每个月的二十五日前后，阴历正月过春标，四月过夏标，七月过秋标，十月过冬标，这就是所谓“四季标”。阴历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标期共计五天，标前三天进行兑帐，标期内正式收款付款，标后三天，对收付不清的商号，进行所谓“顶卯”也就是逼索债务的意思。如果“顶卯”过了，负债的商号，仍不能清偿债务，那就必须由负债商号定期邀请东家和债权商号，共同协商解决。“过骡子”也和“过标”一样。有了标期和骡期，市场上的交易就有了区划了。在那个时候，除了现款交易，凡是除货迟期付帐的生意，都必须事前讲明清理帐目的标期和骡期，随便订日期的很少。

按照归化城当时的习惯，一般钱铺的放款，春标、秋标，利息较小，冬标因银根紧张，利息即大。同时在骡期和标期的“顶卯”前拨来的银子，一律作为现银，“顶卯”后拨来的银子，即作为客银。凡属迟期交款的生意，如先行付价，或预收半数，都按例生息到期下帐，这种合理的措施，深得外帮商人称赞。每月“过骡子”的时候，市面上的银根奇紧，须待南路常骡由太谷、祁县北来后，方见分晓。冬标须等西路的现银和库伦、乌里雅苏台一带的皮毛牲畜运到后，市面上的金融才有显著的活动，各行各业，方能互相过拨，清理债务，可见当时西北两路的旅蒙商和新

疆的皮毛药材商，对归化城的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直接关系。

在票号组织未出现以前，各地白银的周转，多由镖局护送。那时归化城，曾有协和镖局、德隆镖局、永隆镖局、得胜镖局的开设。协和镖局和德隆镖局是东路常骡。凡直隶省的布庄转运白银，由归化城按季起镖后，经平型关、骆驼峪而达平山、行唐。光绪中叶，一次就起运了白银十二万两，这是最大的一次白银外流。永隆镖局、得胜镖局与温家常骡，是南路常骡。凡是运往山西的白银，也是按季按期，由杀虎口经雁门关祁西达县、太谷。镖局是一种武艺行的组织，它为了保持名誉和途中的安全，都与绿林英雄密取联系。它们接镖以后，就按每年每月规定的标骡期，将托运的白银装上骡驮，由精通武术与驰名江湖的保镖所护送到目的地。所以一般人都称过镖也叫过标。那时归化城的白银，大部份是运往山西太谷县、直隶行唐县与山东东昌府等处。它们在起镖之前，曾订立一种人在标在人死标止的文契，因为责任重大，凡经过险要地带与各个城市，都有喊标的表示。可见当时的镖局，也可以说是一种江湖上的特种行业。起运白银的骡驮子，一般人都叫“标驮子”。每把驮子驮运白银三千两。起镖的时候，驮子上都插着有镖局名号的小红旗，这也许是对绿林英雄的联络信号。清代末叶，南路常骡，以温家常骡最有声望，那时晋北与归化城包头一带，都叫温常骡。民国初年银行兴起，镖局的使命也告结束。

### （八）名目繁多、顿成废纸的 各种钞票

据老钱商谈，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曾发行纸币，归化城一般钱

商囿于积习，不惯使用，所以在市面上没有畅通，这是归化城出现钞票的开端。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中国银行，曾在归绥设立分行，它所发行的钞票，随着上市，因信用坚实，一直没有贬值。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归化城的祁太帮资本家开设的铺庄纷纷倒闭，这时宝丰社业已结束，为了活动金融，同时也准备推翻“谱拨银”的货币制度，刚刚成立一年的归绥商会请准绥远将军张绍曾成立了金融所，发行救济市面的“流通券”，基金由宝丰社移交的存款作保证，当时也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绥远平市官钱局成立。最初它只发行小额铜元券，不久又发行了角票，过了一个时期，又发行了一元、五元、十元的银元兑换券。

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前后，票面额很大的俄钞卢布，由于旅蒙商的传播，大量流入市内，后因外蒙独立，中俄绝交，俄钞无处兑换，成了一堆废纸。在中俄交涉时期，归绥商会曾将它的流行数字，分别统计，报请中俄交涉使公署向帝俄代表提出赔偿的交涉。经过几次谈判都无结果。这就是绥远人民在钞票上吃的第一次大亏。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交通银行设立支行，它所发行的钞票比较稳定，始终没有多大波动。

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山西省银行也来归绥设立分行，从此山西省钞票也逐渐上市。

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丰业银行开张，它发行了十四万元的纸币。钞票充斥市面，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大盛魁曾在绥远开设了盛远银号，原想借发行纸币的手段，吸收现金，操纵金融，独霸市场。

这种野心，不但未能得逞，反而在经济的周转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削弱了大盛魁的信誉。它在发行了纸币以后，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不够，再加上钞票本身的纸质和印刷十分粗陋，容易仿造而出现了不少的伪钞，因而在市场上很不受欢迎。早上发出去的纸币，不等晚上，就全部兑换回来。因此有人说“通盛远的票子，外边不过夜。”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所发行的纸币，除了增加纸张的印刷成本外，并给柜伙们增加发行和兑换的许多麻烦，而且根本起不了吸收现金的作用。

归化城自清初以来，就以“谱拨银”为货币制度。它不仅归在归化城实行，而且在山西祁县、太谷、天津、北京、张家口、大同、古城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城市，也都用这种虚银本位的“谱拨银”过帐，省去了互相点交现银的许多手续。清朝末年，通用现洋。当时归化城仍以“谱拨银”为本位，反而将银元作为辅币，因此银元的价格，当时是低于七钱二分的。如表头一枚等于“谱拨银”的六钱八分；大清银币一枚，等于“谱拨银”的六钱六分；湖北造一枚，等于“谱拨银”的六钱四分。钞票的价值，更低于当时的银元。这种价格，是由商务会根据每日钱市交易的情况，用“牌示”来公布。因此一般人把当时的“牌示”叫做牌价。

“谱拨银”是货币本位。它的价格是稳定的。而银元钞票的价格，却是经常有涨有落的。因而各种银元与钞票不仅成为“谱拨银”的辅币，实质上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一般商品了。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秋，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每元曾折合白银三钱，不久又上升为四钱二分。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夏，它们的钞票价值，曾高于当时流通的现洋。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冬，因晋军来绥，山西省银行的纸币价值，曾高于绥远平市官钱局的旧钞。同年夏，西北银行的纸币，因国民军向西撤退，几百万钞票又都作废，使一般居民与商号受到严重损失。

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秋，晋奉战起。山西省钞与绥远平市官钱局的纸币，都停止兑现，票价大跌，造成市面混乱。同年冬，奉军来绥，汲金纯大事提款，平市官钱局的钞票，更是一日三落，失去了货币的作用。

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丰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因银根奇紧，也停止兑现。当时激起公愤，曾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调处，按六折八折分期兑换。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春，一度停业，同年九月重新开张，又发行新钞十万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它所收销的旧钞数额约达十三万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寇侵占归绥，将它所发行的新钞，完全没收。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绥远遭受旱灾，各县的穷苦群众为饥饿所逼，卖儿卖女，形成了人间地狱。当时归绥商会为赈济，曾发行救济券。

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当时阎锡山为了筹措军饷与国家银行的开办，就无限量地滥发纸币。及至战争结束，阎锡山出走大连，山西省钞和平市官钱局的纸币狂跌。最后晋钞跌至三十余元兑换现洋一元，平市官钱局的纸币和归绥商会发行的流券与救济券都跌至四折。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绥远省府，为了整顿金融，对平市钞票与通券、救济券等，无限制的都按四折兑现，并将平市新钞，通行使用。市面金融，方见稳定。同年

春，山西当局，也为了整顿晋钞，曾规定二元五角，折合现洋一元，这叫做二五兑现。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冬，平市官钱局通行的新钞，又发生了挤兑风潮。后由电灯公司副理郑福成协助解决，方渡过难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平市、丰业的旧券与流通券、救济券等，逐渐绝迹。当时流通在市面上的纸币，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的钞票外，仍以平市新钞为最多，其它如绥西垦业银号，山西省银行与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等所发行的纸币，也有不同数额的通行。

山西省与平市票值的狂跌，晋、绥人民遭受的损失，更是难以数计，金融紊乱，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秋，抗战甫告胜利，蒙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曾通过仲裁方式，暂行通用。不久，法币、关金上市，它就宣布作废，归绥人民又一次吃了钞票的大亏。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末，因法币、关金逐渐贬值，当局曾将面额加大，一千元法币曾与五百元的关金同时出笼。那时关金一元按法币二十元计算，五百元的关金，就顶一万元的法币。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夏，金元券出世，归绥市的一部分黄金与白银，曾被吸收。通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就贬值狂跌成了废纸，人民所受的损失，更是无法数计。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夏，绥远省府，为了维持金融，曾由绥远省银行发行了新的纸币，一直维持到解放，方由人民币代替。这就是归化成——归绥市——通用钞票的一般概况。



## （九）山西票号与大盛川和 归化城的金融关系

归化城的经济命脉，自雍正时期即由祁、太、平三帮的封建资本集团掌握。他们为了获致塞外的财商，曾有钱辅的开设。及至嘉庆、道光时期，更以压倒优势的资本创办票号，如当时的大德恒、大德通、日升昌以及由大盛魁投资开设的大盛川等，不但左右归化城的金融市场，而且整个归绥道的各种行业与银钱商都深仰其鼻息。祁、太、平三帮的封建资本集团与山西票号，对归化城金融事业的确处于支配地位。

清初，山西商人所经营的茶庄、绸缎庄、颜料行都兼办汇兑业务，这些兼办汇兑业务的茶庄、绸缎庄、颜料行等，就是票号的前身。及至嘉庆、道光年代，它们才正式改组为票号。

山西票号，按它们总号所在的地点，分为祁县、太谷、平遥三帮，习惯上简称祁、太、平票商。关于票号的总数，根据山西地方史研究7记载，平遥、祁县各有二十一家，太谷有九家。若按成立年代先后来说，平遥最早，祁县较晚，太谷后起。票号的首创户，是平遥的日升昌。日升昌开设于乾隆时期，原为颜料行，最初曾经办汇兑，但是只限于对号内伙友亲戚故旧的照顾。道光四年（公元一八二四年）由于社会的需要，经理（掌柜）雷履泰便另设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业务。不久，平遥县好几家绸缎庄，在它的影响下，也跟着改成了票号，祁县的茶庄，也有改成票号。所以从乾隆、嘉庆到道光初年这一阶段，可称为票号的开创时期。当时中国还没有银行的设立，人们甲地存下的银子，想运到乙地使用，十分困难。交通既不方便，又没有办理汇

兑业务的机构，只有自己携带，或委托镖局护送，但都不安全可靠，往往发生劫财伤人的事故。票号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其所以称为票号，就是因为它能够开出票据，把甲地的银子兑到乙地使用。存银子的人，拿上这种票据就解决了旅途携带银子的困难。因而它的利润很大，生意十分兴隆，分号遍设全国。人们以其资本雄厚，多以大量的银子存入。有时国家的存款和汇兑，也依靠票号来办理。所以一般人常说，“票号汇遍天下”。咸丰以后，不但增加了由其它行业改组而成的票号，而且独立专营的票号也逐渐增多起来。

那时它的业务范围，除了汇兑而外，还兼办存款、放款、平色等。得到的利润，一般汇费在百分之一以上，存款大约为二、三厘，放款为七、八厘，从平色中也可获利。这时的票号不仅为商人服务，而且已经和当时的官僚政治结合起来，它可以代办“捐官”，从中索取手续费。同时还可以垫款给候补官员，等到他们出任时，票号就派专人，随到任所，将垫款陆续扣清，从而取得更高的利率。这就是所谓“要京帐”。除此而外，这些票号还兼办代存官款，代汇官款的业务，有时官府也向票号借款，往来就更加密切了。光绪初年，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他就有借贷票商以供协饷的奏稿。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太原，曾向山西票号提出借款，当由贾俊臣代表各票号的经理前往觐见，即时凑集了不少的现银，星夜呈献。阴历八月十四，湖南巡抚俞廉三，筹银十万两，交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成长、蔚泰厚、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限至八月二十日汇至平遥。在这个时期，北京“市面流通，视乎票号炉房”，以资周转。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从咸丰到光绪年间是票号的发展时

期。而光绪一朝，山西的票号无论在家数上，营业上以及对当时政治影响上，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票号活动的地区，已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如祁县帮的合盛元、大德通、大德恒等各票号，曾在日本东京、神户、所以及英属香港，设立分庄。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全年的汇兑总额约达二千五百万两以上。

光绪末年，是票号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组织直隶官银号，邀请票号参加，未能取得票号的同意。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户部银行成立，又邀请票号加入股份，号内人员亦参加组织，主办其事再三磋商，又遭到拒绝。

当户部银行与各省地方银行先后成立之后票号的营业就一落千丈，一般的存款主顾，也因它和银行利息相差二厘，纷纷提取，营业减少了十之六七。户部银行凭借国库势力取代了所有汇兑官款以及交库生意。宣统时期，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侵入内地，外国银行亦多在各大商埠开张营业，而票号业务，更受到严重的影响。辛亥起义，一般票号对清政府和官僚的贷款难以收回，而一般存款的人，却纷纷提取。

各地分号都出现了不堪收拾的局面。民国成立，债权人都到总号坐索欠款，负有无限责任的财东，有倾家荡产归还债务者。经过这一次的大变动，不但是山西票号就陆续倒闭，而且归化城的钱辅，也因提款影响，有十九家宣告歇业。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以后，因受大盛魁筹办绥远电灯公司的影响，概未分红。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大盛魁倒闭，大盛川随即停业，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才全部结束。这也是绥远金融界的一件大事。

## （十）敌伪时期的经济情况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月十四日，归绥被日寇侵占，后改名为厚和市。当时市面上通行的货币，仍以平市新钞为标准。不久伪满洲国银行、察南银行、日本横滨银行、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日本通行的一钱、五钱等各种硬币纷纷上市，平市新钞，就被冻结存库，停止流通，而丰业银行与绥远平市官钱局历年积存的资金共计五百〇三万四千五百二十元被全部没收，以后作为蒙疆银行的基金。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日寇实行经济统制，曾以各种伪钞收回平市官钱局发行的新币四百六十七万三千余元，丰业银行钞票三十六万两千六百八十元，山西省钞一百二十六万二千元，绥西垦业，银号钞票一万八千五百二十七元，晋绥地方铁路银行钞票二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元，清后销毁。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归绥、包头等处的十八家钱庄，由日寇合并，先后拨给基金一百五十万元，改组为蒙古实业银行。三月一日开张营业，办理存款、贷款、与各商号互相过拨等业务。是年三月二十日，日寇曾以察南银行的名义，发行了一元券，四月十五日，又发行了五元券，五月二十五日继续发行了五角纸币，不久又发行了一分、五分与一角的硬辅币。通货膨胀的现象，已行开端。十一月二十二日，伪蒙疆政府，公布了银行组织条例，即将绥远平市官钱局、丰业银行、山西省银行绥远分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与察哈尔兴业钱局等原有的资金内拨出一千二百万元筹设了蒙疆银行。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开张，由日寇宗像敬久担任总裁，沈虎臣等担任理事。总行设于归绥（厚和市）、包头、张家口、宣化

等处设有分行，各旗、县都设立支行与办事处，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当时的利率存款约计一、二厘，放款约为三四厘，汇兑贴水为四五厘。不久伪蒙疆政府东移张家口，蒙疆银行总行亦随同迁往。归绥（厚和市）总行，改组为分行，继续办理金融业务。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日寇因经济衰退，曾发行了百元券，借口弥补支出。当时即有民歌一首，抄录如下，作为社会情况的反映。

百元大钞出了笼，小米能买三二斤；  
汉奸乘机发大财，饿死千万好黎民。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晋北实业银行、蒙古实业银行合并为同和实业银行，当时它们的资本已由一百五十万元，扩展为一千二百万元，继续经营银行业务。但是它们为了暴发横财，竟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搞危害百姓，损人利己的勾当。

归绥在沦陷初期，金融事业因社会骚动、生产停滞等关系，日见衰落，呈现出风前残烛的景象。那时有不少的爱国志士、共产党员，从事地下的抗日活动，因而以往的法币仍在暗中流通。日寇对此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

伪蒙疆银行成立后，由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因为他吮吸了难以数计的人民血汗，营业额直线上升：

民国二十七年，一八．九七九

民国二十八年，二五．四一四

民国二十九年，六二．〇九七

民国三十年，七三．四七〇

民国三十一年，九〇。五〇六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阶·段。日寇的经济情况，更见衰退。当时归绥（厚和市）市上通行的货币，除了伪蒙疆银行的钞票外，尚有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与一分、五分、一角的硬辅币。纸币的最大面额为五百元，票面上印有孔子和天坛的图案，那时，北京一带曾有孔子“望天坛，两眼泪不干，大票出了笼，五百当一元，汉奸发横财，百姓气难喘，物价天天涨，饿死谁可怜”的歌谣。

### （十一）李鹤椿、邢克让与郑福成

归化城的金融历史，由清朝雍正初年，至解放前夕，计有二百三十六年。其间在各银钱号与有关机构中，也曾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经理人，他们在金融界起过一些好的和坏的作用。现分志如下，仅作参考。

一、效忠乔务的李鹤椿。光绪初年，山西祁县封建资本家乔务，承受了老人的遗产，在包头镇继续经营后盛公、后盛西油房、石盛西当号、盛西面庄与通和粮店等。在归化城经营法中庸钱铺、南北通顺店、大德粮店与德兴粮店等。那时它们都互通声气，几乎垄断了整个的西口外。

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前后，乔务曾来归化城清查各号柜事，事后为了与伙友们联络感情，测验他们的智谋能力，就提出了一部份现金，开放赌场。当时有李鹤椿者，山西忻县人，幼年时期，曾在东义源钱铺学徒，因为他的能力较强，几年后，就担任了上街跑外的工作。那时他准备投效乔门，就在开赌的时候，偕同法中庸钱铺的伙友，出场压宝，猜中了乔务的意

四，就跟踪追随，每次的兑门上，他都下注压中；这么一来，就惹起乔务对李鹤椿的注意，当场问明了他的姓名籍贯与来历，又经过同业的介绍，乔务就辞退了东义源的职务，投身于法中庸。经过了几年的工夫，由于财东的提拔，逐渐升任为大掌柜（经理）。法中庸在李鹤椿经营时期，为了扩展业务，曾附设法如春账庄，办理借贷，它们凭持乔务拥有压倒优势的资本，就以空卖空，大搞“号盘”，扰乱地方金融，也曾一再惹起地方官府的注意。同时乔务也在包头抛出很大的资本，到处收购胡油、麻油，企图垄断市场，大搞霸盘。但因物资充斥，油的行情，不仅未见上升，反而逐渐回疲。在那个时候，他所买的胡油、麻油，因为数量庞大，无处存放，同时也是为了刺激油价上涨，打算将这些油汁倒入黄河。这个消息传出后，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申诉官府，提出没收资本，予以严惩的要求。乔务获知情况后星夜逃出包头，隐匿于归化城的法中庸。那时当地官府为了勒索乔务，就在归包两城下令通缉。当官府获知乔隐匿在法中庸时便严令李鹤椿将乔务限期交出，解送二府衙门，依法审讯。在此事态严重，形势逼人的紧急时刻，李鹤椿一面派人将乔务护送他往，一面将油市霸盘与捣乱金融等一切非法行动，完全揽在自己身上。那时地方官府曾以种种非刑，逼供乔务的主谋与事迹，但他为了效忠财东，矢口否认。经过各级衙门的拷问终难定狱判罪，最后解送太原巡按使衙门，动用“跪火炼”的酷刑他仍守口如瓶咬定全系已为无干乔务。结案后因他身受非刑两腿残废。乔务念李耿耿忠心，便给他规定了种种优厚待遇，终生在法中庸得到生活保障。

二、疯狂一时的邢克让。邢克让，字揖，山西崞县原平镇人。幼年时期，曾在山西代县阳明堡由刘缸房出资开设的面铺里学徒。

光绪末年，转移于归化城，在德生昌钱铺司帐。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他承受了山西崞县史载名等的资本，脱离了德生昌，接办了蔚隆泰钱庄，担任经理。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大盛魁为了垄断金融，出资现洋四万元开设了通盛远银号，经理一职也由他兼任。马福祥任绥远都统时期，因他是金融巨商，委任为绥远筹餉局局长。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晋北镇守使张汉捷等筹办北平银行，曾聘请他兼任经理，不久绥远总商会也推选他担任会长。

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邢克让根据大盛魁的指示，以通盛远的名义大量抛售铜元，收购银元；当时包头的广生店，在山西祁县帮复字号的支援下，就大量地抛售银元收购铜元，借以排斥侵入包头市场的大盛魁资本。这种赌博性的“虎盘”生意开始后，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肯认输。于是双方的赌注愈来愈大，斗争也愈演愈烈。最后不得不把虚盘转变为实盘，互相进行收交实物，即：通盛远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铜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银元；广生店也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银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铜元。通盛远由于有大盛魁做后台，就利用这种关系，除向附近的各城市尽量收购铜元外，还在其它城市和农村中收集，将收集到的铜元用牛车，马车，板车日夜不停地运进包头，交付了广生店，马上向广生店逼索银元。同时他又勾通了绥远都统署，下了命令，限制包头的铜元出境，广生店虽然是依靠复字号也有雄厚的资本，但它毕竟是钱庄生意，活动范围局限于大、中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中的活动就比不上大盛魁。再加上官府公布了限制包头铜元出城的命令，使它愈显得施展不开。对方交来大量的铜元，在点收和保管方面，也都成为应付不暇的繁难事件。通盛远交足了铜元之后，就催逼它立刻交出银元，这更使它难于应付，陷入了进退维谷的



困境。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广生店的经理胡振业，亲自到归化城求见通盛远经理邢克让，表示低头认输，请他放松一步，代求官署，解除禁令，以便结束这一段赌博性的虎盘生意。邢克让表面上对胡振业陪同烟赌，盛宴招待，但对他所请求之事，则以无能为力来推诿，并运动官署再张布告，严为查禁。结果是通盛远获取暴利，迫使广生店停业关门。胡振业也气愤而死，复字号也受了不少经济损失。

由于邢克让大搞买空卖空的虎盘，使归化城与包头的金融波动、物价不稳，给一般穷困人民，带来了不少的苦难。因而邢克让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唯利是图、暴发横财的钱商典型。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民军移驻归绥。绥远都统李鸣钟以邢克让气焰嚣张，操纵金融，将其扣押入狱。从此炫赫一时的邢克让就此销声匿迹结束了他的一切事业。

三、协助平事官钱局稳定金融的郑福成。郑福成，山西省宝襄县人，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清末北洋大臣袁世凯在筹办户部银行与直隶省官银号之前，为了培养金融人才，曾在天津开设了北洋银行专科所，招收商人子弟前往学习。郑福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后季，被保送入所，随同第一期学员学习金融、经济与银行学等新课程。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派到天津直隶官银号总号练习业务。不久，官银号改名为直隶省银行，他又被派往北京与上海分行工作。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八）刘懋赏、李尚仁等成立广裕公司，利用桑乾河的水源，在雁北朔县、应县、山强、岱岳镇一带，开挖渠道，兴办水利。同时为了经费，招集股份，开设裕丰银行于朔县，由郑担任协理，并在太原、大同、宁武、应县等处设立分行与代理店。后因工程费用浩大，不堪支垫，虽由高步青等继续增

加资本，将总行移于太原，但以垫款难收，卒告歇业。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大盛魁在归绥筹办绥远电灯公司，郑与王梦麟应段履庄的邀请，一度来绥，逗留不久，仍返太原。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他与王梦麟再行来绥接受绥远建设厅的挽留，正式担任了绥远电灯公司的副经理，从此奠定了解放前归绥市的电业基础。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由于他个人的活动，得到了各钱庄的支援，筹集资金十八万元，成立了绥远面粉厂，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一月投入生产。在他主办面粉厂与电灯公司时期，对一般粮店的粮款，随时交付，无形中就将“标期”、“骡期”的惯例，逐渐废除。同年冬，绥远平市官钱局又发生了挤兑风潮，当时董事会与财政当局感到情势严重，虽也曾设法予以应付，但因银根奇紧无济于事。郑福成了解这一情况后，认识到为了不使归绥人民再吃钞票的大亏，必须设法维持平市官钱局的信用，因此他已满腔热情请准当局，将库存面粉，作为实物准备，不论新钞旧钞，都按时价，一律兑换面粉。这么一来，不但挤兑风潮马上平息，而且积存的面粉，得借机脱售，一举两得，颇受当地群众与财政当局的感念和称赞。七七事变发生后，归绥的物价不断上涨。当时郑福成便将人民日常生活必需面粉按原价大量抛售，使归绥市的面粉价格，在那风雨飘摇，动荡不定之中，始终保持稳定，这应该说是郑福成关心民生，为人民办的一件好事。

## （十二）编后附记

“归化城金融史话”，主要是根据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由于既无文献记载，又缺乏系统参考资料，因而结构凌乱，质量不高，如

以通常的史料来衡量，也难免有传闻失实和表达不当之处。在进行访问当中，绝大部份资料是由冯子文、左殿超二位老先生与彭志良先生提供，郑福成、康玉寿、皇甫莹、李希珍，阎瑛、王耀臣等各位先生也有部分口述，一并致谢，并请各界人士予以指正。

# “曹德厚堂”的起家

曹 瑛、曹梦麟 口述

宋再生记录整理

## 一、“曹德厚堂”的起家历史

“曹德厚堂”的祖籍原是直隶省（现在河北省）沧州，回族，曹瑛的玄祖因为在原籍遭到荒年，肩挑行李逃荒到塞外“归化城”（现在呼和浩特市）。在刚来的时候，作小商小贩谋生，祖父时改变行业作牙纪，上牛桥贩卖牲畜，曾祖时开设牲畜店和同英合伙每年向直隶、山西、河南等地贩卖马匹、高祖父时兄弟四人，大祖父曹俊、二祖父曹彦、三祖父少亡、四祖父曹×。

我们的家庭是由曹瑛大哥曹永拉骆驼起家的。大约在光绪年间，我家仅有骆驼十余峰，不能单独跑运输，只能跟着尹万一家中的驼队揽脚跑运输，给商人们驮运皮毛、药材等货物。由归化城向丰镇、张家口、丰台、北京运送。运货回来的时候，又给商人们驮绸缎、布匹、茶叶、烟、糖等货。每次赚得脚费很多，所养骆驼也逐渐增多。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我家和回族赵三元（原籍陕西人）合伙揽脚跑运输，两家约有骆驼五十余峰，除跑丰镇、张家口、丰台、北京外，并远走内外蒙古库伦（现在乌兰巴托）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给商人们向内外蒙古驮运蒙民们需用的生活品，如绸缎、布匹、烟、茶、糖味、哈达、铁器等，回来的时候驮运皮毛、药材等。脚费很贵，赚钱更多，我家的

驼队又有增加，到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仅我们一家就有骆驼四五十峰。于是和赵三元的驮队分开，我家自成一个驼队，由我大哥曹永领队，雇佣拉驼工人三名，和其他人家的驼队组成一帮，约一百几十峰骆驼，各驮各揽的货物，远走外蒙古、新疆等地。去的时间驮运京货、化妆品、缎、烟、糖等。走新疆时，还特驮运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用的米心茶、砖茶等。每驼驮运一担货物约三百市斤，脚费运价约七十多两银子。回来的时候，驮运新疆等地的土特产品，如皮毛、药材（麝茸、麝香），以及食品葡萄干、哈密瓜等。如果驮运自己购买的货物，利润更大，赚钱更多，每驼的货物到新疆古城，就可赚利润一百多两银子。利润多了，就要扩大驼队，逐年增购骆驼和孳生小驼，到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就有骆驼一百几十峰，雇佣拉驼工人十几名，除给商人驮运货物外，并驮运自己购买的货物。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我家驼队增至八百余峰，为了不断地增大驼队，在新疆古城设立了驼场，繁殖孳生小驼，饲养休息的乏驼，雇用工人五十余名，这时候是我家最盛的时期，也是盈利最多的时期。

## 二、拉驼工人的凄苦生活

驼队工人在途中受罪的情况和悲惨的生活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他们拉着骆驼走草地。踏沙漠，风吹日晒，披星戴月，尤其是冬季痛苦更甚。在冬季，他们穿的是特制的牛鼻子鞋，前后钉上皮掌子，再打上钉子；穿的袜子是用驼毛织的裹脚带子，向脚上缠裹，如同旧社会老娘娘裹小脚的办法，一直裹在小腿上，再用细皮绳子将鞋和脚捆在一起，连小腿都捆住，将鞋、袜、脚、腿

捆成一个整体，才能走沙漠地。仅这一双鞋袜就有十余斤重，连同穿的老羊皮皮裤、皮袄和皮帽子，计有三十至四十斤重。骆队组织，一般是一百五十至二百峰骆驼，用工人十二至十四人为一帮。工人内有两个正、副头儿骑着马，他们的任务是探路线，寻宿地，因为沙漠路线常被沙子埋没，尤其是冬季下雪后，路面被雪覆盖，行走全依靠路上的骆驼粪和记忆中的山势走路。在行进途中，每人拉十五峰至二十峰骆驼，不停地行走，就是工人撒尿也得一边走一边撒，一般是不能大便的，因前后都有骆驼行走，一组骆驼停止，就会妨碍别组骆驼的前进，万一工人需要大便的时候，须将自己拉的第一驼拴在前组的末尾驼上，在他大便以后，就要跑步赶上去。因此，驼队工人有一句俗话：“走着撒尿，跑着拉屎，一点时间都没有”。在行进中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只能到达住宿地，才能吃饭喝水。到了住宿地更是忙得很。骆驼认为住宿时是休息，因此，快到住宿地的时候，或是骆驼看到住宿地有了火光，就走得特别有劲特别快了，而拉驼工人认为走路是休息，因为住宿时工作更忙。在撑起帐棚以后，就要分组劳动：有两个人专门做饭，其余人员拾粪、砍柴（沙漠内生长的甲梗木柴），有的打水、有的下夜，没有一个闲人，没有一点空闲时间。驼队一般都是夜间行走，每日下午三、四时开始行动，至夜十二时左右休息，日行六十至八十里，按有水的站口住宿。有时候知道站口水井干枯无水了，就要驮上水，否则骆驼得不到水喝。三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到新疆的古城。有时候半年也走不到，因为大旱路途的草生长不好，骆驼就吃不好，逐渐瘦弱倒毙。如果骆驼死的多了，驮运的货物不能驮走，需要来回盘货，就是把今天驮不走的货物，存放在住宿地点留人看守，把能驮走的货物送到明天住宿站口以后，骆驼再返回来驮运存放的货

物。这样来回往返盘货，就延长了驼队行走的日期，也是驼队最倒霉最痛苦的时期。在这样长时期的行程中，夜行晓宿，风吹日晒雨淋，吃不好，喝不好，每日只吃一顿饭，就是在每日中午，炊事人员能做一顿白面吃，其余早晚饭都是吃炒米、炒面，没有时间再做饭，经常吃不上一点青菜。同时有的站口是甜水，有的站口是苦水，有的站口是矾水，往锅里下面条都变成绿色的了，有时候水井内有了死牲畜，把井水搅臭了，也只得喝这臭水。工人们睡不好，经常睡眠不足，有的人在骆驼卧的旁边就随时睡着了。这是因为在住宿以后，工人少，工作多，轮班下夜、轮班放驼、饮水，住的布帐棚，烧的牛马粪或甲梗柴，轮班看火，十几个人围着炉子睡，头上热得出汗，脚下冻得打颤，睡在湿地上，下边铺着骆驼缠子，夜间湿气都上了身，在第二天拆除帐棚以后，每人都在地下留着一个湿影子。因此，一般拉驼工人患有腰腿痛病，同时因帐棚里的烟熏眼睛，在出帐棚以后，忽然看见四周无垠的白雪照耀，有的就将眼睛的瞳仁放大了变成散光眼。在途中，工人生了病无医无药，就是拿身体抗病，真是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有时候病死了就地掩埋，立上标记，在返回来时候将尸体用毡片包裹回来。每日下午三、四点开始行动的时候，两个人合伙给骆驼身上捆货物，两个人拉四十峰骆驼，就得捆八十包货物，每包约一百五十斤重，有的人在捆货物以后，肚子就饿了，但还得走八十里路，到半夜住宿以后方能吃饭，真是苦不堪言。驼队为什么要夜间行走呢？因为白天放骆驼吃草无时间走路，并且夜间行走安全，把骆驼身上带的铃子塞住不发声的时候，骆驼就知道遇着危险，脚踏下不发声，走得也就快了，这样可以避免纳税。在旧社会各省军阀封建割据，占地为王，各设各的税卡，各收各的税金，如新疆、甘肃、宁夏各在边境设有税收机关，派出收税

人员骑着马，远走几百里以外寻找驼队收税，在遇到的时候，他们不管驮运货物的价值多少，即强要两万或三万的税金。为避免这种强盗式的索要，大部分驼队都是夜间绕道行走。记得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十月，我们几家骆驼约两千多峰，由归化城去新疆，为了避免甘肃、宁夏的税收，直向北绕道而行，在不知不觉地行走中，竟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被他们的边防部队扣留起来，划地为牢，不准出他们划的圈子，随后将曹梦麟等十三个负责人，用汽车送到乌兰巴托，押在监狱关闭起来。十四天以后，由公安人员介绍，住在乌兰巴托商务会，一直住了七十多天，又用汽车把这伙人送到骆驼停留的地点。他们将货物详细检查估价，抽百分之二十的税金，同时留购他们需用的货物百分之三十。在此七十多天里曹梦麟等十三人，在乌兰巴托受惊受怕，胆颤心惊，不知如何处理，留在草地的工人们，受饿受罪受尽无穷的痛苦，回来以后才知道货物未被没收，人员未受处理，是绥远主席傅作义，利用张家口德华洋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涉的结果，否则还不知受到怎样的处理呢！

我家在最盛的时期，有骆驼八百余峰，在新疆古城有繁殖孳生的驼场，雇佣工人五十多人，每年赢余最多，也是剥削工人最严重的时期。这最多的赢余，是怎么得来的呢？即以每帮二百峰骆驼计算，每峰骆驼驮运一担货物三百斤，驮运自己的货物走古城卖货，每担货物可赚银一百两，二百峰骆驼计赚银两万两。开支方面是很少的，雇用工人十四人，每人每月工资三两五钱银子，其中两个正副头儿，每人每月十两银子，共计每月支付工资六十九两银子，每人每月伙食费按一两银子计算，共计十四两银子，全月总计开支八十三两银子。走古城单程需时三个月，共计开支二百四十九两银子。我们就净赚一万九千七百五十一两银



子。回脚驮运货物的利润尚未计算。那时候，我们还认为是将本求利得来的。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才知道是剥削工人得来的。因为我们买货就不用本钱，怎么能说将本求利呢！归化城的买卖货物是不付现款的，完全是以“骡期”、“标期”付款的，所谓“月月骡子四季标”。我家在归化城买货物向古城贩卖，计算什么时候我们的货款能回来，我们就买什么“标期”的货。届时古城的货款回来了，我们就付清所欠的买货款，这样不用本钱，还落个有信誉，都乐意卖给我家货物。拉驼工人那么苦，为什么要干这种受大苦，赚钱少的工作呢？这是因为罪恶的旧社会，失业的人太多了，找不到别的工作，不去拉驼，又干什么呢？虽然每月工资仅三两五钱银子，总比不干还强得多，同时在驼队出发以前，还能预支八至十个月的工资，以安排家属生活。另外，我们还准许他们稍带货物一百至一百五十斤，由他们自负盈亏。由于有这些小恩小惠，工人们就干起了这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工作。

### 三、“曹德厚堂”的衰落

我家自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到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为最盛时期，全部家产约值现洋几十万元，开有德和香茶庄，附设杂货及饭食店，还设有德和堂驼庄等。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新疆金树仁和马仲英作战，新疆至绥远的驼路不通，我们的驼队困在新疆不能回来，工人的工资每月照发。以后骆驼又被哈莎克族土匪抢走，损失最大。在归化城开设的茶庄德和香号赔钱五万多元，运到天津的皮毛几年来未能卖出又赔钱好几万元，因此家庭经济突然下降。而且家庭中不从

事劳动的人逐渐增多，都过着寄生虫的生活，逐渐奢侈靡费起来。在我祖父时期家庭生活还和普通人家一样，每天吃的是倭面、荞面，每星期五的主麻日吃一天较好的饭，规定由妇女们做饭，不准雇佣厨师，以后逐渐的就不能遵守这种成规了。同时兄弟、妯娌之间亦发生矛盾，不能和睦相处，尤其是曹世光因他父亲早亡，他和家人发生矛盾更大，屡次要求分家。因此，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按四股分开家产，每家分得骆驼一百余峰，茶叶六百余箱和积存的皮毛货物等，每家分到房产几处及其它家产等，从此以后各立门户，各作各的营业了。但是由于搞驼队运输，容易发财致富，因此，各家仍然搞驼队运输。搞得最好的是曹永一家。他有六个儿子，年岁都大了，劳动力多，继续组织驼队二百余峰，向甘肃、新疆跑运输，同时在归化城开设面庄，家庭财产又逐渐地发展起来，但比未分家以前，还差得很多。曹瑞家中亦仍然搞驼队运输业，只有长子曹梦麟年岁较大，能跟驼队向甘肃、新疆跑运输，其余孩子较小，劳动力不多，驼队发展较慢，约有骆驼一百四、五十峰，在归化城亦开设德兴长面庄。驼队正在发展的时期，忽逢“七七事变”。在这以后，驼队就只能走后山乌兰花等地驮运小麦，其利润较之走甘肃、新疆就相差很多了。曹瑛自幼念书念经没有跟过驼队跑运输，孩子们都小不能帮助劳动，因之驼队的发展比不上曹永的骆驼多。而最糟糕的曹世光，因为他父亲早亡，他的年岁又不大，家中等人为了照顾他不能照料家务，因之不愿意早分家产。但是他和他母亲经常和家人吵闹要求分家。民国二十五年又分了家，分家以后，他家人口少，仅有他母亲和他女人三口人，分得家产和别人一样多，本应该过好光景。但他不务正业，每日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酒醉色迷，尽量享乐，家中雇佣优良厨师，每日吃着鸡鸭鱼虾，山

珍海味，对于驼队的业务，完全依靠他舅父随便搞，他是一概不管。于是没有几年就将所分得家产踢踏完了，什么也不能搞了。其它各家也由于抗战以后，直至解放前，历年战火纷飞，驼队不通，也渐次衰落下来。

## “小班馆子”与“聚锦堂”

白 温      刘映元

归化城各种类型的饭馆中，以“小班馆子”最为高级。其所以称为“小班馆子”，是因为有“小班”的歌女在里边给顾客唱曲侑酒。“小班”是不同于“大戏”的一种专唱小曲的民间女艺组织，她们除了到高级饭馆中给顾客凑趣助兴，在城内各庙唱“社戏”时，利用中午大戏休息的空隙，也登台为广大观众舞蹈演唱，谓之“小班接台”。“小班馆子”是当时归化城鹿茸客、茶庄、票号以及其它商号大老板们交际应酬和寻欢作乐的地方。三四十岁的小顶生意掌柜，也没有资格到里边去吃饭。因为“小班馆子”从民国成立以后即行衰落，所以现在七十多岁的工商界旧人，都不知道“小班馆子”的详细情况和“小班”有哪些舞蹈歌曲。他们只是听老掌柜们赴宴回来叙说：光绪年间归化城“小班”中色艺俱佳的歌女，有“四村水地”（按：四村水地指现在呼市郊区太平庄公社太平庄、新庄子、美岱和黑沙图四个村的上水地，为城郊村庄中最肥沃的村子，故以此给歌女起了外号）和玉莲了等人。各庙唱社戏进“小班接台”时，见戏台上临时挂出一个写有“优”字的木牌。

白温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到“景福居”学艺，依稀记得经常在这个“小班馆子”中伺候客人的“小班”，是宁武巷的“寿禄班”，演唱的歌女有二女子和千金子。歌女有的是被班主长年包

下，有的是自己雇佣琴师“自混”。她们在“小班馆子”每天中午开门以前，即梳洗打扮前来伺应。饭馆为她们准备着一桌便饭，算在客人的酒席费用中，客人到齐之后歌女们即到厅堂中侑酒唱曲。有些客人还指定让某某歌女前来，“小班馆子”得临时派小伙计去叫，如同民国年间有了“平康里”以后，那种“叫条子”的意思。酒席终了，客人除赏给酒钱，歌女还以“给我妈拿些”为籍口，将剩下的菜肴拿走。有些客人为了表示阔绰，也赏给歌女和琴师饭菜。在“小班馆子”中吃饭的，都是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小班馆子”虽然不卖零饭，但在酒席之外，也欢迎顾客临时点菜，所以桌上的菜肴能剩大半，特别是最后四个肉菜，连筷子也不打动，就原盘赏给“小班”。刘映元岳父的伯父韩二彪子是一个盲人，在“小班”中担任过教师和琴师。据说每隔三两天就有“小班馆子”的小伙计，往家中送一条盘上好的饭菜，糖饼有四五张之多，由此可见当时顾客在“小班馆子”中铺张浪费到了什么地步。“小班”的歌女除到饭馆伺客和在唱庙戏时上“接台”，还于每年四大节给大商号的老板拜节，籍此收一笔节钱，所以唱“小班”的歌女，也能发家致富。“四村水地”曾在南茶坊一带，修起好几处砖瓦房院，小召二道巷有个大同的唱“小班”歌女老荣花儿，还是光绪年间“锦福居”的财东。

“小班馆子”都开在归化城比较僻静的街上。最早的情况不详。光绪年间，全城共有三家，就是大召东夹道的“景福居”，棋盘街（现在改称新生街）的“荣生元”和三官庙街的“旺春园”。其中以“景福居”成立的年代最为久远。白温一九〇三年到那里学艺时，已经是一百多年的老字号。据此判断该号当成立于嘉庆年间。“锦福居”的前门在东夹道，后门在现在大南街“容丰照像馆”，人们可以往来通行，如同大召前的“穿心店”。

因为该号年代久远，故归化城流行过“给你锦福居过来过去”的谚语。“荣升元”成立的年代比“锦福居”稍晚一点，“旺春园”是光绪年间丁锦（老圪旦）接的“长春园”的旧底盘。“长春园”成立于何时，那就无法稽考了。

归化城的“小班馆子”，是鹿茸市场由太原移到此地而兴起的。“锦福居”最初的财东姓贾，是太原的一个大茸商。经过后来几度改组，到了光绪年间，“锦福居”由本城人崔挠狮担任经理唱“小班”的老荣花儿给垫财完全成了归化城人的饭馆。“荣升元”的财东，在光绪年间是祁县人梁诚信，当家的大掌柜是归化南村人李四庆。梁诚信并且是一个鹿茸牙纪，所以也拉拢着好多湖广茸客。每年冬天走外蒙的“通词行”回来“茸盘子”（包括鹿茸、羚羊角、麝香、贝母等贵重药材）在“锦福居”里边“开盘”，在“荣升元”谢客。“锦福居”过去全凭一冬天赚钱，三两个月的收入即够一年开支，为了支应“过大年”回不去南方的茸客，春节期间亦照常营业。“旺春园”虽然不是主要依靠鹿茸市场开盘，但掌握着茶庄和票号的颀主。该号经理本城人丁锦，很会经营，衣着特别讲究，善于跟富商巨贾接近，能和“通盛远”钱铺经理邢克让，“集生祥皮毛牲畜店”经理李祥并列在一起。当时归化城有所谓“两个半买卖人”<sup>（注）</sup>，前者各占一个，丁锦是其中的半个。邢克让是清末民初时的最出色的“钱贩子”，领一万两银子的资本，能在三年之内赚回六万多两银子。“集生祥”资金很少，但李祥能把钱铺和洋行抓住，后来“集生祥”成了归化城第一家皮毛牲畜店。“旺春园”资本既少，历史也短，可是丁锦能把买卖做成和“锦福居”与“荣升元”三分鼎足的局势。

（注）归化城两个半买卖人是指：李祥、老圪旦二人是两个，邢克让算半个，其他大商人如段履庄、李海等都不及格这是我听说的。

“小班馆子”于每天中午以后，才开门营业，外边挂起黑布白心，上写“包办酒席”及“南北大菜”的幌子。过道的板凳上边，经常坐着两个年老顶生意掌柜。如同张家口的“山东馆子”那样，打千弯腰迎送顾客。凡是来“小班馆子”吃饭的客人，都有自己柜上的自备轿车。每到中午以后，由东夹道经过棋盘街直到三官庙街，停满归化城最漂亮的高头大骡子轿车。到三更天以后，饭馆里边停止了丝竹声音，才由各家字号的小伙计，打上灯笼把老板们接了回去。在“乡耆府”担任四大乡耆的老板，因有顶戴和穿着补服，轿车上是红色拖泥布子，谓之“红拖泥轿车”，清朝在贻谷任绥远城将军以前，官吏都在衙门中领宴，不下“小班馆子。”贻谷任将军以后，官吏开始下起“小班馆子”，贻谷也常到“小班馆子”吃饭，很喜欢吃糖饼，以后“小班馆子”中糖饼的一种，就叫成“钦差饼”。所以东夹道至三官庙街这个弯曲的长巷里边，“红拖泥轿车”就多了起来。

归化城的茸客和钱庄票号获利很大、都不惜花钱交际应酬，钱铺因做“虎盘”生意，转手之间可立致千金万金，更舍得铺张浪费；其它商号为了借钱，也在“小班馆子”中巴结钱铺的当家掌柜。光绪初年有一回萨拉齐人刘定邦（即入瘤子，原籍山西代县），借上归化城钱铺的钱，在包头大做油粮“虎盘”生意。有人说他买上葫油往黄河里倒，其实是装到羊皮筏子里运往磴口。他就是在“锦福居”请归化城钱铺老板吃饭的时候，被山西巡抚张之洞令归化厅的衙役到场拿获的。“小班馆子”为了使这些富商大贾心满意足，根据山西“府十县”和湖广人的口味，创造出不少代表归化城的菜肴和糖饼。“小班馆子”除了自榨黄酒，还制有茵陈酒、玫瑰酒和五加皮酒等高级饮料。“小班馆子”是十二个人一席的圆桌，每桌席加上饭菜以外的花费，最低也得十两银

子。有的高达二十多两银子。“小班馆子”的厨师，每月工资不过十几吊“城钱”，合三两银子，可是“小费”能落四五十吊，合十五六两银子。一个初住柜的小徒弟，每月也有四五吊“城钱”的“小费”收入，足能养活父母。因此归化城饮食业的人材，都集中在“小班馆子”里边。民国以后开设综合性质饭馆的人，大多数出身于“小班馆子”。

“小班馆子”后来走向没落途径，是被“东路馆子”和“平康里”所代替。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天津各洋行多来归化城设庄，收购皮毛和土产。这些洋行的小买办，大都是沿海一带人，不习惯吃归化城口味的饭菜。当一九〇〇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前往西安逃难时，在山西办“皇差”发财的厨师，一个叫傅魁是山东人、一个叫王昌是太原人，后来到归化城给“道台衙门”和“归化关”包饭，他们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联络给贻谷将军做饭的鄯厨子和在“二府衙门”包饭的山东人苏长海，在小东街关帝庙戏台后边成立了一个“聚锦堂”饭馆，把崔挠狮从“锦福居”叫出，担任“聚锦堂”的经理，由傅魁拉拢洋行，王昌拉拢茶庄、票号，鄯厨子和苏长海拉拢贻谷手下的办垦委员及其它官人。崔挠狮带出白温等一般人给跑堂烙饼。于是四个“官厨子”和一个坐地虎联合起来，和原有的三个“小班馆子”展开业务竞争。至此以后，“小班馆子”即走了下坡路。

“聚锦堂”是归化城第一个“东路馆子”，也是第一个综合性质的饭馆。它在归化城虽然开设了没有三年，但对以后归化城的饮食业影响很大。并且我们通过“聚锦堂”的一些活动，可以看出清朝崩溃前夕的官场和社会情况，故有必要把“聚锦堂”和“小班馆子”结合在一起详加叙述。“聚锦堂”首先是以“满汉全席”吸引顾客。白温记得民间和小官员在归化城吃“满汉全席，



是大南街“通顺店”内住的“锦生润”借贷庄请客，给众人开的端。吃时一圆桌坐十二个人，席面上陈列着四高摆（如同死人灵前摆的那种供品，系由糕点材料做成），四水果，四干果（桃酥糖，炸花生，炸杏仁和五香瓜子），四道脯（桃脯，梨脯，蜜枣和哈密杏），四蜜碗（乳酪，西瓜酪，杏仁酪和乌梅酪）以及十六个冷荤。菜肴是四个大件（鸽蛋燕窝，扒鱼翅，扒海参和蜜汁莲子），四个烧烤（烤鸭，烧鸡，烤方子猪肉方块和薰鱼），八个小菜和八个座底（四喜肉，神仙肉，川鱼丸、川鸭肝和扒白菜等）。中间还有四道腰饭（喇嘛糕，芙蓉糕，软差饼和炸元宵）和四道茶（山楂酪和乌梅茶等）。宴会由中午开始，一直吃到掌灯以后才散。因为吃到中间，都躺下去抽鸦片，所以连续五六个钟头才能结束。一桌“满汉全席”定价四十八两银子，加上其它开销在五十两以外。那时五十两银子给了劳动人民，可以过四五年温饱光景。富人一席饭，不只是穷人一年粮，而是四五年粮，甚至十几年粮。因为五十两银子折成“满钱”，可以买三万多个六两重的大饼，以此购买糜谷，两口之家十年也吃不了。

当“聚锦堂”初摆“满汉全席”的时候，三个“小班馆子”的人全来参观，因为过去“满汉全席”只限于宫廷和高阶官府中的宴会，民间闻其名而未见其面。那时由于满清统治快要结束，便乱了章程，故被“官厨子”们把宫廷和大衙门的排场，搬到“聚锦堂”卖给有钱的富商，所以除了“小班馆子”的人，其它行业也来“聚锦堂”看稀罕。光绪三十多年外国人有不平等条约保护，在中国各地旅行经商及办理交涉，“聚锦堂”为了准备支应洋人，虽然不做西餐，但备有好多刀叉调匙，贻谷手下办垦的总办和委员们吃“满汉全席”时，是用三个方桌摆在一起吃，上铺白布和设有西餐家俱，并且摆着好几盆鲜花。贻谷时候的红人姚学镜，初任“归

化关”总办，后来任东胜五原同知，此人是最讲究吃喝的一个老官僚，把此种吃法谓之“中餐西吃”。他每次由包头来到归化城，都在“聚锦堂”吃饭，因为吃对王昌炒的山西菜，遂把王昌带往包头，在那里教出不少徒弟，以后包头也有了技术高超的厨师。

归化城的“小班馆子”概不到外边卖饭。“聚锦堂”为了便利“相与”，常派堂皂两方面的人，到外边做包饭买卖。那时洋务运动已在内地开始，山西祁县大财主乔务的儿子称意子加入了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假洋鬼子。因为祁县夏天比较热，称意子每年要来归化城避暑，住在他的字号“通顺店”内。他完全是外国人打扮，留着日本“仁丹”式的胡子，穿着看不见膝盖的长统马靴，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到乡下看戏时骑着备有洋鞍的剪掉半截尾巴的高头大马。归化城有自行车和洋马，就是由称意子给时兴起来的。由于他是“乔百万”的儿子，在绥包两地都有好多商号，归化城除了留住茶庄票号的“通顺店”，像“法中庸”钱铺，“大德通”票号和“大德店”粮店等，都是他家独资经营的生意，因此他一来到归化城，各行各业都想巴结，人们请他吃饭，他也请人吃饭，虽然只在归化城住一个阴历五月和一个六月，过了处暑之后即回祁县，但给归化城的“小班馆子”和新成立起的“聚锦堂”带来营业上的“旺季”买卖顿时就活跃起来。

清末民初时候，归化城的商民人等，每到夏天盛行到乡下看戏，谓之“踩青儿”。商店掌柜们“踩青时”，都带着自己伙房的厨师，在戏场中支搭帐棚，立起炉灶和茶汤壶，铺上骆驼屉和裁绒毯躺下抽鸦片烟，并备有桌凳在上面吃饭请客。称意子来归化城避暑时，亦爱此种消遣娱乐。他吃对“聚锦堂”的菜和归化城的各种糖饼，“聚锦堂”特派傅魁和白温等，跟着“通顺店”专为称意子特制的帐棚去乡下炒菜烙饼，随着戏班在近郊各村巡迴

流动，能做一个多月好买卖。普通商号的帐棚只能在里边摆一两桌席，“通顺店”给财主特制的帐棚，四周有院墙式的布围，能把做饭的小席棚也包括在里边，进了门还有影壁，帐棚开有窗户，里边可以摆四五圆桌席，远望好象一座蒙古召庙，因帐棚用最好的帆布做成。并有遮盖的油布，外边下多么大的雨，里面也能照旧吃饭。由于宽敞，别家字号请称意子，也利用“通顺店”的特制帐棚举行宴会，这就更使“聚锦堂”生意兴隆。称意子是白天下乡晚上回城，“聚锦堂”派去的人一直守候在乡下，夜晚点着灯张罗饭菜，不耽误第二天中午开饭。白温那时还是一个烙饼的“帮角”，分“小费”时顶不上整股，跟上称意子游转半月十天，即可分到五六两银子的“小费”，“聚锦堂”柜上的利润，也就可想而知。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鹿钟麟带着樊增祥，由北京路经山西来查办贻谷被参案件时，归化厅“二府衙门的小林官”(按即当时的归化厅同知四川人林毓杜，因在他以前有福建人林以绥，曾于一九〇五年任过归化厅同知，所以归化城人叫林毓杜为“小林官”)在羊盖板迎接钦差的酒席，也是由“聚锦堂”派白温等人去给做的。接钦差的时候，羊盖板村搭着过街牌楼，一旁站着穿黄缎马褂打长方形军旗的跨刀马队，一旁排列着胡教习带的手持洋枪新式步兵。钦差一出西沟门，探马接二连三的往来报信，到达以后连响九声铁炮，由“官鼓匠”给奏乐。鹿钟麟和樊增祥自己带有厨师，不叨扰地方官员，给端上冰糖莲子汤和喇嘛糕点心，亦未动用，喝了几口茶，即走出“接官亭”坐上轿进了城。跟随的人跑进厨房，由一个手提马鞭的“门爷”，监视着按市价付钱吃饭，用了一些中等点心纷纷走去。把准备下的一桌上好酒席，由“聚锦堂”的人给吃了。结果“小林官”不承认这笔帐，

鄯厨子和傅魁这两们“官厨子”告到“道台衙门”，最后“二府衙门”才给照数付了钱。

贻谷被革以后，办垦的总办委员等均被撤职，红火了没有多少天的“聚锦堂”，也连带受了影响，因为鄯厨子随贻谷回了北京，“聚锦堂”亦随即停止营业。“小班馆子”虽然去了一个劲敌，但仅支持了二三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和外蒙“独立”两樁重大事件，由于哲布尊丹巴的军队南下，和北洋政府的部队发生了一九一三年西起中公旗东至滂江的战事。归化城的外路交通中断了好长时期，“通词行”被火线隔绝在草地，不能向归化城卖货买货，归化城的市面跟着肖条，“小班馆子”也就更加门庭冷落起来。蒙边战争结束不久，京绥路即通车至丰镇，测量队来到归化城，初次决定把车站设立在南瓦窑，于是天津和北京的投机商人，在小召三道巷以东抢购地皮，于一九一五年修建起因“平康公司”命名的平康里大街，在那里开设了妓院，以及“泰和隆”，“四时春”和“四扒馆”等小“东路馆子”，并且为了专做洋行（多住在西五十家南“德隆店”）买卖，在小召半道街还开了个规模较大的“义聚成”，遂把洋行的人从“小班馆子”中拉走。山西商人也为做洋行生意，多到平康里和小召前去吃“东路馆子”，顺便从“班子”中“叫条子”，酒足饭饱以后再回到“班子”中“打茶围”，“小班馆子”的营业越发减少，支持到一九二一年京绥路通车以后，除“锦福居”停业，“荣升元”于一九二三年由棋盘街移到大北街的恒昌店巷口路东（即现在呼和浩特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所在地），“旺春园”的丁锦和韩二扣也将买卖结束与一九一二年停止卖饭的“同和园”（大戏馆子）经理陈旭等人，另组织了“鸿宾楼。”京绥路通车使归化城的大北街成了最繁华的街道，一九二四年这一年，除“荣升元”出来一部分人在

北门里路东开设了“聚锦楼”，还有“锦福居”和“旺春园”的旧人与北门外“天心元”出来的人，在大北街九龙湾巷口开设了“庆云楼”。

“鸿宾楼”开张时，马福祥任绥远都统，邢克让任归绥商务会会长，丁锦和陈旭领了邢克让和“大盛魁”经理段履庄的资本。由于丁锦和陈旭旨在恢复“小班馆子”，所以把“鸿宾楼”开设在席力图召前路西。由陈旭担任经理拉“西庄”的顾客；丁锦担任副经理拉茶庄票号的顾客；利用“平康里”清唱的歌女，代替从前的“小班”。在邢克让母亲做寿的时候，还由“京梆子”的坤角“小香水”等，在里边唱了三天“堂会”。马福祥部下的汉族军官如警务厅长于鼎铭等，因和邢克让关系密切，经常在“鸿宾楼”接受商人的邀请，并且代表马福祥在“鸿宾楼”招待外宾。各行各业为了捧邢克让的场，亦多到“鸿宾楼”请客。故马福祥统治绥远时，这个新型的“小班馆子”非常红火热闹。可是好景不长，开业二年以后马福祥被“国民军”挤走，邢克让亦离开归绥到了天津。一九二五年一月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后，推行冯玉祥提倡勤俭节约的政策，商人不敢公开铺张浪费，“鸿宾楼”即无法营业而关门。陈旭回了“同和园”出赁家俱，丁锦和韩二扣把在大北街九龙湾巷口的“庆云楼”接收，由“鸿宾楼”和“庆云楼”两方面的人合组成“鸿庆楼”。一九二六年秋天“国民军”西退以后，晋奉两军瓜分绥远地区。接着奉晋两系又起争端，先是奉军赶走晋军，后来晋军又把奉军赶走。“庆云楼”虽由北京请来大张和二张两位厨师，以迎合“东路人”的口味，但因地面不靖和丁锦病逝，在一九二八年前后又被山西阳高因包“大德”颜料暴发的“没毛狼”（姓晋）将所占地址向房主以重价赁走，在那里开设了“增兴源”颜料杂货庄，“庆云楼”遂宣告停业。

跟丁锦创办“旺春园”、“鸿宾楼”和“鸿庆楼”的联手伙计韩二扣，迟后四年才被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人请出，于一九三二年组织了现在的公私合营“麦香村”饭馆。

至于“荣升元”则是从棋盘街往大北街迁移时，即将经理李四庆“下出”，由王安宁和侯国栋担任正副经理，因为地点适中和招牌亮，并且临近恒昌店巷里边的“绥远会馆”，而“绥远会馆”住着山西省议会的议员（绥远特别行政区和山西共同组织着一个议会），各县县议会的议员和“地方自治促进会”等地方团体。马福祥统治绥远时代为笼络地方人士，把这些人聘为“筹饷局”和“禁烟善后局”参议、谘议领取乾薪。他们成天大吃二喝，使“荣升元”的生意更加繁荣。“荣升元”于一九二三年阴历十月移到新址，年终结算时，不到一百天即将修理门面的全部费用赚回，因此第二年发生人事纠纷，王安宁和李万出去在北门里开设了“聚锦楼”。侯国栋主持以后，买卖亦很兴隆，不料“国民军”占领了绥远，首先以打倒劣绅土棍之名把“绥远会馆”捣毁，接着提倡勤俭节约，所以“荣升元”在“国民军”统治时代，生意特别清淡，到一九二七年后半年，被平康里“泰和隆”的“东路馆子”经理河北昌平人张振庭接办。但堂、皂、柜三方面仍是本地人，并且还是取消了歌女及出售了零座的那种“小班馆子”的性质。

一九二八年五月绥远被“晋军”长期占领，地方由于种植鸦片逐渐恢复繁荣。因为“山西帮”绸缎商人和“河北帮”绸缎商人竞争，由“晋军”将领李服膺和李德懋给大同人李小辨投资创办了“祥源通”绸缎铺。而“荣升元”的地址被房主违犯合同租给“祥源通”，于是引起诉讼，“荣升元”的经理张振庭和房主打了一年多官司，最后“绥远地方法院”受李服膺和李德懋嘱托，判决勒令“荣升元”停

业另觅营业地址。张把买卖停住上诉期间，军警协助“祥源通”另修洋式门面，后来成为归化城最时髦的建筑。“荣升元”抵抗不了军阀官僚，遂由恒昌店巷口，迁移到大南街头道巷口路西，那时小南街已经成了“土店”集中的街市，不久在小什字南北先后出现了“麦香村”和“凤临阁”，但“荣升元”因把主要厨师王双泉、马大头等被韩二扣拉到“麦香村”（王双泉离开“麦香村”领“土店”资本，于一九三三年又成立起“凤临阁”）所以“荣升元”移到头道巷口以后，由于张振庭和地方人没有深厚关系，“荣升元”抓不住“土店”顾客和地方人士，所以不如“麦香村”和“凤临阁”那样门庭若市。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归绥不久，王双泉又从“凤临阁”出来，因张振庭往出“抽财”由他纠合了包头“广恒西”买客李琳，归绥城南和城东大地主张步青、徐福安和托县黑城因种烟贩土暴发的兰家以及“理门公所”当家段明亮与警察署长邢锦文等的股本，将“荣升元”接过，继续维持了五年，在一九四二年因日本特务机关的汉奸和伪军官兵前去白吃，王双泉遂将买卖结束，他本人也改行为烟土客人，从此归化城硕果仅存的“小班馆子”字号“荣升元”，也在最后摘了招牌。

“小班馆子”和“葫芦馆子”在前清时，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包办酒席不售零座，后者只售零座不包办酒席。民国以后便将此一界限去掉，“小班馆子”也做开“葫芦馆子”的买卖，“葫芦馆子”亦包办起酒席。除“荣升元”而外，民国年间归化城的大饭馆如“鸿宾楼”、“庆云楼”、“鸿庆楼”和“麦香村”与“凤临阁”、连“聚锦楼”、“聚仙楼”、“乐新楼”，以及回民的南北“古丰轩”，也都是“小班馆子”的继续，只不过是“聚锦楼”等有“东路馆子”的菜，南北“古丰轩”不用猪肉猪油而已。现在呼和浩特市的名厨师，如退職的白温，“麦香村”的杨丙

午、吴明、“公益轩”的张德厚，内蒙军区的王双泉、戴兰套，内蒙宾馆的王九狮和石铁锁等都是当年“小班馆子”中出身或是由他们度出来的第一代徒弟。

(一九六六年)



## “大戏馆子”与“清酒馆子”

刘映元

李补根

归化城次于“小班馆子”的饭馆，是“大戏馆子”。这种饭馆一方面卖饭，一方面唱戏，顾客除了在里边吃饭，还可以就便看戏。所以“大戏馆子”也称为“戏酒馆子”。“大戏馆子”的营业有季节性，通常是在冬天开张。因为这时走外蒙的“通词行”回城，各家“相与”都要请客，“通词行”也回请各家“相与”；由于家数很多，像“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这三大号请一次客，分好几天吃饭，每天参加有五六百人，“小班馆子”摆不下那么多的桌子，必须在大一点的场面上举行。同时到了冬天戏班不能在外边出台，籍此可以继续演唱。于是“大戏馆子”便在归化城盛行起来。“大戏馆子”在不唱戏的淡季，也有营业可做，那就是出赁家俱、销售黄酒，打发跑堂的去参加商民家庭中的红白“事宴”。因为此种馆子不卖饭茶所以称为“清酒馆子”。像“宴美园”的经理王禄，“同和园”的经理陈旭（即陈二挠），都是先以经营“清酒馆子”起家。当“宴美园”和“同和园”于一九一二年停止卖饭改为设有“茶座”的戏院以后，他们又以全力经营了“清酒馆子”。归化城“大戏馆子”的家数较少、“清酒馆子”的家数很多，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清酒馆子”虽不卖饭，可是也属于饮食行业，受饭馆的行会“仙翁社”领导。并且我们从“清酒馆子”的业务中，可以了解当年归化城的封建资产

阶级，在举办结婚、出殡、做寿、过生日、满月时怎样铺张浪费，故有必要把“大戏馆子”和“清酒馆子”结合在一起叙述。

“大戏馆子”出现于归化城，现在好多人都谈不出准确年代。在《刘统勋私访归化城》手抄本中，说是乾隆年间大西街有“大云班”在唱戏，里边是否也在卖饭，那就不得而知。光绪年间存留在归化城的两个“大戏馆子”，“宴美园”比“同和园”要早，因为“同和园”的经理陈旭，是“宴美园”的学徒。据内蒙文史馆馆员关钟麟说：“宴美园”以前称“嘉乐会馆”。他的三叔祖连祥（任过新城将军衙门的户司正堂）向土默特旗“镇国公府”购买地皮，在小东街筑“嘉乐会馆”时那里已有唱戏卖饭的“庆乐园”。因为年久失修，才由连祥买下重新修盖。于光绪年间租给王禄继续经营“大戏馆子”改称为“宴美园”。王禄的儿子王大毛（现在“麦香村”食堂服务）说，他祖父王九贵就是一个住“大戏馆子”的，曾给大召东夹道“锦福居”北面的“公和园”跑街，他父亲王禄就因此诞生于东夹道。王大毛并说“嘉乐会馆”改为“宴春园”，“宴春园”才改为“宴美园”，这是听他父亲生前说的。这样，光绪以前，归化城的“大戏馆子”除了“嘉乐会馆”的前身“庆乐园”，至少在大召东夹道还有过一个“公和园”。

另据内蒙文史研究馆馆员霍世昌的父亲霍国楨生前和刘映元谈，他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初来归化城时，大西街路南有个“公庆园”，里边也唱戏卖饭。另外在小西街的宁武巷口，也有一个多年已经不唱戏卖饭的“大戏馆子”。霍国楨回托县参加“义和团”后，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重来归化城时，“公庆园”即因年久失修停止营业。后来陈旭从“宴美园”出来，开了个名叫“同和园”的“清酒馆子”，领了“法中庸”掌柜贾宏，“新疆社”驼户“新盛魁”王家和李安的本钱，把“公庆园”大

加修理，动工时还跌死一个工人，以他的“清酒馆子”字号，把这个新修起来的“大戏馆子”，也命名为“同和园”。不过据陈旭的儿子陈子胜（现在民众剧场工作）说，“同和园”接的是“庆升园”的底子，而李补根却记着“同和园”的家俱中，有不少写有“公庆园”字样的器皿；陈子胜所说的“庆升园”，可能就是小西街那个“大戏馆子”的字号名称。李补根的舅父冯孝祖也是“宴美园”的学徒出身，后来开了“清酒馆子”，任过“福元馆”的经理，生前曾和李补根说，归化城共有五个地点开过“大戏馆子”，除大西街、小西街、小东街和大召东夹道而外，九龙湾大北巷西口路北，早些年也有人在那里开过“大戏馆子”。从以上的好几个说法中，以“宴美园”来进行推断，关钟麟今年七十五岁，他的三叔祖活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岁，“庆乐园”必定经过四五十年才墙倒楼塌，然后重新修建由“嘉乐会馆”改为“宴春园”和“宴美园”。由此考证“大戏馆子”在归化城出现，最迟也在清朝道光年间。

关于归化城最后的两个“大戏馆子”即“宴美园”和“同和园”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们，能回忆起一些表面现象。据说小东街的“宴美园”楼上楼下能摆七十二张方桌；大西街的“同和园”楼上楼下能摆一百二十张方桌，每张方桌正中坐两个人，左边坐两个人，为了不妨碍看戏和端盘方便，右边只座一个人，共是五个人一桌。至于所吃饭菜，分为“四六席”和“改菜席”两种。“四六席”是四干果，四冷荤，四个大碗和六个中碗，中碗里边有一碗海参，大米饭，花卷和黄酒而外，还有马蹄酥一类的“腰饭”。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以后，每桌“四六席”五吊多“城钱”，今一两多一点银子。“改菜席”也是四大碗和六中碗，只是把“四六席”里边的九碗肉菜改为海

菜，添了干贝和鱿鱼一类的东西。“腰饭”也比“四六席”提高。

“改菜席”每桌的价格在一九〇四年以后，是十四五吊“城钱”，合不到三两银子。老年人们听长辈们说，“大戏馆子”的菜价，光绪初年比光绪末尾几年还要便宜。归化城附近因为不是鱼米之乡，“大戏馆子”的菜肴中没有鲜鱼，有时连大米饭也不吃，而吃羊肉汤子切面。

在“大戏馆子”请客，属于当时商界的普通应酬。请大老板们吃饭，多在“小班馆子”里边。到“大戏馆子”赴宴的，多系小顶生意掌柜和学徒。清朝时候除了每年冬天“通词行”从外蒙回来，各家字号互相酬酢；遇到大老板们三年一回家时，“相与家”们也多在“大戏馆子”中给送行接风；至于新字号开张或是老字号办完柜事，更要在“大戏馆子”中谢客。还有三年算帐纯利达一万两银子以上，越发在“大戏馆子”中设宴举行“庆万”。所以夏天能把戏班从外边调回，“宴美园”和“同和园”亦摆酒席。小东街有一家“天元店”，里边住着“义成品西庄”，“永顺合苏庄”，“积成顺太谷庄”和“崇盛林临清庄”，这四家字号因为应酬频繁，归化城人遂说成“宴美园请客必有天元店一席”的谚语。其它像样一点的字号，也是每到冬天一日之间可以接好几张请帖，以致小伙计们都能轮流前去参加，所以现在工商界中七十多岁以上的老年人，都亲身经历过到“大戏馆子”中吃饭的那种场面。

“大戏馆子”除了被大字号整个“包堂”、一天或两三天不卖零座而外，平常都是按桌往出“定座”，由饭馆安排好时间，往出发散请帖。客人到来之后，由堂倌领到主人预订的桌前入席。归化城本地人做“通词行”买卖的也很多，“相与家”请客时常常连家眷也邀请在内，不过年青妇女不肯抛头露面，多半是老太婆带上孙儿孙女前去叨扰。女客的酒席设在楼上，两边垂着

幔布和男座隔绝。商人赴宴均穿着长袍马褂，夏天带的是红缨字帽，其它季节带的是红缨围帽，手工业作坊的人也得如此打扮。小伙计们看见“相与家”的掌柜或是“上司家”（住柜时给出过保举的字号）的掌柜也来吃饭，必须跑过去给作揖请安，礼节特别周到。各桌的客人完全到齐以后，如果由一个字号“包堂”，主人站在戏台上表示斟酒；要是好多字号合在一起请客，主人到各自的客人座位前面表示斟酒，由忻县籍的堂信用刚快的口音，高喊：“东家给满酒哩，不另啦！”互相谦让一番坐定以后，另由“大戏馆子”中专门念“喜歌”的人，带着红缨凉帽跑上台去说一段即景生情的流利快板，惹得楼上楼下哄堂大笑，这才鸣锣开戏开饭。

商号的年青学徒到“大戏馆子”中赴宴，多是由于掌柜叫去学习“人恭礼法”，所以谁也不敢高声喧哗，更不敢鼓掌叫好，戏场的秩序非常安静，剧词能完全听入耳中。清朝时候兵丁衙役不进“大戏馆子”干扰，闲杂人等闯入即被堂信用揩布打出，和他们熟惯的人，只能站在楼梯两边看戏，归化城人叫“贴对联”。谁要是到“大戏馆子”中捣乱，街上的保长即扭入“推子房”（如同以后的警察派出所）管押。官厅在各个方面，都给封建资产阶级以便利。好多大字号老板中的“戏迷”，为了能够清静地看戏，亦不怕降低身份，来“大戏馆子”中跟小顶生意掌柜和小学徒们坐到一起吃饭。“大戏馆子”请的是午饭，因为客人到齐坐定以后才吃，经过礼节表演，耽误好长时间，到席散席终的时候，天气已经不早，台上就点起“风蜡”把里边照耀得如同白昼。冬天剧场中生着很旺的煤火炉子，夏天设有挂凉帽的绳索，观众和服务人员最多不过六百多人，真是冬暖夏凉，一点也不噪杂拥挤。不过这种福份只有商人才能够享受。

光绪年间在“宴美园”演唱的是侯攀龙的“吉升班”，艺人有十三红、飞来凤、二庆旦、杏娃黑和杏儿生等，在“同和园”演唱的是任狗子的“长胜班”，艺人有千二红、一杆旗、二奴旦、八百黑和二娃娃等，这些都是山西“北路梆子”的名角，由戏班从山西的“二州五县”以重金聘来。千二红和八百黑是因为每年工资一千二百吊和八百吊“城钱”而得名。山西“二州五县”新打出的演员，来到西口外以后，必须先归化城的“大戏馆子”中唱红，然后才能继续搭班，到街上去唱“社戏”和到四乡唱“外台子戏”。因此他们在“大戏馆子”中唱戏时，异常地卖力。并且“宴美园”和“同和园”互相竞赛，“吉升班”和“长胜班”也就唱起了“对台戏”。真正的戏剧艺术，只有商人们能在“大戏馆子”中享受到。艺人唱“社戏”和“外台子戏”时，往往对观众敷衍起来。“大戏馆子”在开戏以前，给艺人们备有点心，每晚散戏以后，有一顿炒菜喝酒的便饭。各家字号请客都给跑堂和唱戏的赏钱，并有专赏某一艺人的“单赏”。艺人籍此把殷实商号的老板，认为是曾经伺候过的“客爷”，过年过节前去拜节，亦能得到馈赠。在归化城“大戏馆子”演唱多年的艺人，有好几个都发家致富。像“一杆旗”在牛头巷买了院子，飞来凤在杨家巷盖起房舍。艺人们的工资由戏班开支。王大毛听他父亲说，“吉升班”的侯攀龙和“长胜班”的任狗子，都是“宴美园”的股东。李补根听他舅父说，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同人毕士杰（二麻烦），李德懋，萨拉齐人张万顺（胖挠子）以及毕道统，小长命，“骨头嘴”等，在光绪年间被归化城人视为“赖小子”，曾给“宴美园”和“吉升班”充当打手、跑到张家口的戏院中抢来十三红。后来十三红被包头的戏院拐走，又是他们这一伙人追到途中，给“宴美园”和“吉升班”把十三红夺回。

归化城的“大戏馆子”，是受了辛亥革命和外蒙独立的影响而被淘汰的。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秋天武昌起义，太原不久也宣告光复，驻防归化城的“外八旗”巡防队亦做了响应，接着阎锡山的“晋军”进入包头和萨托两城。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宣告“独立”，外蒙的“通词行”完全没有回来。由于时局不靖故该年冬天“大戏馆子”未曾卖座唱戏。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地方秩序虽然恢复，但是由于驻防归化城的“京畿第一师”的士兵进“大戏馆子”捣乱，“宴美园”和“同和园”卖了九天饭座，即因无法维持秩序而停业。一九一三年夏天，外蒙和北洋政府发生战争，“通词行”由外蒙回来的更少，各行各业的生意都清淡，支垫“通词行”的茶庄货店等，都收不回款项，单是大南街头道巷的“长泰店”一家，就垫出十多万两银子。“大戏馆子”主要是依靠在冬天做“通词行”的买卖，到了这步天地，既无客人又无东道，从前的那种“摆堂席”就摆不开了。“大戏馆子”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于一九一三年宣告结束。以后时代潮流越发不允许“大戏馆子”存在，因而再没有恢复起来，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归绥沦陷以后，为了庆祝伪蒙疆政府成立，“德王”利用由“宴美园”改成的“大观园”，在那里摆上酒席看过一次戏，但根本不是“大戏馆子”的性质。“宴美园”的经理王禄和“同和园”的经理陈旭，从此专营“清酒馆子”的生意，以家俱包办红白“事宴”。“宴美园”改为“大观园”，由王禄忻县原籍的本家侄子王太和组成戏班，向新城的满民关家租来，在里边设了茶座演戏。解放以后改为“大观剧场”、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同和园”的地址归了陈旭，租给亢二和刘玉文等班主在里边唱戏、仍称为“同和园”，同“清酒馆子”的“同和园”是两回事。解放以后这个戏院改为“同乐剧场”，一九六三年因属危

险建筑而拆除。

“大戏馆子”由于不是天天唱戏卖座，所以“宴美园”和“同和园”始终兼营“清酒馆子”的业务。清末民初时期，归化城的“清酒馆子”除了这两家而外，还有新城满民“帮办儿李”开的“连升元”，旧城庆凯桥附近祁县东家的“自成功”与忻县东家的“合欢居”，南柴火市冯孝祖经营的“福元馆”，大召西夹道赵俊（赵达小）开的“文升馆”，海窟毛驴子开的“三义园”，小南街忻县胡家的“景霞亭”和大北街的“天义园”。除“天义园”归并到“文升馆”，这些“清酒馆子”当中，以新城“连升元”的家俱最多，共有六百多张桌子，“宴美园”和“同和园”各有三百多张桌子，“合欢居”有二百多张桌子，“福元馆”，“自成功”，“三义园”和“景霞亭”各有一百多张桌子。那时全城共有两千多张桌子的青磁家俱，给城里的商民和乡下的地主包办红白喜事。这些“清酒馆子”不只是出赁桌橙盘碗帐棚杯筷以及茶汤壶和食盒，还籍此销售自榨的黄酒。出赁一架食盒，就能捎带地卖十二壶黄酒。因为此种馆子不卖饭茶所以称为“清酒馆子”。由于“清酒馆子”给红白喜事服务，像“自成功”和“景霞亭”等还出赁杠轿和风冠霞帔。“清酒馆子”都有在“事宴”上帮忙端盘和坐酒的杂役，和厨师、鼓匠、碾子房、“糕盆子”都有连络，也是结成了“相与”，互相通报消息，打听出哪家要办“事宴”，由“清酒馆子”的跑街把买卖揽成，一齐去前往参加。归化城有“清酒馆子”这一行业，年代也很久远，李补根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前，在“福元馆”跑跽时，他舅父冯孝祖跟他说过，“福元馆”换了好多财东，那时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据此推断该号成立于雍正末期或乾隆初年。

“清酒馆子”的基本伙友很少，只有掌柜、先生、跑街、头



儿和住柜的几个小学徒。制造黄酒和包办“事宴”，用的是临时工。榨黄酒的老师傅叫“酒大工”，不像缸坊（即东部区所称的烧锅）中叫“酒大师傅”，因为“清酒馆子”榨的是熟酒，缸坊烧的是生酒。“酒大工”兼着好多馆子的老师傅，把酒酿好以后，剩下的许多工序，则由“清酒馆子”柜上的人去完成。抗日战争以前，烟酒公卖局每月征一次“酒厘”，每一季度收一次“牌照税”，厘金和税款加在一起，不到黄酒售价的百分之十，所以当时的黄酒价格非常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二十七斤，每斤零售五分钱。给“清酒馆子”到“事宴”上昇食盒、抬桌凳和端盘碗的人，都不领柜上的工资，全靠东家赏赐，和鼓匠一样有喜钱，辛苦钱，烟钱，“单赏”和“越外酒钱”等好多名目，集中起来按股分配。所以归化城的人叫这些劳动者为“小份子”。“小份子”在红“事宴”上所得的喜钱和白“事宴”上所得的辛苦钱，还得把一半交给柜上，由所谓“里三股”去分配。这是由于销售黄酒获利很微，出赁家俱一桌，视天数多寡，每次收三毛至五毛钱，柜上的人虽顶生意，但“应支”很低，特别是未顶生意的学徒，更指望这一笔“小费”买布换季。“清酒馆子”是一个“穷打闹”的行当，“小份子”在没有“事宴”的时候，可以到柜上去吃饭，早晚是稀粥大饼子，中午是荞面，得自己动手去做，如同“光棍堂”中大伙吃“朋锅饭”。柜上为了揽到“事宴”好往起集合人，平日才给“小份子”们吃闲饭。

“小份子”除了出卖劳力，也有端盘的技术，一支胳膊上架十几个盘菜，不往下流一点汤水。他们在“事宴”上由柜上的头儿领导，头儿替“事宴”上的总管负责检点一切。柜上给头儿顶有生意，“事宴”上的各种“小费”头儿也能按“外三股”来跟“小份子”们伙分。“小份子”们由于没有固定工资，想尽办法找籍

口和耍花样耍钱，等于向东家敲竹杠，和鼓匠一样难于开销，总管对他们非常头疼。“清酒馆子”这种行当，不像其他馆子那样规矩尊贵，像“宴美园”的王禄，曾把“赖小子”养为打手；“同和园”的陈旭被财东唾了一口，才把买卖弄成自己的“独事”。所以“小份子”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非常难斗而不好领导。他们时常“脚踏两支船”，既应承“合欢居”也应承“福元馆”，看两家哪家揽的“事宴”肥而去哪家。遇到此种情况，包办瘦“事宴”的头儿，可以到肥“事宴”上把说妥的“小份子”找见，横打厉骂地让回到瘦“事宴”上去服务。“小份子”本来和堂馆的性质相同，但是归化城其它类型饭馆的跑堂和点心匠与“烧麦匠”共同组织的会社“合义社”，不允许“小份子”参加。因此他们和扛房铺的昇轿抬扛工人，给“事宴”上哼喝打发乞丐的保长，由于成天在“事宴”上碰头，所以三方面的人组织了一个“三和社”。于每年阴历六月二十五日“店行社”（茶店、布店和烟店的会社）在南茶坊唱完戏以后，他们利用“店行社”唱戏的陈设和剩下的东西，以及“店行社”唱戏用“小份子”和保长给跑腿把门，他们加入进去混水摸鱼，把夹拿带偷的煤炭、灯烛、米面、肉食集攒起来，也给南茶坊的瘟神唱三天“社戏”。“店行社”很肥，不在乎他们摸捞，每次唱戏以前，就预先多准备吃食用品。“三和社”是用“店行社”的残余物品敬神唱戏，所以归化城的人也称这个社为“蜡头子社”。

“清酒馆子”中的跑街，如同上海的“包打听”。对有钱人家中的小孩大人，从怀胎十月到死后三年，各种动态调查得非常清楚，所以“同和园”的跑街梁登友和宁高升，还兼着归化城的“房牙子”。归化城的商界中，专有一种成天在外给“相与家”办事说话和遇到大“事宴”被请去当总管的掌柜，如“万义煤炭

店”的李创基，“天荣粮店”的许庚业，“裕盛丰银楼”的柳生华，“集生祥皮毛牲畜店”的陈永隆和给“新疆社”骆户揽脚的安双印，以及后来给商务会长贺秉温背过手枪的郭富等等。这几个人中有“府南人”，有忻县人，有大同人，也有本地人和“新疆人”（光绪初年由新疆前来落户，而生于归化城的人），各占一个“路分”，在同乡同行中很有威信。办大“事宴”的时候，东家把花多少钱的预算说出，交给总管去全权处理，所以归化城的人叫总管为“代东的”。“清酒馆子”的跑街和专做“事宴”酒席的厨师，跟这些经常给人“代东”的走得非常近。厨师没有“帮角”，由清酒馆子”给找人。遇到大的“事宴”，“清酒馆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混进去吃饭，因而“清酒馆子”几乎不设炉灶，没有“事宴”时大家动手做饭。民国成立以后，“清酒馆子”的掌柜、跑街以及先生，索兴被大“事宴”的总管聘请为招待员，他们都是跑堂出身，最善于恭维逢迎客人，成了总管的得力助手。“文升馆”的掌柜赵鞅小，出身于“同和园”，有特殊口技，会好多魔术，并且能把千二红的唱腔，学得丝毫不差，是民国初年归化城街上一个有名的“活宝”。办“红事宴”时最容易得罪老爷娘舅，办“白事宴”时最容易惹恼人主，发生了此种情况，有时总管也没有方法对付，经赵鞅小上去一出“洋相”，总能抚慰得破啼为笑。因此以后的大小“事宴”上，赵鞅小成了一个短不了的“和事老”和“红火人”。

归化城举办过的“大事宴”，在清朝时不详。民国年间先是以跑新疆的驼户办“事宴”最铺张浪费，以后是以倒贩鸦片的土行办“事宴”最阔绰奢侈。“天德永”（驼户字号）和“天义栈”（往新疆发货的转运栈）的财东胡天泉（即胡老五）娶了三房儿媳妇，都是上下工半个多月，把“祥瑞斋”京点心铺的人请到

“事宴”上，给发放酒席中间的“腰饭”。“世义诚”土店经理翟耀亭（即翟老三）在一九二四年娶儿媳妇时，“事宴”办得越发煊赫，由“文升馆”包办家俱，上下工也是半个多月，举行婚礼和拜客时，唱了三天大戏，每天都坐五百多桌（六人一席）的上好酒席。迎亲时七乘花轿，一百多匹“对子马”，还打着小东街关帝庙的全付銮驾执事，完全是满清时代县官迎春和城隍出府的气派，使路人侧目而视，曾引起绥远主席傅作义的震怒，因地方绅士代为缓颊而未发作。民国年间的“白事宴”，以“隆昌洋行”老板方孝恭出殡时最为轰动全城，上下工一个多月。方是由“新疆社”的驼户发展成买办阶级，还任过归绥县议会议长。他出殡时除过收下的丧仪赙赠随到随花，家中还贴了五千两银子，总的开支将近一万两银子。凡是乞丐前来烧纸都给一条白布孝带，并且由“小份子”们领到一旁，坐肉四盘酒席。迎经，点主，跑五方，过墙整整折腾了四五天。方孝恭的“事宴”是“福元馆”包的家俱，同行嫉妒多不给支援，冯孝友乞讨总管安双印，结果由帐房开支，临时添购，“事宴”结束时却三文不值二地归了“福元馆”。“福元馆”在未包此一“事宴”时，已经外强中干，包了这个“事宴”以后，买卖始起死回生。方孝恭的“白事宴”，还发了小南街阎济宏的“福盛祥”扛房铺。这一“事宴”在归化城堪称空前绝后。日伪占领时期伪“厚和”市长贺秉温出殡母亲，日本投降以后傅作义部下的“袁家一门三将”（总参议袁庆曾，暂四军长袁庆荣和暂十师参谋长袁庆和）出殡母亲，虽然也是仪仗队摆了二三里长，各机关科长级以上和军队营长级以上的人都去参加，但都不能和方孝恭的“白事宴”比拟。土默特旗有些蒙人举办“事宴”也很阔气。乃莫齐召西夹道的过国安（任土旗参领）在一九二一年前后给儿子娶媳妇时，亦是上下工半个多月和

唱了三天大戏。绥远道尹公署和归绥县公署门前的谢雨戏，因戏班被他调走而不能演唱，还受过绥远道尹和归绥知事的申斥。据说国安因办“事宴”把家中现金花干，还当了不少金银首饰。所欠“清酒馆子”的家俱费，隔了好长时期方完全付清。

一九三七年归绥沦陷以前，归化城的不少红白“事宴”是在饭馆中招待客人，“清酒馆子”的业务就受到排挤；一九三七年沦陷以后，一方面因为经济被日伪统治，各行各业生意清淡，另一方面害怕汉奸特务进行敲诈，有钱的人都装起穷来。各种各样的“事宴”减少了大半，并且规模尽量缩小。先是“清酒馆子”被编入“酿造组合”，由于税重大都停止榨酒；以后虽有贺秉温和王明远（青帮头子）这些人以及其它汉奸特务，利用红白“事宴”和过生日满月领钱，但被开过“东路馆子”的宋华亭和柯玉华师徒，上栅子的双财子和双德子弟兄，大东街的老虎子和二秃子伙计俩等厨师，以及给陈国英“民国日报”做过饭的谢华亭，将做饭和家俱一并包下，更使“清酒馆子”无业可干。到日本投降时，只剩下“景霞亭”和李补根替他舅家照料的“福元馆”等几家。“清酒馆子”的资方，过去属于饭馆的会社“仙翁社”，解放以前因不榨酒，并受“饮食业公会”欺压，归由商联会直接领导，遇到各机关举行大型会议，派他们前去应差。解放以后有了宾馆食堂和招待所，社会风尚趋于朴素简单，结婚多以茶点招待客人，“清酒馆子”的家俱谁也不去租赁，在一九五二年各行业公私合营以前，就完全停止营业。从前的那些“小份子”，多数改就了其它工作，剩下几个年老的参加了旧城大西街和新城东街的“殡仪服务社”。

（政协呼和浩特市委员会供稿）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作者 =

页数 = 2 2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